

编者的话

苏联的政治“新思维”究竟“新”在何处，其含义又是什么，这是近年来引起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极大兴趣的一个问题。三年多来，有关苏联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的新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论述。关于外交问题的“新思维”，虽然在戈尔巴乔夫的著作和讲话中一再有所阐明和发挥，并多次在苏联党和政府的文件中得到表述，但是这方面的公开讨论一直落后于国内问题。同外交直接相关的军事问题则还没有怎么展开。

近半年多来，情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围绕外交问题的讨论趋于活跃，对外交的反思达到了新的深度。这主要表现在：某些长期存在的“禁区”开始被打破；已经形成的新观念和新政策开始在理论上得到比较深入系统的阐述。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个标志。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院士认为，这次会议“直接面对外交政策中的缺点错误”，之后紧接着举行的外交部科学实践会议则是“外交政策讨论的里程碑”；他呼吁国防部也举办一次类似的论坛（阿尔巴托夫1988年秋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收入这本选集的18篇讲话和文章，绝大多数都是1988年春季以来发表的，其中有7篇发表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讲话和文章的作者，有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外交政策的制

定者，多数是苏联学者，其中有些对苏联外交政策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当然也并非收入这本选集的所有文章的所有论点都能反映苏联官方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讲话和文章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最近一段时期苏联外交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从表面上看，外交问题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并没有占多大比重。但是，这个会议所进一步肯定和阐发的内政外交密切相关这个命题，却表明苏联的外交反思在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已经不再限于经济落后必然影响国家的外交地位、发展经济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等一般提法（过去也可以见到这种提法）的水平，而是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同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相隔绝这种更广泛的分析。现在的新角度是，从内政外交的相同运行机制出发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据此检查过去的失误，确定今后革新方向。探究过去的外交失误，已深入到从政治体制上寻找根源，又从外交失误给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上看后果。谋求“坚决更新对外政策”，“使对外政策在实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新的质量”是戈尔巴乔夫在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应从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着手，同时要大力改善国家形象，并且力争以全面改善对外工作来配合并促进国内各方面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以来，逐步纠正了以往领导人对于内外矛盾问题的绝对化观点，即对“内部世界”（苏联社会、“社会主义大家庭”）只看到同一性，否认对立和斗争；对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又只强调对抗性，否认联系和统一。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是，对内承认多样化，正视矛盾和冲突，对外强调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前后两种不同的认

识，可以说从根本上区分了新旧政治思维。近一时期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进一步指出，对内对外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法间存在着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苏联外交部所作的报告有一段概括的说明：国内民主化是对外关系民主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对外政策直接取决于内部事务；国内政策背离列宁主义原则，外交就会受到损害；30年代及其后，内部生活变形，就对国际事务中的路线造成严重影响。

近期苏联的一些讲话和文章围绕这个问题作了不少发挥。这本选集中有不少文章就是比较集中地论证内政外交间的联系的。这里，我们试图将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加以归纳，从中大致理出一些思想脉络。

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首先强调的是，苏联国内高度集中、依靠行政命令的政治体制，严重地影响了外交事务。

首先，外交决策的不民主和神秘化，使犯错误成为不可避免。斯大林主义给外交政策带来的非公开性坏传统，长期原封未动。领导人往往个人作出错误判断和决策。勃列日涅夫对外交更是外行。第二次大战前，斯大林对敌友两个方面，即法西斯德国以及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欧洲社会民主党，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大战后，斯大林又没有尽力限制东西方对抗的规模和尖锐化程度，以防止“铁幕”的出现，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也太绝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推进世界革命的考虑置于对战争和紧张局势危险的担心之上。几十年来执行的不是和平共处政策，而是战争边缘平衡和以核对抗相威胁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扩展势力，不考虑对缓和的影响。这些就促成了一些大国的反苏联合，使苏联陷于危险境地。在

有些问题上，并不是没有人提过正确的判断和建议，但是却没能使领导人采纳。

其次，国内缺乏民主严重地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形象和外交成果。国家形象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政府如何对待本国公民，即是否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否承认个人的权利。30年代的大清洗就破坏了世界上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正和正义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奉行绥靖政策固然出于反共，但也多少同斯大林消灭大批红军指挥员有关。这种镇压使英法认为斯大林践踏了人类道德，不再是可靠的重要军事盟国。

第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在对外政策中产生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没有内外敌人便不可能有斯大林制度。冷战、紧张的国际局势，有助于斯大林对内维护镇压统治，对外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对外行为被用来为国内的政治需要服务。列宁去世后，党内进行的权力斗争，双方就都以外部危险来恫吓对手。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用来颂扬领袖个人，这又助长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斯大林错误地把“民主集中制”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军事行动，便是社会主义在国内发展中扭曲和变形，对外政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至极端的后果。

以上三个方面中，前两点主要是从外交的决策过程、运行机制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消极影响，后一点则涉及外交政策、路线本身。当然，外交路线，不论是推进世界革命，还是霸权主义、大国主义，都不单单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它首先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有关。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在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方面的反思，其方向同其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按照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们的说法，今天苏联外交的

基本哲学构想是：必须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要把过去的次序（消灭阶级压迫是解决全人类性质的问题的前提）颠倒过来——不以全人类利益为重，就不能指望阶级斗争获得成功；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高于一切，国家关系需要也有可能非意识形态化，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确立全人类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前者；苏联的新政治思维应该集人类社会思想成果之大成，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吸收了对立的主要思想体系的某些合理成分；只有对国内问题持多元论，才能容忍国际上的多元化表现。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给对内工作和对外工作提出了相同的口号：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非军事化，认为这些不仅是国内建设的主要目标，也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国际社会进步的方向。内外工作目标一致，内部改革和对外政策革新自然紧密相连，互相促进。

民主化在苏联看来，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也是根本改善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声誉的关键，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竞赛的重要领域。在世界范围，解决民主化问题也是关键。民主化和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制度面临的共同任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扩大民主，代议制民主远远不够，还要有群众实际参与政治决策和管理的直接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实行民主选择。各国的民主化将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条件。和平共处就是国家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民主主义准则，应该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关于人道主义化，苏联强调应该恢复马列主义有关社会

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及共产主义的全人类性的价值观念。苏联学者表示，苏联已经改变了对于人权问题的态度，认为人权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和原则。过去苏联只强调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回避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这是因为对后者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也因为苏联在这方面存在缺陷。现在苏联已把政治民主化以及坚决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开始注意外国的批评，不把西方对人权问题的所有批评都视为敌对的。解决社会福利、社会公正、个性自由、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两种制度的共同需要。合乎人道主义的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人道主义化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的新价值观念之一。国际关系应该人道化，人权问题已经国际化。世界政治应该帮助各国人民和政府解决这个领域里的某些重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还同各国的安全不可分，应该成为国际安全概念的组成部分。

非军事化被苏联学者们认为是今天的头号问题，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都要非军事化。在国内，要放弃对军事战略均势的崇拜，不再夸大它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转而采用合理的足够实力战略，裁减军备，使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在对外事务中，这又是苏联各种裁军建议的基本出发点。这里还涉及广义的非暴力手段。因为采取暴力形式进行社会变革，不仅对本国经济文化造成破坏，而且很容易招来外部势力的干涉，破坏国际形势的稳定，因此最好采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从事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应该有一个界限，即不得给全人类带来灾难。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提出了新的定义：防御战才是唯一的正义战争，只有

实行非进攻性防御才是使用武力的唯一正当方式。

苏联把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非军事化作为国际文明的准则，不但表示自己要在国内和国际行为中遵守，并且要在这三个方面谋求国际合作。

苏联认为，求得这种国际合作不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客观上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首先，在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上已经出现一种“全球意识”，苏联的新思维已开始变成全世界的新思维。其次，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使各国的共同点增多。第三，决定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组织等量齐观。资产阶级尽管是阶级利己主义的，但也有同全人类利益相吻合的利益，在关键时刻，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超出狭隘阶级利益，以国家利益和全民族利益为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它们和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都有可能排除大规模公开暴力行动。

但是，各种表现形式的，大大小小的军国主义，却仍然是人们面临的主要危险，资产阶级的极右势力则是其中最好战的派别。

今天世界的进步力量在哪里？不能以特定的任何社会—阶级集团来划分。能最大限度地实际捍卫人类共同理想的集团和共同体，就能成为世界性革命进程的主体。在防止人类毁灭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左翼、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中派以及温和保守派力量就站在一条战线上。在其他问题上还会出现不同的力量组合。但是，在各种问题上，追求民主的力量都可以找到共同点。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党、其他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以及群众性民主运动在一起，作为权利平等的参加者，共同争取社会

进步。工人阶级对于异己的世界观应该多一些宽容。

根据这一套新想法，苏联外交的重要任务就是：寻找朋友，寻求和外国伙伴的共同点，在各种问题上寻求共同点或接触点，为国家塑造竞争者形象而消除与人为敌的“敌人形象”。

因此，苏联的外交工作也必须弃旧图新。要破除外交部垄断、封闭、自命一贯正确、把一切都简单地意识形态化等不良传统。要依法办事，不以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个人意志作为处理问题的唯一准绳。要建立拥有全权讨论国际政治问题的机制。外交部要向学术界开放，经常同部外专家进行民主交流。要允许批评，鼓励创新，注意树立有价值的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树立官衔与等级的权威。

以上简单介绍的观点，几乎全都可以在这本选集中找到出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本集子的选编工作得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赖万宁等同志的帮助，集子中的有些文章是他推荐的，谨此向他致谢。为了使各篇讲话和文章的主要观点比较醒目，我为它们作了提要（用楷体排于标题之下），加了插题（用黑体排）。由于篇幅所限，对各篇之间相互重复之处和某些比较一般的议论作了删节。

宋以敏

1988年12月19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改革的时代 戈尔巴乔夫 (1)

外交人员必须具有新思维, 敢于

创新和坚持原则 谢瓦尔德纳泽 (8)

外交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责任和

外交后备人才的培养 谢瓦尔德纳泽 (2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和对外

政策 谢瓦尔德纳泽 (35)

探索东西方之间的新关系 达希切夫 (97)

改革, 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和对外

政策 <国际生活>座谈会 (112)

选择的自由 马拉申科 (142)

和平共处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季利根斯基 (149)

意识形态互不相容, 但是 库兹涅佐夫 (154)

和平共处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鲍文 (162)

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及其发展

趋势 奥温尼科夫 (180)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现实与幻想 基瓦 (196)

苏联对地区冲突的政策 普里马科夫 (214)

纵然荆棘丛生, 也要奋勇前进 扎格拉金 (225)

苏联与变化中的世界 伊久莫夫、科尔图诺夫 (242)

革命理论与当代	季利根斯基 (283)
新的政治思维和工人运动的一些 问题	加尔金 (284)
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和阶级利益	波兹德尼亚科夫 (304)

改革的时代

米·谢·戈尔巴乔夫

外交应服从国家的内部发展。须清除外交的过去模式和烙印。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应表现为尊重、理解和相信对方。要推动苏中关系的发展。欧洲处于苏联外交首要地位，不再从苏美关系出发看待欧洲。对亚太地区要给予新的重视。应根本改革对外经济政策。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人权问题。制定对外政策不要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观察一切。外交部不应处于批评与监督之外。外交人员不可过于自信和自我安慰。

《苏联外交通报》编者按：1986年5月23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现将戈尔巴乔夫讲话中阐述苏联外交工作改革部分的主要内容发表如下：

米·谢·戈尔巴乔夫向苏联外交工作人员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把他们的全部工作转向当代轨道，显著提高这项工作的质量，改进它的创造性内容、风格和方法。

外交应同国家利益密切结合

他指出，包括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在内的外事战线的全

体人员必须同全国共呼吸，必须把我们的外交活动同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的外交应当有助于国家的内部发展。苏联外交的任务是保障和平，没有和平，一切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苏联外交还要尽可能为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倘若某一位大使或外事战线的其他工作人员认为，社会加速发展的问题与他无关，是旁人的事，那他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了。不，这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外交人员应当推动世界发展，以使我们在这种发展下能够促进改变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更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

戈尔巴乔夫同时强调指出，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联系是两方面的。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内所经历的困难不能不影响到它的外交地位。敌人曾企图阻挠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当年新的“冷战”浪潮取代了缓和的一个原因。现在，我们的国内事务已经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国际形势也有了某些改善。

要记住二十七大作出的结论：没有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就不可能保持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对外工作取得成功的钥匙，在于后方的可靠和稳固，在于苏联社会和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戈尔巴乔夫指出，外交机构的一项迫切任务是，促使二十七大制定的战略目标付诸实现。代表大会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现在就要尽快地把大会的决议和方针变成具体的外交行动。

苏共中央总书记指出，要让新思维在外交中也能占统治地位，要让外交与时代同步前进，大力清除陈旧的模式和过去的烙印，这一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正在全国进

行的改革同外交人员也有十分直接的关系。这要求每个外交人员具备高度的创造精神、实干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

苏共中央将严格检查外交机构改革进行的情况。在西方不择手段地破坏我们的和平攻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真正活跃的、卓有成效的、战斗的外交。

戈尔巴乔夫要求外交工作的形式和内容都要“现代化”，要求外交工作面向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把党的决议贯彻到外交职业活动中去，要使外交机构完全符合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和苏共二十七大的要求。

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世界发展和苏维埃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方向。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具备以尊重和平等待人为特点的新质量

他强调指出，在苏联对外政策中，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应居于优先地位。同时，还提出必须注意把这种关系建立在尊重它们的经验和尊严，理解民族特点，相信它们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能力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重要的是要克服我们某些外交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偏见、骄傲自满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应当谦虚。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应具有具体的和非形式主义的性质。最高级领导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级别也应当做到这一点。应当认真地吸收盟国——哪怕是一些最小的国家——参与我们的共同事业，事先同它们协商对外活动的实质，在对外政策领域内协调兄弟国家的努力。

他指出，苏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

因，苏中关系对世界形势的影响越来越大。任务在于要推动苏中关系的发展，从而促使和平得到巩固。

苏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在贯彻二十七大于建立普遍的国际安全体系基础的决定和实施1986年1月15日我们提出的建议方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巧妙的和耐心的工作是十分迫切的事情。这方面的斗争将是艰巨的。军国主义集团不会心甘情愿地停止军备竞赛。

必须认真注意，使我们旨在裁军和限制军备竞赛的原则性建议能在最短的时期内在有关的谈判中形成具体建议。在这个领域内也不允许言行脱节。

不再通过苏美关系来看待欧洲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欧洲方面开展工作的新任务。欧洲方面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他指出，在这一工作中曾经有过一些缺点。他强调指出，必须克服思维的惰性。当我们谈到欧洲时，这里有一个提法是适用的：苏联不是通过同美国的关系这个多棱镜来看待欧洲的。这完全不是对美国的作用估计不足。

苏共中央总书记指出，在对待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问题上我们摆脱了教条主义立场。现在，我们应当使我们对这个组织采取的新的原则性态度付诸实施。

戈尔巴乔夫专门谈到了要为维也纳会晤做好认真准备的重要性。我们为此有良好的基础。在会谈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勇气。

亚太地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

苏共中央总书记阐述了在亚太方面的工作任务，二十七大于确定亚太方面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是一个主要方面。他指出，同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国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重要国家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强调指出，我们对待亚太地区问题的态度绝不应只限于同多少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建立了政治和经济联系。应当提出一些旨在使这一地区整个形势健康化、加强这一地区安全、限制军备竞赛、开展广泛的互利合作的远景建议。这里许多方面取决于外交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根本改革对外经济政策

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苏联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在这方面，必须实行根本改革。

现在已经到了该全面研究我们对“第三世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时候了。

还应该极其仔细地分析世界非社会主义部分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应当只是指出那里存在着问题和危机，而要积极地探索我们走向世界经济的新的可能性和提出相应的建议。主要的是，要揭示客观趋势，学会预见。极为重要的是要克服本位主义，要协调我们所有驻外机构在经济问题上的活动。

人权问题应从根本上得到重新考虑

戈尔巴乔夫指出，对待人文问题的态度也应当从根本上加以重新考虑。我们有些外交人员一听到“人权”这个词，就有点禁若寒蝉。个别大使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采取的行为使人觉得，好象不是我们的革命给人提供了真正的权利，好象保卫人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

我们能够，也应该自由地同西方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确实做了出色的工作。这不是宣传，而是客观现实。顺便说一下，甚至美国的一些政治学家也承认这

一点。

外交工作要现实、有预见、善于求同

戈尔巴乔夫尖锐地提出要大大提高苏联外交所使用的各种形式和手段的效果。他指出，外交工作要面向未来，要在有科学根据的分析与估价基础上为未来做好准备。要更多地注意对事件的预测，揭示我们对外活动的潜力，确定加强苏联对外政策活力的途径。

应当更现实地对待国际事务。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应当更清醒、更广泛地估价具体事实，不要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观察一切。倘若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善于迎伙伴，不善于寻求共同点，不善于同伙伴合作，就很难使国际关系健康化。

外交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形式之一就是举行谈判。在进行谈判时，要清楚了解自己需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要为自己制造死胡同，也不要给对方制造死胡同。以为对手比我们蠢是不能原谅的。不要把坚持某一立场的坚定性变成毫无意义的顽固，不要让人家把苏联代表叫做“不先生”。

不应置外交部于批评和监督之外，外交人员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真正的党的干部政策，包括同过去的失误和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斗争，在各个层次上认真地挑选和配置干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在公开性的条件下，在清醒地、自觉地评价每个工作人员的聪明才智和职业素养的情况下，解决外交部和苏联驻外使馆一整套业务问题。

应当坚决地同小资产阶级现象向外交部机关及其驻外机构的渗透进行斗争。遗憾的是，类似的消极现象在外交部是

存在的。应当制止掩盖这些现象的企图和按“家丑不可外扬”原则行事的做法。否则，事业不会得到发展。

在全体外交工作人员中间，必须提高严格要求的精神。外交部不应置身于批评与监督之外。在外交人员中间，不应过高估价自己的力量，不应过于自信和自我安慰。需要有健康的批判态度。

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苏联驻外使馆发回的信息的质量。不能用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和武装我们的信息，不能帮助我们作出正确决定的信息，我们是不需要的。

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随着我国面临的任务的范围越来越大，苏共中央对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我们的外交人员应当善于进行工作和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因为站在他们背后的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原文载于苏联《苏联外交通报》1987年第1期，宜楚译）

外交人员必须具有新思维，敢于 创新和坚持原则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改进外交部工作，首先要注意人的因素。要求外交人员从新的角度观察世界，即人类面临生存或毁灭问题。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国际关系应该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外交人员应勇于创新，敢于公开坚持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不要总想躲在权威的意见后面。

尊敬的同志们！

请不要把这次会议看成是总结性的会议。苏联外交部的改革是一年前，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全部会议上向我们作了纲领性讲话之后广泛开展起来的，但改革不会在今天，也不会在明天就结束。

中央委员会密切注视着改革的进程和内容。总书记在苏共中央一月（1987年）全会上的报告专门谈了外交机构的干

* 这是作者1987年5月3日在苏联外交部会议上的报告，原题“关于苏联外交部根据1986年5月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全部会议上提出的任务和苏共中央1月（1987年）全会的成果开展改革的情况”，现题是我们改的。

——编者

部问题，谈了外交部正在进行改革，改组其中央机关和驻外机关的结构，更新领导成员。

全会在这方面的方针是明确的和毫不含糊的：“应当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路线，提高外交机构的工作效率，力争完全适应苏共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积极的国际活动。”

这是多么重要的任务。

我们如何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但今后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做，因此在评价今天已经取得的成果时，应当看到这些成果是很微小的。

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言时谈到，听众向他们提的问题中最多的往往是关于苏联外交部工作改革的性质和内容。

这正说明了我们时代的特点。两年前，人们向我询问的是关于佛得角和比格尔海峡的局势问题，而不是问我们部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今天，我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者想知道，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方针是由谁在执行，执行得怎样和是否称职。

他们希望能放心地看到，在外交部，在世界面前直接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外交部里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同苏联社会生活中实行的总的改革的要求和步调相适应的。

是的，我们的对外政策及其具体表现在今天已经成为苏联人关注的对象，进行批评和提出要求的对象。我们的外交行动正在经受人民严格的验收。这是一种健康的、必然的现象，它使我们的工作更不轻松了，但有助于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更富有成效，更加积极，更加目标明确。

由此可见，对我们来说，改革不仅提出了专业上的评判

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广泛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评判标准。

我们这里改革进行得怎样？应当如何进行？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作出回答。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当然，可以讲我们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成立了新的关键部门，改变了外交部一些主要的研究所的工作性质，以得力的干部加强了司局领导班子，出现了许多新的课题，填补了我们外交工作的“空白点”。

外交部的工作开始出现新气象

还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已经开始实施一些先进的工作准则，我们同伙伴和对手的对话现在已经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对我们来说已不存在任何禁忌的话题和问题。

最后，我还想说，我们已经恢复了对苏联外交来说是传统的伦理和专业方面的价值标准，并且开始将任人唯亲、裙带风、贪污和事务主义这些污浊的空气从各个办公室里清除出去。

今天我们需要真理——关于自身的真理以及关于我们共同事业的真理。

如果我们不为彼此间的谈话规定一个正确的基点，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所有这些真理。

外交部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苏维埃政权中最有党性、思想最纯洁、组织最严密、工作效率最高的一个机关。我们完全可以为我们的过去、为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干部感到骄傲。苏联外交即使从业务角度上来看也一直是很有竞争能力的，是按最高标准工作的。这个集体以及它的党组织有着光荣的传统。但是，正是对外交部工作的崇高声誉、对它的传统的尊敬才要求我们对它所取得的一切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我们还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将努力克服它们。

但是，现已开展的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新一代的外交工艺和外交生产机制，它们将保障良好的对外政策条件，以使我国能达到党所规定的要求。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已取得的成就，我们要坚决摒弃通常习惯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们的谈话将按照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精神来进行。这次全会不仅仅是把二十七大的思想付诸实际决议之中，而且主要是把责任落实到了每个人，要求人人必须模范地执行上述决议。就外交部而言，就是每一位领导人，每一个工作人员，从部长、副部长和大使到刚开始自己外交生涯的年轻人都应当如此。

我相信，外交部全体人员对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有所准备。

外交部工作首先需要强调人的因素

为了再次强调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讨论问题的方式，我想再引证一下一月全会为我们国家和社会所规定的关键问题：党在改革条件下的干部政策。这样，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抓住了改革的基本环节——干部，所以也就把在实际上对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管理问题进行政治解决集中到了最敏感的区域，即我们称为人的因素。

巨大政治规模的改革把人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大家的工作尤为恰当，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其目的而言是全民的，而就其性质来说则纯粹是个人的行动，也就是说，是“单个的”行动，因此在这方面许多事情取决于一个外交官的个人素质、才华和业务本领。我们这里不应当有无人负责和平均主义现象。

外交工作中的改革——这首先是指在原则上来说要防止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之



间的相互联系。我们大家都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自己的实践活动——既要看到我们的对内政策对国际局势产生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另一个方面——我们的对外政策对内部事务进程产生的影响。如果看不到外交应当为国内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也不可能会有称职的、精通业务的外交官和符合要求的外交工作。

必须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没有框框和教条，没有幻想和偏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最有力和最准确的光学仪器来加以运用。

最近，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代世界观中又增加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新观点。

这就是，第一，出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即：在核——宇宙时代，人类面临着一个自己能否生存的问题。

第二，就是意识到了当今世界是一个极其矛盾，同时又在各个方面相互紧密联系的整体。虽然它是由众多的部分组成的，但它也是一个有着共同命运的统一体。

这两条都是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制定的。它们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外交的基础。评价我们干部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成熟程度就应当看他们对这一点理解得多深以及是否善于将其付诸实际行动。没有这一点，任何外交工作的改革都无从谈起。

当然，苏共二十七大会在宣布和平高于一切、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对帝国主义及其政治的评价，没有否认两大制度之间存在着历史性对抗的现实，也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不可调和的。但是，现在我们政治中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发

现分歧，不如说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接触点。除此之外，在核——宇宙时代拯救人类别无其它途径。

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大家是能够提出明智的对外政策建议的，如果我们能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一系列旧框框并有能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纠正，更准确地说，这就是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习，并订正自己的行动，无论是过去的行动还是现在的行动。

对过去的经验应有所肯定有所批判

我们集体的智慧不仅应用在作出预测上，而且还应花相当的精力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分析。我们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苏联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们贯穿于我们工作的全部历史——无论是战前，还是严酷的战争年代，抑或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缓和年代，我们的活动铸就了一些历史性的里程碑——限制军备条约，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等等。

当然，也采取了一些不能做简单的评价的行动。

关于这一点也应该谈一谈。我们并非总能取得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政治决策是在具体的条件下，根据所掌握的一定的信息做出的。对各类事件的认识及分析都受客观实际的限制。

过一些年，数十年之后，很多事情看起来并不是当年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我们知道了其后果，掌握了很多情况，持另一种观念和标准。这一切都是合乎自然的。

但我们还是要谈一谈过去的经验。这倒不是要给过去做出什么判决，而是为从过去的实践中揭示出那些在今天的实践中或是应加肯定，或是应予摒弃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改革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专门的科学的基础之上。

我们提出这一要求既是针对着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家们的，又是针对外交实践家们的；既是针对我们众多的博士和副博士们的，也是针对来自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们的。

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需求，而是不可更改的需要。过于活跃的实践，超过了毫无生气的理论，或者说，萎靡不振的理论总想如何更巧妙地服务于实践，这些都曾使我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外交工作需要新的理论建设

现在尖锐地感到缺乏理论。

关于这一点，随便怎么叫都可以——叫做社会的，政治的和国家的定货都行，但我们迫切地需要系统的和发达的关于现代世界的构想。这个构想的灵魂就是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应该将人类从自相残杀中解救出来。这是完全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构想，它为把和平作为最高价值，把和平共处作为现代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这样一个论题的正确性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阶级性的论据。

我们认为，在这一理论中不应有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界限，它应表达全人类的一致利益，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理想——生存，防止核毁灭，拯救文明——社会主义是这一理想的捍卫者。

这一构想应揭示出这样一种规律性：正是我们的阶级利益预先决定了我们要为全人类的理想而奋斗。

我们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意味着执行公开的对外政策，将主要问题公诸于世界公众舆论。而且，也绝不仅仅是面向左派力量，——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的国际讨论会即为一例。1985年4

月以后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在我们的政策中，贯穿着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尊重大的和小的，特别是小的国家和民族，尊重各社会派别，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派别。

对我们来说，民主化——这是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使之人道主义化。我们宣布，两三个大国的意志应服从于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意见。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政策。而在国内确立的公开性正在成为对外政策中的有效工具。

要鼓励外交人员的创新精神

我感到极有必要强调一下创新的巨大价值。现在我们很缺乏创新精神。如果有才能的人们能经常开展创作竞赛，那才是符合我们的理想的。

所有具有独创精神的建议，新的观点，积极的方案——这一切都是具体的人做的，是他们的合理化建议，他们的发现。

在生产中和科学中创作权是被承认并予以表彰的。而我们不仅不给发明证书，而且甚至都不提一提，某个思想是由某一位同志建议的。

这不仅是个业务问题，也是个道德问题。如果领导将作者“藏起来”，不表彰他，而将他的成果归于集体，甚至归为己有，那么这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我们在竭力寻找发展创新精神的刺激办法，而所做的一切却恰恰是使人们看不出是由谁创作的，也就是搞反刺激。

让我们规定创作权，并保护智力的所有权吧！到那时，我们将会涌现出创新能手来。

在结束民主化和公开性这一题目时，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改革不应是秘密的。有一些东西，从保守国家秘密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公开。但是关于改革的

实质和性质应定期向群众通报。

第二点：我们应该这样来实行本部门和本机关内部的民主化，以消除产生这样一些现象的土壤：形形色色的波拿巴主义、竭力想压制别人，刚愎自用，把自己描绘成不可替代的、从不犯错误的以及与有权势的人关系密切的人。这一切都叫作“专横跋扈”，这种提法现在到了该重新使用的时候了。

你们看，我们的话题已转到改革的主观因素上来了。

我觉得，这些因素中，外交官不能在业务上感到自满这一点应放在首位，应当认识到不自满要比自满更令人受益，而且自满总会把人引入死胡同。有一位伟大人物说，遵循最简单的真理是最为复杂的事。我认为，表述最简单的真理更要复杂。比如，我就觉得，在你们这样的听众面前，要说应当学会不断学习，那是很难的。但是，我还是应该说一下。我们的外交工作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为了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必须不断掌握新事物，而且不仅仅是在政治上。

遗憾的是，我们在此遇到两个问题。一些工作人员如此繁忙，以至于简直没有时间再去进行自学，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却不愿意努力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仅仅指出这一事实还是无济于事。显然，应该制定这样一种向人们提出要求的体制以使那些吃老本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有人在我们进行的考评范围之内或之外能够提出一些有关如何进行相应刺激（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的建议，我将非常感谢。

要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

须知，上述问题还涉及这样一种不愉快的现象，即一些

外交官甚至是我们一些极其宝贵的、很有才能的同志在身体和业务上的损耗现象。

须知，我们简直是在残酷地剥削他们，在过度地加重他们的负担。作为勤勤恳恳和严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他们竭尽全力，但在他们的生活中逐渐地失去了书籍、剧院、电影，然后是休息，最后是家庭。

怎样更合理地组织劳动，不至于耗尽我们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呢？老实说，如果我们不增加通常所说的具有高等专业水平的工作人员的人数的话，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不会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

如果耗尽的不是身体健康而是整个一生呢？在考评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甚为不安。你们知道，这不是一种做表面样子的考试。就这样，在这种考试时竟发现了，我们有一位同事，谦虚谨慎地工作了几十年，在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地区方面他有着渊博的学问和深厚的政治知识。可是他所担任的职务却不显眼、微不足道，谁也没有发现甚至也没有看到他的才能。要知道，那些富有才干的人，常常还是很谦虚的人。就这样，他的一生快过去了。现在他快要退休了。

提起这件事我心里很难过，把它看作是一个生活中的悲剧。

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显然，应该听取一位诗人的劝告，他说过，“天才是需要帮助的，而庸才却是自己会冒出来的。”

但是，在我们部里庸才不应该通行无阻，而每个领导人到了该学会区别天才和庸碌之辈的时候了。

我们的干部部门应当同党组织一起共同考虑建立一套业务学习的制度和发现有才能的工作人员的制度。

我不想使用公式化的词句说我们这里没有理由可以自满。但是，对自己“高尚的不满”也不应使我们看不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目前的工作量是急剧增加了，他们的工作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简而言之，值得一提的长处无疑是有的。可是总的来说，在部内、尤其是在各个使馆的改革进行得很不顺利，某些时候克服了一些毛病，但在更多的时候是没有克服象惰性、陈旧的方法、工作中拘泥于形式的“传统”等毛病。

按照党性要求说实话，我们应该承认，至今我们还没有解决那些今天妨碍我们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问题。

外交部在前一段时期所补充完成的工作量全都是靠强化劳动取得的结果。的确，我们并没有扩大干部编制，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在较高层次的人们来说都延长了工作日和工作周的时间。

现在，外交部的结构已经形成并稳定了下来。看来，似乎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安排就绪了。但问题恰恰就在于虽然一切就绪了，可是并没以应有的速度运转起来。按时间计算有人是超负荷工作，有人是负荷不足——这就是各单位组织工作水平低的结果。我们甚感不安的是，现在还没有能工作得轻松、迅速和有条不紊的单位。

我们的改革是整个苏联社会实行改革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党在党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所开创的和坚定不移地进行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要进一步改善干部工作，除掉不称职者

我们在今后进一步的改革中首先应该依靠什么呢？当然，关键在于要进一步改善干部工作，或者，在更广泛的意

义上来说，就是要在外交活动中更加发挥人的因素。

显然，问题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要使干部工作井然有序，清除干部政策中过去发生过，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偏差，清除那些由于偶然原因前来从事外交工作的不称职的、在道德方面玷污了自己名声的人员，

第二，要在干部政策方面建立和贯彻一些健全的原则；这些原则能符合党的要求，特别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提出的要求；从而保证苏联外交机构的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这两个问题显然是紧密相关的。关于前一个方面我不准备特别详谈。在这方面毫无疑问已做了许多工作，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积极分子以及整个集体有目共睹的，而且这些工作是在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各部的积极支持下，在部务委员、党委、各司局以及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直接参加下完成的。

大概没有必要在此重提被我们撤职的中央机关领导干部的姓名；没有必要列举因不光彩的行为或因无力领导苏联驻国外的工作人员集体而被召回并被解除了苏联特命全权代表职务的大使们。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外交机构中的道德气氛变得更为纯洁了。

我知道许多同志——包括现在还在工作的以及过去工作过的同志——有怨言，认为现行的开放政策、公开性政策对外交部的威信和声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缺乏严肃的逻辑。我们应当始终不渝地执行这一方针。至于我们的队伍变得更纯洁、我们的环境正在健康化——这只会使我们在国内外赢得更高的威信。同时，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苏共中央书记处的

领导下，我们在执行干部政策方面没有过火行为，不搞运动、没有耸人听闻的事，而是踏踏实实、严肃认真、本着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按照我们党中央的要求办事的。

改进外交部所属学院的工作

提到干部队伍年轻化问题当然不能不再谈谈苏联外交部所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的问题。去年5—6月份部务委员会十分详细认真地研究了这两所学校在培养外交干部及外交干部进修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提出了改革教学过程、建立灵活的培训和进修制度，保证这一工作同外交部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的任务。苏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就外交学院的问题作出了决定，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们负责对听到的反映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其中既有组织措施，也有教学安排的某些改进，包括完善教学大纲。外交学院改善了学员的成份。从各方面情况看来，为即将被派往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举办短期定向培训班是行之有效的。这种定向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已经毕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制度的优点和缺点。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多年来第一次对中学应届毕业生做到了真正的选拔录取。对一年级学生参照他们的社会成份进行选拔的工作得到了改善。

1986年分配毕业生到苏联外交部工作时是以他们的能力、社会积极性、道德面貌为主要衡量标准的。

然而，无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还是外交学院，离我们需要的水平目前仍相去尚远。据我们观察，几十年来在这里形成的惯性的和保守的势力仍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型的领导人为数太少

现在，可能应当谈谈从何做起的问题——谈谈领导人问题。改革的经验，一月全会上对这些经验的分析证明，非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领导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我们谈论多少要使工作有质的改善，无论提出多少措施，如果没有一个精明能干、现代型的领导人主持工作，我们都将一事无成。

请别见怪，目前这样的领导人在我们这里还寥寥无几。多数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长官：要么是过于刚愎自用，要么是缺乏独立精神。现在诉苦成了时髦，说他们是孤家寡人，周围都是些无能的工作人员，抱怨无人可以共同工作，请求增派人员。

我个人很难同那些在一段时间内竟然连一名好的工作人员都发现不了，或培养不出的领导人打交道。

看来，他们的精力没有用到需要的地方，没有象应该做地那样做干部工作。而我却想非正式地表扬那些能为外交部培养出精通业务的专家的人。但对那些实际上是靠别人生活的人也要严加追究。

外交官的党性表现为坚持原则、不怕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左

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谈谈党性问题。在我们的讲话和许许多多的刊物中，经常引用列宁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即苏联外交机构这个集体完完全全、彻头彻尾都是党的。如此经常地引用，以致这一论点丰富深刻的涵义本身在消失，剩下的只有一点了，即我们工作人员的主要核心都是党员。

事实上，苏联外交家的党性，就其最符合当今时代的列宁主义的理解而言，恰恰就是指要公开地，也可以说是大声

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缄口不言，在反对者的所谓优势力量的攻击面前胆怯地采取退让立场。

无原则的调和、妥协退让、自愿放弃职责、总想躲在所谓的集体意见，实际上甚至不是权威的，而是自诩为权威的意见后面等与党员外交官的真正的党性是格格不入的。

党员外交官真正的党性，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创造性的领悟、积极的公民立场和极高的职业素养三者结合而成的高强度的合金。我想再补充一句，这也是一种顽强的意志，力求顶住任何想把国家对外政策的主管部门排除在解决直接属于它职权范围的各种问题之外的企图。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我国有许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没有外交部、绕过外交部、但又总是在外交部代表参加而却又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决定的。很少有谁不怕同某人搞坏关系，说出自己的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左的主张。

实质上，这是最缺乏党性的行为。它不仅违背了个人名誉和职业尊严的概念，而且也极其粗暴地践踏了党的章程，因为党章规定各级共产党员都要捍卫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

尊敬的同志们：

在结束报告时，我还想回到报告一开始时提出的题目上来。国家有权知道，它的外交部门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外交部门怎样行使其职能的。

应加强外交人员同国内部门的联系

而我们，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知道，国家的情况究竟如何，苏联社会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了解这一切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最迫切的需要。因为如果不同我国的国内发展相联系，如果没有人民对外交的支持，就不会有卓有成效的对外政策，不可能有业务精湛的外交。同志们，

我和你们都是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革命性的更新而进行的长征的参加者。

必须同莫斯科的劳动集体、党组织建立定期的和非正式的联系，要经常到国内走一走。部党委已经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工作，但这一工作不应当建立在做报告和进行参观基础上，而应建立在原则性的、党性的基础上，使它具有开放的民主性质。

今后，我们还需要不止一次地分析我们改革的进程，并且将在每一阶段上对已作的事作出评价，拟定下一步的措施。但是最主要的不在于分析局势和规定任务，而在于完成和实现这些任务。也许，这听起来有些象老生常谈的味道，但老实说，我们整个改革和革新的实质就在于此。过去，我们也说过好话，计划也制定得不坏，还通过了使我们自己颇感满意的决定。然而几年甚至几十年过去了，事情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可说是野草丛生，依然如故。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

自去年召开全部会议，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以来，在这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

首先是气氛改变了：党性、求实精神、坦率和老实的态度都增加了。外交工作动起来了，包括工作的组织、安排和实施。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使改革和革新半途而废。

苏联外交机构面临着更加复杂和更加多样化的任务。我国对外政策、整个社会主义对外政策正在转入争取实现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的世界的新阵地。这意味着，要求我们的外交工作机构从深度、可靠性到工作质量都达到新的水平。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外交工作的改

革应该大踏步地前进。我深信，经验丰富的、勤劳的、有才干的和无限忠于我们共产党、忠于我们祖国的苏联外交官集体是能够胜任这一任务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几条措词严谨的结论来结束我的发言，因为这些结论在叙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时已作出了。

任何一个报告，哪怕是最为详尽的报告也不能囊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也没有一个发言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象往常一样，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合作上。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回答不了，那么就更应当一起来寻找各种复杂问题的答案。因为谁也不会从别的什么地方给我们送来答案。这是我们的事，也只能是我们的事。

（原文载于苏联《苏联外交通报》1987年第1期，宜楚译）

外交对国内经济发展的责任和 外交后备人才的培养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外交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联系密切。国家落后同外交失误也有关系。确定外交行动时要考虑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效益或损失。需要培养具备经济知识和创新精神的外交专门人才。

苏联外交部系统高等院校工作人员积极分子会议是去年5月全部会议开始实施部领导和党委会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出席了去年的会议并发表了纲领性讲话。

苏共中央6月（1987年）全会报告所阐述的关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的思想使我们更加确信，高等院校是我们未来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我们清楚，这是个薄弱环节，也清楚，为什么及如何加强这个环节。我所要讲的正是关于这个问题。但首先，我认为完全有必要指出，我们的措施同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有着非常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 这是作者于1987年6月27日在苏联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苏联外交部中央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本书时，文中同外交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有删节。标题是我们加的。——编者

我想到一个问题：对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根本改革经济管理问题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我们好象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

外交失误对国家落后负有一份责任

假如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它无疑是正确的），假如外交的目的是为国内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个论题是正确的（它无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我们国家的落后及其逐渐丧失自己的阵地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份错误。

在国外，我们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最近15年逐渐丧失了作为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的地位。报告中举出了的有关的数字，我已经说过，为什么这些数字也应当说是对我们的指责。我们的外交机构没能及时发出警告，即我们在科学技术革命中已经落后，没有预测到世界经济的结构改革，没能防止片面追求能源贸易。假如我们真正诚实的话，应当说，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助长了，有时则鼓励了向毫无指望的外交项目进行大量物质投资，默许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至今仍使人民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对外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协调得很不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协调。

凭良心讲，外交机构，这个国家管理体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环节之一，过去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脱离了国家根本的切身利益。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本位主义，我们把对外政策的职能当做了目的本身。

现在不应该再这样了。

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向我们外交工作人员提出些什么任务？

这里我们首先应当遵循一个根本原则：对外政策应当为解决我们国家内部任务创造有利条件。

外交工作要着眼于国家的经济利益

主要的一点是，不要让国家为维持防御能力和维护自己的合法对外利益而多花钱。就是说，我们应当寻求限制和降低军备竞赛的途径，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消除对抗因素，平息冲突和危机形势。不言而喻，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应牺牲自己的原则、阶级利益和自己的理想。

现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大力帮助国家机关在经济、科学、贸易、生态等方面建立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能最大限度促进我们经济改革获得成功。

如果按中央全会精神来说，我们应当提高我们对外政策的盈利率，努力做到，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尽量少给我们的经济增加负担，创造稳定的使苏联人能够安心工作的心理环境。

中央全会的决议要求我们在对外政策中也要更多地考虑经济方法。实际上，在政策中总是可以采用各种方法，选择各种不同的策略路线来达到既定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有各种方案。每个方案都有自己的价值。在考虑方案，提出决策和建议时，我们也应当比较物质消耗。要把反消耗原则引到政策中来。

这种分析要求我们端正对影响实现政策的各种因素的认识，对选择某种政策的根据的认识。

在制定新的对外战略中，外交部贡献太少

我们生产或者应当生产一种特殊产品，这种产品的价格今天超过了人类已知的所有东西的价值。这个产品就是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以及最近提出的新的政治思维。

已经不止一次说过，我们的这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是完全有竞争能力的，更确切些说，在国际舞台上是有竞争能力的。在这个舞台上，当代最大的政治家进行着极其尖锐的斗争。而且，一个时期以来，也就是1985年4月以来，这个有“苏联制造”标志的产品显然正在争取冠军，为我们的外交收复曾经失去的阵地。

但是，如果坦率地说，外交部目前在生产这种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是不能令我们满意的。这种产品的生产是由国家和党的高层领导来组织的。我不想因此就说我们已经完全靠边站了。相反，中央机关和驻外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对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革新的对外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坦率地说，这样的工作人员实在太少了。

我们再来谈谈经济。老一套模式，僵化和条条框框仍然是经济的基础。但是，第一，产品的科学内容越来越多了，更多地体现出我们的发明者和创造者的才智。第二，大批生产变成了柔性生产，即产品能够迅速更新。

如果把这种情况同我们外交部工作结合起来看，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大批产品缺乏科学内容，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性不够。这种产品是根据旧模式设计和制造的，而且没有考虑用符合今天要求的标准来迅速更新这种产品。

现在必须面向未来，同时要确定今天的工作需要哪一些专家。经济和外交之间的联系是最直接的。

第一，请原谅我老话重提：先进的向上的经济永远是先进思想的派生物。

第二，没有经济知识，外交行动缺少经济内容，不善于确定某种外交行动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益或损失的外交人员已经不符合今天的要求了。

这里，我想紧紧围绕我们谈话的本题讲讲。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明天需要什么样的专家？5年或10年以后又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我们对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当前培养的学生感到有哪些不足？

请允许我用引伸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培养具备渊博知识，包括经济知识，并善于思考的外交人才

不久前，撒切尔夫人向我们提起关于“我们的”叶夫根尼·奥涅金，说他很熟悉“他们的”亚当·史密斯的著作。这对英国首相来说，体现了她的演讲艺术，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先辈是视野宽广，有高度文化修养，渊博的知识，包括经济知识的。

人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的高等学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是知识狭窄的还是有高度的普通文化知识的专家？

我知道，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领导人甚至想根据苏联外交部各局和各司的需求建立培养理想的毕业生的模式。

我不想提出自己的模式。我只想讲一点希望，希望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除具备高度的普通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还应当善于思考，我要强调，要善于在今天要求的水平上进行思考。遗憾的是，我的观察证明，一些毕业生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思维方式进行活动的的能力比较差。这可能是由于仍然鼓励盲目执行任务造成的。

在结束这个引伸的话题时，我只想讲一讲应永远牢记过去的一个教训。在职业外交官家庭里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使我们的外交得益不少。但是学生的知识和品德之间，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过低的道德价值观之

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也给我们的外交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这里能讲点什么呢？我想，只能讲一点，应以工作才干为标准，在我们的工作中只应鼓励有才干人的精神一致。

我要声明一下，我认为我无权教训别人怎样教学，在哪个具体课程上花多少时间。这是方法论专家、教育家、系主任、院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事。

但是，作为部的领导人（你们正是为这个部培养干部的）应当对培养什么样水平的外交人员提出要求，对外交职业应当如何理解谈点看法，对有关高等院校应当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提出一些想法，以便培养出未来的高水平的专家。

不同的时代对专家有不同的要求。

今天我们讲的是未来对专家的要求。

在整个苏联外交史上，还从来没有需要解决象今天这样重大、这样重要的任务。为此，必须有崭新的和更高的专业水平。但是，今天按个人的想法和意愿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只有在严格科学的和吸收最佳建议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相应的标准。

为了使我们的谈话更具体些，我要谈谈我们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你们在培养学生与教学工作中要注意些什么。

要培养学生具有新思维

从政治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全人类的利益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各国和平共处已经牢固地成为各国相互关系的普遍原则。

从军事安全角度来说，我们要争取无核武器和无化学武器以及所有其他武器库不断减少的世界，我们要争取一个建立在普遍的国际安全体系基础上的世界。

从经济角度来看，世界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越来越密切。在这个世界里，公正的经济合作，是共同福利的基础。

从精神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个各民族和各国人民广泛密切交往的世界，将是文化繁荣和建立新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这种新人道主义是与非军国主义和非暴力世界，与和平是最宝贵的财富的观念相适应的。

对世界的这些看法，反映和表达了我们在核宇宙时代的阶级利益。

正是社会主义认为，和平是最宝贵的财富，把维护和平和消除使人类遭到毁灭的威胁看成是自己最高的阶级利益。只有在和平与正常国际关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才能揭示自己的优越性。

军备竞赛妨碍社会主义发展，对抗、制裁、国际分工中的歧视做法也都影响社会主义发展。

苏联愿意同所有国家积极合作，使对世界的这种认识获得胜利。我们就这方面提出了不少实际建议，制定了这座未来大厦最重要部分的蓝图。米·谢·戈尔巴乔夫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去年11月在印度议会的讲话以及当时签署的德里宣言和他在莫斯科讨论会上的演说都曾谈到这些建议。

苏联外交的目标是明确的：在国际法准则和原则范围内实现新政治思维的构想。

任务似乎提得很简单。有些反对我们的人说，这是空想或者是宣传。但是，在雷克雅未克之后，在我们提出欧洲问题的建议之后，关于无核世界的主张越来越现实了。

外交人员应该善于提出新建议，勇于争论

我想专门谈一个情况。过去有过一段时间从不涉及尖锐

的话题，而且即使并无恶意，但不同于官方观点的意见也不能发表。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请看，出现了什么情况。针对国内生活各个方面，针对党和国家建设、经济、文化、艺术的许多主要问题发表了不少大胆的，有意思的，争论性的文章。但在对外政策领域却没有出现类似情况。难道对外政策领域一切都正确，就没有与现在所执行的方案不同的方案吗？

很少考虑问题。很少争论。据我观察，年轻人周围的气氛不利于推动他们尖锐地和活跃地思考问题。

甚至，在我们的内部工作上，也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加怀疑，除了已经批准的决议外，不提任何其他建议。

今天还允许这样舒舒服服过日子吗？或者是同志们认为在对外政策中不能按另一种方式行事？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教学问题，不如说是培养未来专家的生活态度问题。

要教会学生会思考，能实践，掌握外交艺术

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们的学校应当走在部的前面，首先要教会新一代掌握“外交艺术”。还要懂得，学校的任务不在于教会学生正确地，即墨守陈规地起草文件，而在于知道写什么和会思考。

这里我们谈谈什么是“知识”这个基本问题。我不想给它下什么科学的定义。我想从实际讨论和切合我们的要求（我所理解的要求）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缺乏坚实的人文科学教育基础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工作人员。一般的文化和道德教育在各年级是有区别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是一般的课程，而法律和经济则是必须的。把这些课程取消了和砍掉了是不好的。

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应当有利于改善精神气氛。的确，我们主要外交官的实际想法应当成为未来外交人员的理论知识。应当做到，使学生关心，今天日内瓦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进行得怎么样，应当让学生分析和评价已经发表的尤·沃龙佐夫、维·卡尔波夫、阿·奥布霍夫及他们的对手坎珀尔曼、格利特曼和尼采的讲话。

今天在日内瓦发生的一切是通向无核世界的序幕，是创造历史的时刻。关于日内瓦裁军会议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关于制订全面国际安全体系的构想，关于赫尔辛基进程，关于欧安会参加国维也纳会晤的实际情况都有同样的意义。

如果学生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并试着提出论据和观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明天，即将来外交部工作的人员的专业水平而担心了。

根据正统的定义，外交官应当是容易与之打交道的人，是善于进行讨论、争论和辩论性谈话的人。听众和学生是否有可能发展这方面的品质呢？

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谈话现在已扎扎实实地成为我们外交工作的实践。我们的大学生和听众有可能经常在这种场合表现自己吗？他们平时到外交部新闻中心吗？

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许多。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应当探索解决的办法。

应当考虑改进语言教学工作。

我想再谈谈，我们系统的在职干部的再教育问题。

在职干部需要更新知识

在我们讨论改革进程的会议上，经常提出“包袱干部”这个问题。现在部里正在进行的干部鉴定工作也揭露出许多令人不安的事实，表明相当多的干部的业务素质存在着不少严

重问题。

同时查明，今天由于某种原因被列入“包袱干部”的人，其中大部分通过良好的干部再教育和提高业务素质后，仍可以回到积极的工作人员的行列中去。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此。每个人都应当学习，特别是在今天。只不过有些人能够自己经常不断地去进行学习，而另外一些人却需要别人帮助，需要别人为他们更新知识和技术业务素质创造条件。

在结束这篇讲话时，我想再次表示希望，希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能恢复昔日的威望。我也愿意向你们保证，我们部里将为此竭尽全力。

改革是一个经常的不间断的过程，也应当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卓有成效的培养、再教育和提高干部水平的制度。目前，我们这里这样的制度建立得很慢，但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会议能给这件工作以有力的推动。

我的讲话是开诚布公的。我也希望能听到你们直率的、不讲情面的发言，但要讲实质问题。而实质就在于，和平与安全是由人创造的，而这些人是在这里，在这个围墙里培养的。

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办？让我们再来一起考虑一下，怎样做和应当做些什么，才能使培养人才的水平符合我们的意图和事业的要求。

（原文载于苏联《苏联外交部通报》，1987年第2期，宜楚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和对外政策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应把全人类的价值观念放在最优先地位。苏联的民族利益就在于推进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进程。不能再把两种制度的对抗视为当今时代的主流。能否在高科技基础上加速并公正分配物质财富、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把阶级斗争排除于和平共处原则之外。外交的主要任务在于觅友，至少做到不树敌。

国际关系以经济为中心。外交决策必须考虑到经济上的得失。苏中对抗就没有考虑经济代价。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也应突出经济观念。不应再把安全建立在谋求武器数量优势的基础之上。先进科技基础，也即具有制造和生产高质量新武器的能力，才是安全的可靠保障。在过去，军事和政治有时不一致，对苏联的国际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今后国防建设中带原则性的革新主张，应由外

* 这是作者1988年7月25日在苏联外交部科学实践讨论会上的报告。标题是我们加的。所谓科学实践讨论会，是指讨论会有学术界人士和实际工作者参加。——编者

交部进行验证。

国家的对外政策直接取决于内部事务。对待本国公民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外交的成败。30年代的大清洗动摇了外界对苏联外交立场和倡议的信任，玷污了苏联的国家形象。国内民主化是对外关系民主化的前提。国内政策失误必然严重影响外交。过去的外交失误包括：过高估计世界进步力量，不平等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欧洲社会民主党视为法西斯帮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考虑自己的能力也不计效果，在西方国家面前使自己呈现出“敌人形象”，等等。战后“铁幕”的出现和80年代初反苏战线的形成，也有苏联的一份责任。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使外交决策机制科学化和民主化。今后要依法办事，不以包括最高首脑在内的个人意志为处理问题的唯一准绳。外交部有保守、自以为一贯正确、单一化和宗派斗争等不良倾向。要提倡创造性、对外政策主张多样性，并在最大限度上实行公开性。改变帮会式的关门主义态度，要吸收部外国际问题专家参加业务交流，让他们参加竞选司局级领导。

一、用党的思想和意志来武装我们的改革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大家当然都记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

乔夫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开头讲的一句话：“如何深化革命性的改革，并使这一改革不可逆转？”

代表会议对我国发展的这一根本问题作了回答。

在国家革新的潮流中，代表会议把民主化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使变革不可逆转的最重要保障结合起来。

代表会议的全部过程、内容和气氛证实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党是社会纲领目标的表达者，是领导国家沿着革新道路前进并在社会上起先锋作用的政治力量。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外交的新方针

在代表会议上，党丰富了二十七次关于对外政策的战略思想，给对外政策和外交提出了新的原则性方针。在这些方针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符合宪法规定并拥有全权来讨论国际政治问题的机制。

代表会议确定，对于我们来说，最首要的任务是保证用政治手段来为国内改革创造和平和在各方面都有利的条件。

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根据对当前现实的分析阐明了可能决定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形势的几种趋势。这就是：

-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非军事化和人道主义化；
- 越来越多地把安全保障从军事政治解决领域转向在政治上相互配合的领域；
- 利用科学技术潜力来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 为使各国和各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相互丰富、为巩固世界和平的结构而发展各国与各国人民之间多样化的和平平等的交往。

在世界政治中促进这些趋势的加深，这就是我们的主要

使命。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之后，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促使新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政治现实得以形成的前提，我们还需要在这种现实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政治改革的方案要求我们有明确的概念：在新的上层建筑中，对外政策将是什么样的；为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对外政策应如何运转。

外交工作应民主化和法治化，并在更大程度上开放

苏联外交工作者还应当从外交工作民主化、从法律和表达人民意志的民选机构应高于一切的角度、从更多地实行开放并同社会公众保持更好的相互配合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总结了改革三年来在政治、社会、经济、精神道德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结果，集中精力剖析了产生阻碍发展的深刻原因，制订了能够消除这些原因的一整套措施。

我们面前也摆着同样的任务：分析积累起来的经验，领悟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和苏共二十七次以后这一时期的意义，确定保证使苏联外交改革深化和不可逆转的途径、形式和工作方法。

我们打算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三年实践对我们提出的具有哲学观念意义的关键问题上并从中得出工作的结论。

另一种办法就是泛泛地谈论外交工作一切方面的传统做法。这样做会使我们陷于琐碎问题，分散注意力。这些问题和这些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小组会议上更有针对性地和更具体地进行讨论和研究。

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上了一次关于公开性和社会主义多元论的

课，要以此为样板改革外交工作

在确定谈话的题目以后，我还想再说一下这种谈话的性质。其样板和范例就在我们大家眼前，这就是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

这是一次有关公开性的公开课，是一次社会主义多元论的教育，是民主的体现，是政治辩论的第一次洗礼。

代表会议是一部巨大的天才作品，它的杰出之处是由与会者非同寻常的表现所决定的。代表会议要求并向我们展现了：工人评论家的才干、党的领袖不落俗套的思维、集体农庄主席广阔的社会视野、机床制造者——生产指挥员令人震惊的才智、科学家和医生才华横溢的进取精神、作家所表明
的公民立场、外交官对经济问题实质所具有的深刻理解。

代表会议显示出了，在才智和精神文明的民主竞赛中每个人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各自又有多少价值。尽管行政体制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长期肆虐，但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人民仍旧是生机勃勃的，世代相传的天才和创造性的基因得以保存下来，并积极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革新而积极工作。

代表会议证实，公开地阐明各种观点，有时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不会削弱我们，而是相反，会使我们更为强大。

代表会议在对国家领导人、党和改革投了信任票之后，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任何一个领导人现在都没有可以使他们躲避批评的个人掩蔽所，他们必须对人民负责。

最后，代表会议使我们从未如此清楚地看到，旧势力把自己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在限制和削弱官僚机器的权力方面所作的努力。

代表会议主张改变过分集中的国家领导体制，与这种体

制相适应的粗放经营方法现在已不适用，建议代之以现代的有效的民主体制模式。

代表会议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为社会提供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有效履行民主职能的典范。

代表会议直接参与了国家的生活，而国家生活也直接参与了代表会议。

外交部这次讨论会的目的不是树立官衔和等级的权威，而是树立有价值的思想的权威

我很希望使党代表会议的作用和精神传到我们这次会议上，使我们在对话时也能采取那么开诚布公、带有辩论性和竞争性的方式，最主要的是使之成为富于创造性的对话。使这种对话所追求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树立官衔与等级的权威，而是为了去树立具有重大国家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思想的威望。没有那种伟大的思想（我再重提一下总书记的话），就不会有伟大的政治及这种政治带来的重大成果。

为此，我想谈几句纯属个人的感受。我对代表会议的感觉颇深。当我在听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重温代表会议的材料和文件时，我总是想我们自己，想起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否胜任人民期望和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呢？要知道，在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阶段，没有精神上的重大突破，就不能解决改革向对外政策和外交提出的任务，不发掘和集中我们最优秀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

为在外交上求得重大精神突破，前段时期所作的努力不能令人满意

从改革一开始，我们就试图鼓励这种力量的发展。这是对外政策革新的美好时期，使人感到，春风宜人，万象更新。在这个时期里，举行了四月全会和党代表大会、巴黎和

日内瓦、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在这个时期里，发表了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和德里宣言；在这个时期里，制订了关于消除中、短程导弹和我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大胆决定。

在苏联外交史上，党的领导人第一次同广大外交人员集体会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到我们这儿来；在外交部的全部大会上作了报告，确定了我们工作的主要参数和方向。我们从结构上和实质上进行了改组，积累了新的经验，站到新的起点上。

然而，说真的，我从内心里感到不满意。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们“产品”较高的水平是靠小范围里的工作人员的巨大努力维持的。我们大楼里各层之间的思想交流明显地削弱了。

我们试图直接面向集体、听取他们的意见，结果反馈回来的是大量文字东西，而这些纸上的东西与群众的批评意见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我们决定再尝试一次。大约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开幕前一星期，我们再次请求全体人员就对外政策的改革、改革在我们部里、我们系统里进行得如何的问题发表意见。

外交部群众认为在部里尚未彻底摧毁阻碍机制

结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在短短的几天里，对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提出了800多条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和建议。

我和我的同事、我的同志们一样，都感到非常高兴。看到我们部里有许多人思想新颖、敏锐、不拘一格。特别可喜的是，大部分建议来自中下级的青年工作者。这意味着，我们外交部的改革有了可靠的保障，其前景是有保证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年来，思考工作未曾停止。改革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他们的成长，促使许多单位的集体壮大成熟。然而，人们不敢确信，他们的思想能够被采纳。要使这种力量运转起来，就需要某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因素、一种特别有效的激励手段。

这种刺激因素就是全苏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工作。

这次民意测验的材料成了我们这个报告的基础，毫无疑问，这是集体的劳动。

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所收到的材料的基调。这就是热情、关心和自我批评精神。特别明显的是批评的情绪。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针对对外政策和外交所进行的追溯性的批评并未降低同志们对当前工作状况所作分析的尖锐程度。他们指出，过分集中、行政命令方法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形成的阻碍机制目前还未被彻底摧毁。

在外交部有保守、单一化和宗派争斗等表现

在寄来的材料中，有不少例子，说明顽强的陈规陋习和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也有表现。党代表会议报告中提到的思维方面的僵化在我们这里是建立在单一化的基础上的。同志们写道，有时个人主动精神的缺乏也得到了弥补，但随着弥补而来的却是个人贪欲和野心的争斗，不是观念和意见的对立，而是小集团和宗派的对立。

我们的同事们讲，甚至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在过去都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就算是这样吧，但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同志不习惯于集体地和民主地讨论问题。有人说，在建议采取这些或那些错误步骤方面，并不是我们这个部门居于不光彩的领先地位，但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

对保守主义的根源进行探索时并没有不顾人性，这一点也令人感到高兴。我们是时代造就出来的人。例如，我不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但我非常清楚内心的斗争：当我们试图克服旧东西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否都正确呢？要知道，责任太重了，错误的代价也可能是巨大的。

当谈到国家命运时，出现各种各样的，有时是完全相反的观点，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

帮助人们克服教条，不要采用传统的生硬批评方式，而要在人的身上发现善良因素

重要的是要懂得这一点。重要的是要在人的身上寻找和发现善良的种子，并帮助它冲破教条和习惯的积垢而发展生长。不要用传统的生硬的批评、扣帽子、当众羞辱及在精神上不相容等方式来帮助人们摆脱教条和习惯。

既不要低估保守主义的危险，同时也要认清左倾冒进的危险，还要同样耐心地去防止想一举解决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企图。这种倾向我们这里也有。

应该明白：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提建议的人说，重新规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针，必须相应地修改一系列沉重地压在我们对外政策和外交上的观念，它们把一切都简单地意识形态化了。

人们对活跃科学、教育、文化领域里蕴藏的潜力寄予了特别大的希望。

在我们同行们提的大量建议中，涉及新政治思维、法律至上、建立法治国家、保障人权、通过全民讨论形成对外政策的宪法机制的作用等理论概念性的问题占有可观的数量。

有些建议使我们特别感兴趣，其作者写道，代表会议报

告中提出的具有革新思想的社会主义概念打破了垄断权。这种垄断权使单一方案、教条主义和自以为自己一贯正确的危险感觉趋于根深蒂固。

用什么来对付垄断权呢？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最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和不过份保密。

实际上，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提出过旨在使我们的工作“逃避”全民监督的建议。正相反，大家都主张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和外交部的活动中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

国内民主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外交决策过程要民主化

有一个思想是清楚的——国内民主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对我们来说，这首先是要使通过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决定的过程民主化。同志们建议采用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各种国际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的办法，由部长和部的其他负责人来回答代表们非正式地提出的咨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至关重要的对外决策提交全民评议，为此，可以采用全民投票及民意测验等形式。

至于说到外交部的内部工作，那么，民主化首先应表现为要保障各级意见的多元化，不要把首长观点过于绝对化，必须在作出决定之前，更广泛地吸收业务人员参加讨论。

这一切都真正符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符合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要求，即要吸收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要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加下，对世界客观进程和我们的可能性进行科学的

和公开的讨论。

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提高政治手段的作用，要求外交部大大提高国际形势分析水平，并赋予外交部新的地位

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在保障安全方面提高政治手段作用的结论给外交部带来了具有双重性质的甚为重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对自己所提出的关于国际局势的估计、有效性和可靠性所负的责任大大提高了。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我们整个集体应当把科学分析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质的水平。此外，更加需要建立一个能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做出现实主义的综合性分析估计的更精确协调的机制，这种机制要能够排除任何外来意志的压力。

为了实现这个设想，应该目标明确地、有计划地抓这两件事。

其次，为了在实际上保证政治手段的优先地位，必须用新的眼光来认识外交部在执行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保证其在制定我国的全方位的对外政策中有更高的积极性、责任心和效率。

对外政策也象对内政策一样，是由党和国家最高选举机构研究制定、由相应的对外政策机关采用其特有的职业手段来实施。这里特别需要集体制、同步性和创造性的合作原则。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正是这些要求需要清楚地划分职能。认为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制定的这个方针只适用于党、苏维埃、经济机构的相互关系，适用于立法、执行、司法权，那是不对的。这个方针也是直接针对对外政策领域的。在这个领域，严格划分权利、义务、职能也是取得更高的效率、更合理地组织工作的先决条件。

人们从国家的高度思考问题，他们具有高度的公民和政治成熟性。现在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三年的改革并非徒劳。在我们部里，改革也在与党和国家对外政策活动的同一轨道上进行着，其主要成果是推迟了战争的威胁。

二、在通过对外政策决定方面建立一种符合宪法规定的法治机制是决策上不犯错误的保证

我们的谈话对象很多。

当然，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自己，苏联外交人员，我们的外交工作。在象目前这样重要的阶段，从内到外地对自己做一番回顾并不是多余的。

今天，当外交工作任务急剧增长的时候，当外交上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候，外交必须寻求并建立同科学最密切的联系。

外交工作必须科学化和民主化

实际上，这里所谈的是科学与外交的融合问题。

这次会议直接面向科学及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这次会议被称作科学实践讨论会并不是因为这样说好听。

著名的学者参加我们的会议有助于我们进行对双方都有益处的对话，我们希望这种对话会推动硕果累累的新思想的产生，这样做肯定会刺激外交实践、科学探索及其相互渗透。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实际上是首位的、主要的对象——苏联公众，可以毫不牵强地讲，是全体苏联人。

同志们，全体人民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巨大的关注。全体人民对我们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迫切需要全体人民来参加对外政策的制定。

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帮会式关门主义态度、虚伪的保护措施和过份的保密，使人民和对外政策相互疏远

个人崇拜、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停滞现象、缺乏公开性、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变形、缺乏民主文明、社会精华统治论意识的残余等在我国外交的周围形成了某种“寂静地带”。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帮会式的关门主义态度、虚伪的保护措施和过份的保密、对外交部门内部生活的全然不了解、人为制造的绝对正确的前提在停滞年代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人民疏远对外政策，而对外政策又疏远人民。

苏联外交活动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为人民造福。它有义务将自己的一切向人民讲清楚。必须根据人民的期待、希望和意愿来规划自己的工作。它必须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行动和所采取的步骤负责。在我们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里，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准则。

向所有这三方面人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外交的实质，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演说和扫盲。正是在改革、革新政治、国家、社会结构的阶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出于实践的迫切需要。这个问题及其答案甚至同经济、经济的现状及所期望的前景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自然，我们不得不涉及过去，因为制定未来的方针要从对走过的路进行深刻的反思开始。

我们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党代表会议报告中所说的话来作为我们这部分谈话的开头语：关于苏联对外政策对祖国、社会主义和人类的巨大功绩。

由于有一些正当原因，如准备签订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去秋今冬紧张的谈判，使得我们没有召开纪念苏联外交工作70周年的庆祝大会。但是实质上我们用一系列出色的成就庆祝了它。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止一代苏联外交官的劳动和依靠他们的天才取得的。今天在座的有我们的老前辈，很多人和我们息息相通。我想代表我们所有人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以无限感激之情缅怀去世的人。在外交部前厅有一块纪念牌，那上面刻着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牺牲了的外交官名字。同志们建议给在斯大林镇压年代牺牲了的外交官立纪念碑，我们赞成这个建议。

出于对死者的尊敬和纪念，我们应该说出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被提到了。为了现在和未来，我们应该这样做。

触及这一方面将是相当痛苦的，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它能治好病。

大概，在此之前，需要商定一些从方法学角度来看极为重要的问题。

对历史要看阴暗面，也看光明面，考虑作出决定时的具体环境

历史好似浮雕，如果象看平面图一样去认识它，象看“壁画”似地看待过去，必将孕育着对今天极为危险的错误。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看待历史吧，既看到它的阴暗面，也看到它的光明面，正面和反面。

我们在审理罪行、迫害、滥用权力的现象时将毫不留情，这一切无可辩解。但也有一些决定同滥用职权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理解我们前辈在作出这个或那个对外政

策决定时的动机。

在谈到过去的教训并对此做出评价时，我们应该注意到采取某些决定时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性质和体系以及具体的历史环境。

十月革命后向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对此应正确评价

比如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现了向某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有些人根据世界革命、无产者团结的思想坚持要这样做，另一些人在将现实可能性同极其复杂的国际局势及当时的特点加以对比之后，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是政治错误还是情绪过于冲动？从今天的经验的高度我们应该如何评判它们呢？

我们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代人。我们应当记住，在我们的身后还有来者，他们也将评判我们做的事，我们所做评价的客观性和我们的失误。

尚未认真研究西欧一体化问题，是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失误

现在，西欧一体化的进程正在积极发展。从我们的民族利益考虑，这一过程将导致什么结果和将使我们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十分明显，迫切需要做出预测。但是，时至今日，我部没有一个单位、没有一个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这方面做了点工作，但没有深入的分析。

这不是失误又是什么呢？其后果对于我们可能是严重的。

没有预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大规模存在，也是失误

另一个例子是伊朗—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八

年，而这些年中我们一直在寻找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和方法。对事态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但是没有一个方案预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大规模存在。

是失误吗？无疑，是的。它会产生后果吗？可能的。人们不会顾及我们对待历史采取的严格态度，他们将对我们进行严格的审判。

外界不配合是外交上未能收效的客观因素

假如不进行认真的分析就对往事进行谴责，那就会流于庸俗的空谈。为了使今天对过去的评判不仅是严格的，而且也是公正的，还必须注意到在对外政策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单方面的行动可以达到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1917年宣布的外交公开性并未得到外界的支持。

再回想一下，1917年11月21日苏联政府向协约国国家、美国和其它几国大使提出的关于立即签订停战协定和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我们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提出的全面裁军计划也没有得到反响。1939年4月至8月英、法、苏为遏制法西斯侵略签订互助公约而举行的谈判也没有结果。

如果苏维埃共和国想与其他国家交往，举行谈判，缔结条约，那它就得被迫采用这些国家可以接受的形式。

我们必须回顾过去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以避免现在和将来犯错误和采取不正确的步骤。

必须回顾过去是为了懂得我们接受的是一份多么复杂的遗产，其中什么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摒弃。

在分析过去时，我们想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即我国整个外交的原则路线遵循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和平方针

所要求的总方向。

对于不少问题，我们现在就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是的，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也有这样一些问题，这样一些“空白点”，只有在双边基础上才能将其消除。

在宣扬意见多元论并全力支持它的同时，我们无权忽视历史进程的特点，许多力量参加这一特点的形成，其中也有我们的力量，但我们并不总是决定性的力量。

第二次大战前后，国际局势的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大国的行为

因此，在试图弄清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紧张局势产生的根源时，如忽略了这样一点是极为不正确的，即：尽管苏联的份量加重了，但国际局势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大国的行为，他们反苏倾向的加强，敌视和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的野心。

首次投掷原子弹这出戏的脚本所追求的就是这个目标。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结局成了推行核讹诈政策、战争边缘政策和赤裸裸的反共政策的序幕。

人类对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做出了它有罪的判决。但人类还需要彻底弄清楚，这两次轰炸是多么粗暴和严重地破坏了人类的面貌和生活，如何改变了人类通向未来的道路，使战后的发展急剧转向核武器竞赛，转向恐惧和捉摸不定的状态。

在评价我们那些年代的对外政策时，我们无权忘记这些。

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与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专横的做法，个人专权和占居统治地

位的经院式的思想垄断等问题给我们民族利益也带来不少损害。

在苏联，长期形成的是已变形的外交观念

关于外交问题，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待它的目标、职能和责任。无论这个问题看上去多么明了，对它进行再研究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对抗性的态度和行政命令、教条主义地把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化而在我们意识中形成的对这一职业的观念已变了形。

列宁的和平法令，不搞秘密谈判，号召实行公开性，这一切以其独特的历史音叉奏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主旋律。这样，它们也就直接促进了全人类进步的外交观念的确立。外交所面临的任务是：保证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主权的、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在最适宜于其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进行正常的活动。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并改善国家同世界上其它国家、同它所有邻国的相互关系。

苏联外交从迈出它的最初一步起就遵循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不是生存在世界之外，即使这个世界是敌视它的，它也还得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也要通过外交官来发生联系。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岁月，当它失去了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可能性时，我们的外交以自己的法令语言、用公布沙皇俄国的秘密条约、用苏联政府《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的方式同它对话。它通过那充满着坚信革命事业正义的抗议照会来同它讲话。

任何外交，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外交，都对外积极宣传自己国家的政治社会理想，它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在捍卫和发展这些理想价值的同时，外交也为国际法、国际往来和全人类行为准则和规范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家正是通过外交手段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国家借助于外交来适应周围的国际环境。在这方面，按照反馈法则，外交的最重要职能之一是影响周围环境，使之尽可能地适宜于自己的国家，当然不能损害别人。

外交应该知道许多事，擅长并去做许多事，但只有一件事不允许做，即：不准出现损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生存的形势。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战争，这是外交的失败。但即使发生这种转变时，外交也必须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尽快结束冲突和消除其不良后果。

正是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苏联外交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它卓越地显示了不墨守教条的态度，愿意并且善于实行一种从现实和时代要求出发的创造性的政策。

建立和加强反希特勒同盟、解决战后世界安排的宏伟任务，举行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国际会议，成立联合国等都是外交的光辉胜利。由于坚持不懈的努力，世界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达成了最重要的协议，这也是苏联外交的功绩。

写入外交成就史册的有：同联邦德国签订的莫斯科条约，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议，为全欧进程奠定了基础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让我们回忆一下苏联外交在提出和解决消灭殖民地体系问题上的作用。

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富尔敦演说，从此开始了“冷战”，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对这段时期，我们也应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是否做得都对？从整体上说是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完全利用一切可能来限制冲突的规模和尖锐程度，防止出现“铁幕”，这些使我们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果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彼此之间就是不诚实的。

国内生活变形必然严重影响对外路线，30年代的大清洗玷污了苏联的国家形象，动摇了外界对苏联的信任

坦率地、公开地分析苏联外交政策的历史可发现一种成为规律的现象，即30年代及随后一些年代，我国国内生活中出现的变形必然对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路线产生影响。每当国内政策背离列宁主义的原则时，就对苏联外交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30年代无法无天的镇压活动动摇了人们对苏联立场和倡议的信任，给苏维埃国家的形象抹了黑，给我们的对外政策投上了阴影。

由于歪曲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准则，错误地估价世界进步公众的能力和作用，使情况更加严重了。由于把欧洲社会民主党简单地看成是法西斯的帮凶，结果破坏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报告对战后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对苏联外交形象和 behavior 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行政命令方式；轻视专门的、职业的知识；在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共同问题上那种不民主地、坐在办公室里凭个人意志采取决定的作风；在对抗帝国主义方面首先考虑的是用军事方法，而不是政治手段；不善于识破帝国主义的策略，它想把我们拖入军备竞赛，以便从经济上拖垮我国的打算——这一切给我们的外交，同时也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外交的一些基本职能，大权旁落

对外交来说是一些最基本的主要的职能渐渐地遭到侵蚀、旁落、转移、被迫托付给其它指挥部门。

结果，对世界的现实情况及世界上正在形成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形象（这个形象是根据其对内对外的行为方式形成的）的视线减弱了。

结果，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种倾向，即忽视职业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性质，发展趋向及结构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是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及我们社会精神道德和社会政治价值的。

我们今天花费这么多的力量去打破的“敌人形象”，与苏联人民的实际形象是完全相反的，与苏联人民友好、勇敢、聪明、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品质是格格不入的。镇压活动，“我们要埋葬你们”之类的声明，在朋友关系上采取不正确的做法和在缓和时期宣传错误的，（要我说是反列宁主义的）关于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观点——这一切破坏了人们对苏联人民建设性的和平愿望的信任。

对外政策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但它的含义是否同人民的利益和福利总是相一致的呢？50年代形成的“关门”习惯导致了在80年代初仍然按老框框的行为方式办事。当时，由于退出日内瓦谈判，结果在欧洲更加迅速和轻易地形成了第二条与我们相对峙的战略性的战线。

必须确定外交决策民主化的机制

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建立宪法授权讨论和通过最重大的外交决议的机制的建议，是我们人民饱经痛苦之后得来的；它是我们饱尝了阿富汗的沉痛教训和生活水平下降之苦，由于损害社会主义良好声誉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理想之苦后得来的。

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关于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由人民选举的机构进行监督的决议也是我们的外交饱经痛苦的结果。全面执行这一决议将恢复外交的威信及其本来所具有的职能。

这是在内、外条件都对外交最有利的条件下，在4月后的革新气氛中，由于国际关系调整产生了现实的成果而发生的。

这是在斯德哥尔摩共同商定要在军事领域采取信任措施，要把全面监督的裁军进程确定为国际关系准则，重新评价人文合作在保障和平与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传统看法等一些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发生的。

新思维为外交政策确定的方向：全人类价值观念占优先地位，利益均衡，同等安全等

新思维已经为我们对外政策规定了方向。现实主义，利益均衡，全人类价值观念的优先地位，有利于所有人的同等安全思想以及同所有的人平等对话，国际法的领导地位，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政治手段同所有其他手段相比应绝对处于优先地位——这一切已成为制定对外政策战略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为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前提。

对话，需要通过降低军事对抗水平和互相照顾对方利益才能使国家安全得到最为可靠的保障这样一种认识，准备相互之间实行深入的监督——这一切都有助于打破一个十分牢固的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封闭圈。在和平的气氛中，信任的成份一再增加，而公开性和改革为增加这种信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近三年来，大量的证据使人类信服，我们决心坚持不懈地执行在2000年之前分阶段地销毁核武器的计划，全面安全体系，实行自由选择，建设“欧洲大厦”的思想，实行足够和非进攻性防御的思想，调整亚太地区关系的主张；解决地区冲突，从别国领土撤出军队和军事基地、采取信任措施并把科学直接引入世界政治的主张。

在一系列说明我们为争取建设新的和平大厦作出努力的论据中，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本身大概可说是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了。

从代表会议的文字和精神来看，我们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决策机制，以便能最有效地保障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

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

销毁中导和就地视察协议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飞跃

几周前发生了一件事，其意义和范围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这是指为检查苏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协议执行情况而派遣的监察小组开始了工作。

不久前还是绝密的设施接受了监察人员的视察，这已经被看作是国际生活中的一般准则。

这一事实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次巨大飞跃：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转向如何在国家关系方面用新的标准来看待国家安全的一次飞跃。

世界正学着按新的准则生存，因为按旧准则行事，世界可能会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

这些准则要求明确民族利益同其他国家合法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别把自己的安全同共同的安全分隔开。

现在发现，如果我们向外国监察人员打开制造核武器的“作坊”的大门，同时，我们自己也迈进外国核设施所在地的门坎，我们的民族利益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保障。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但这却是事实。

同样如此，销毁我们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同时也销毁美国的导弹，这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还提高了我国安全的门槛。阿赫罗梅耶夫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论据。

传统的观念是难以接受这种现实的，因为这种传统观念所依据的是另一种传统的公式化的信念。即：国家军备越多，它防御任何突发性事件的可靠性就越高。

新的政治思维作为一种哲学和谋求安全世界的一种工具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仅是指国际关系的实践而言。新的政治思维的原则已经成为国内革命性改革的基础。只有这样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明显地说明，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直接取决于其内部事务的。

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

在这里，我们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到有许多极其重要的观念，归纳起来就是“民族利益”这一概念。

民族利益这个概念同相互依存的统一世界的客观发展趋势，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它是极不稳定并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

党的二十七大关于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革命性结论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这一概念。根据这种观念来看待事物，和平共处的哲学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原则就获得了新的内容。

新思维是在核时代现实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一原则的。我们有充分理由不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不能把建立在诸如互不侵犯、尊重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之上的共处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这当然并不否

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和国家政治取决于其统治阶级利益这一原则。但是，这些阶级利益能够而且应当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公分母。

总之，当把国际关系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时，就很难承认作为最高普遍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也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了。

选择自由是新思维的重要内容，苏联的民族利益要求促进世界的多样性和一体化

正如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所强调的，选择自由的思想在新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客观的，而作为已被历史所淘汰的实力政策及其各种形式和表现，其中包括镇压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是不可接受的。

这一思想的确定和在实际中的运用符合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利益。

要正确地评价和保障自己的民族利益，就必须认清和理解人类发展的总趋势和方向。

如果说，这样一个论断，即世界正日趋统一，它是多样化的和相互依存的，是正确的，——而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得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民族利益要求促进这一进程。

如果说，这样一个论断，即每个民族只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就能够使自己得到发展，是正确的话，——而这毫无疑问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利益就是要成为世界上的一股促进统一的力量，在全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领域中促使某些一体化因素得到发展。

如果人类正在走向多样化的统一，走向一个能自由选择自己道路的彼此平等的大家庭——毫无疑问人类在走向这一目标——那么，我们的利益就在于要竭尽全力加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特性和本质，增加它对其余世界的吸引力。

两种制度的对抗已不再是当今时代的主导趋势，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能否在高科技基础上加速并公正分配物质财富，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

如果说，今天人类只有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才能够生存下去——毫无疑问在不断对抗的条件下人类是不可能确保自己的未来的——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再把两种制度的对抗看作是当今时代的主导趋势。

现在，世界大家庭各国之间越来越增强的相互依存的趋势日益突出起来，这是由世界上当前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完全以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形式进行”^①。

在现阶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能否在先进科学和高级技术与工业基础上加速增加并公正地分配物质财富，能否共同努力来恢复和保护人类自我生存所必需的资源。

社会并不因为转而采取了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这些能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要在竞争中发挥能自我发展的潜力，用自己的经济成就以及更高的个人和社会劳动生产力来证明，社会主义要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制度都能给人以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民族利益。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及其一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译者

切有关方面只能这样联系起来看，也应当这样联系起来看。
国防建设要同对外政策民主化相联系，军事和政治有时不一致，是消极影响苏联国际地位的重大因素之一

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国家安全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有些初看起来甚至是相当突然的。

无论从方法论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的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把国防建设问题同对外政策民主化联系在一起，把它同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来阐述。

正如党代表会议所指出的，在停滞时期，对我们的国际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的最不良的现象之一，就是在过去有时出现了军事和政治方面不一致的状况。

国防是一个国家优先考虑的主要事业。它是如此之严肃，以至于不允许我们对它进行肤浅的议论，因为它肩负的使命是要可靠地保护人民，坚定不移和毫无失误地保证苏联人的生活及和平劳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对我们占有军事优势，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出的关于战争的**危险能被推迟的结论，与战争的**危险未被消除的论断并不矛盾****，对此，不应存有任何幻想。

贯彻争取消除核武器的行动纲领，还存在着阻碍机制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深刻地分析一下，我们国家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为现实的是，这一危险有可能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发生，因此，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以使这种武器根本不复存在，在1986年1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声明中就提出了这一目标，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党的二十七大会上这一目标被宣布为今后我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方向。

我国外交界对此表示热烈支持，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行动纲领。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这一纲领，并且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取得某些成果。但在这里，也存在阻碍机制。其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存在某种反对势力，而是因为旧思维在作祟，是因为存在着一些过时的职业性观念，是因为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进入了我国革命的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其国际条件与以前各个革命时期的国际条件大不相同”^①。

在此，需要对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伟大的卫国战争对我们有关安全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争取自由与独立，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而这些教训为我国的安全规定了一些重要战略体制，首先是军事战略体制。但从最新经验来看，我们认为，其中有很多教训还没有得到足够明确的再思考。

现在看来，这里有很多教训至今仍可进行公开讨论。显然，这里不必把它当作我们的话题。但是，我们认为，昔日经验中某些最重要的方面是应当结合今日的现实来进行探讨的。

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先进科技而非武器储备数量优势

世界大战表明，遭受进攻的一方的武器储备对于抵御侵略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先进的工业和科技基础，那么，侵略者的任何优势在这里均可能化为乌有。

战争的经验还证明，一个国家制造崭新一代的武器装备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思维，1988年2月18日在苏共中央全会的发言》。莫斯科，1988年版，第41页。

的能力和生更有效的质量的武器系统以及通信和管理系统的能力在技术水平上可以决定冲突的结局。

战后的经验开始对使用力量的可能性这一观念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修改。即使拥有优胜的力量，也会使侵略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无法取得预期的结果，相反，有时却象飞去来器那样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地位。

在此，不能不回忆起，伊朗和伊拉克的边界问题当年不是通过外交途径、政治途径解决的吗？当时不也曾经找到了相互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吗？那种想依靠军事手段来修改外交决议的企图只能给伊拉克人民和伊朗人民都带来悲惨的结果。

仅凭一些传统的标志，而不考虑该国人民反抗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或是仅凭一些肤浅的统计资料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强与弱，那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十多年来，所谓的小规模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给使用武力的一方带来什么持久稳定的政治成果或其他什么成果。恰恰相反，他们双方及每一方都使产生冲突的问题复杂化了，并制造了新的问题。倘若说，世界地图有所改变的话，那也只是在极微小的细节部分。而且这些改变不具备任何政治和法律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的存在，甚至是交战中一方拥有这种武器都不会对局势产生影响。

在核太空时代，使用武力已毫无意义，应建立全面安全体系来抵御武力

据此，可以断言，在核太空时代，战争和军事冲突在客观上已丧失了它们作为合理的政策手段的功能。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这种威胁才会迫使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在行动

上做出某些修正。

在核太空时代使用武力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人们还有可能在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上来抵御武力，这样一个总的结论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能够从广阔的哲学角度上提出建立全面安全体系的问题，这一体系意味着对国际关系实行深刻的民主化和对众多的发展过程实行国际化，而且旨在加强世界的整体性。我们认为，联合国在这一体系的建立中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不准备详细阐述这一体系的原则，只想提醒一句，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他的《现实性和安全世界的保障》一文中已经提出了建立这一体系的方案。二十七大于建立全面安全体系的方针不仅在雷克雅未克取得了意向性的突破，而且得到了事实本身的证实，即：签署了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也就是意味着开始了实际上的裁军。**不以数量而以质量标准来衡量国防建设，是“合理的足够程度”国防概念的中心**

为研究这一构想的各个方面而进行的讨论中，“合理的足够程度”这一概念包含什么内容成了中心的问题。

我们认为，党代会的杰出意义就在于它主张不论是在技术，军事科学方面，还是在军事力量的组成人员方面都要以质量的标准衡量我国的国防建设。

不是数字，而是技能，不是数量，而是质量，是普遍的发展程度和高水平的科技工艺的基础结构，而不是武器和军事人员的数量指标——这才是我国可靠的国防及其安全的保障。

质量参数应当置于首要位置。一方在工艺、经济上的优势会增加另一方受损伤的程度。

“合理的足够程度”和非进攻性国防这样的构想确实立

足于理智和清醒的思维、出于为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障的担忧因而提出的一些要求。

要知道，除了其他诸种因素之外，西方在把军备竞赛强加给我们时，他们怀有的动机之一就是指望在经济上拖垮社会主义。当时，针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曾经多次夸夸其谈地声明，我们准备应付任何挑战。

现在真理已经十分清楚，正如1986年5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全体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战略家头脑里和行动中根深蒂固的方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似乎苏联应同任何一个与之对立的国家联盟一样强大。遵循这样的方针显然是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

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相应地改变对保障我国安全的途径、方法和手段的态度。

我们共同认为，战争不可能成为实施政策的合理手段。

但是，军备竞赛能否成为这样的手段呢？不管多么离奇古怪，但它是能够的。是的，军备竞赛能够使敌人消耗国力，一蹶不振。的确如此，它也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损害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这一结论已经如此明显，以至于如果我们对此避而不谈，或仅仅是蜻蜓点水似地谈一谈，就绝不会有利于我们巩固自己的安全。

应突出国家安全的经济观点

在政治和经济的交接点上，国家安全的经济观点就比较突出起来了。正因为如此，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安全这样一个问题就绝不是什麼烦琐的空谈了。

答案是正确的，而同时又是传统式的：一个国家的安全

——这首先是保持一支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它能完成一个国家军事战略所规定的使命。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即这一战略思想要能现实地和最佳地规定武装力量的使命。

但是，正如每天的实际情况向我们所证实的那样，这一切尚不是全部的答案。因为武装力量完成其使命的能力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直接地和主要地取决于强大的经济和高度发达的科学。

今天，对于国家的安全起决定作用的与其说是它的武器储备，不如说是它制造和生产新武器的能力。换言之，它取决于科学思维的潜力，工艺能力的潜力，生产设备的潜力，专业人才的潜力。

倘若不把改革的机制发动运转起来，那么就很难谈得上保证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对于现实情况和威胁应有正确认识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二十七大会上正是这样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强调指出，在今天，安全更加需要由政治手段来加以保证。在具体实践中，这些手段就是要限制和削减军备的过程，实行可靠的监督体系和采取日益扩大的信任措施，同时还要缓和与调整冲突的局势和消除国与国之间在相互关系上存在的危险的刺激因素。

为使我们能有效地朝着这些方向努力，我们应该，首先是为了自己，对现实情况和威胁要有一个正确认识，而这些威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制定那些意义深刻的决议的依据。

缺乏准确的、全面的和真实的统计数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妨碍执行一项明智的经济政策。如果没有全面和真实

的信息，对外政策也不可能是合理和有效的。

在谈到信息的准确和全面、谈到公正和不带偏见的分析时，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提出要求。然而，就是我們也需要同行们的帮助。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不仅仅是外交部的事。我们对外政策近些年来所取得的一切实际成果都是党领导下的几个对外政策部门相互协商和很好协调配合的结果。即使出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它们也可通过务实的和同志式的讨论得到解决，这些讨论是公开进行的，充满创新精神，而且是体现集体领导的。

这种相互配合行动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尤为重要。

国防应同外交紧密配合，国防建设中的原则性革新主张应在外交部进行验证

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能指望有特权来知道一切。但对于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是应当知道一切的。对于国防建设中原则上的革新主张都应在外交部进行验证，检验其是否同现行的国际条约和我们所宣布的政治立场保持法律上的一致。

根据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建立宪法授权的机制的决定，必须实行这样一种立法程序，即一切从事军事工作和军事生产的主管部门都应受到最高全民选举机构的监督。这也涉及到有关我们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有关国防建设的计划和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军事预算是否公诸于众的问题。

在外交部举行的调查中，其参加者们指出，过去军事领域是不受民主监督的。在极端不信任和普遍猜疑的条件下，军事上任何一个不慎的举动都可能使国家付出昂贵的代价，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在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轻重缓急次序时，苏联领导人把裁军放在首位：核武器、化学武器、常规武器的裁军。

有必要再重复一遍，这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取消大力加强国防的需要。苏联人的和平应该受到可靠的保障。这里谈的是国防的基本原则问题，在现代条件下应怎样理解这些原则。

就此，作为提出的问题，我想谈点想法。

各国的军事活动都不应超越本国国界

为了共同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利益，应该用国界来限制各国的军事活动。我们已经表明了这一立场，并已在付诸实践。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这一思想也反映在关于消灭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解散相互对峙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建议中。

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协议和协议的实施，不论对苏联，还是对欧洲、美国和所有其它各国，毫无疑问都是有利的。

我们把它看成是对巩固国家安全的重大贡献，因为它推开了美国在我国边境地区的核存在。而且不仅仅是推开了，还消除了今后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这两种导弹的可能性。如果考虑到这些导弹对我国和美国的安全有着不同的作用的话，那么这的确是个重大的成绩。

部署中导为在欧洲建立反苏战线帮了忙，发展化学武器耗费了大量资源

但是，当我们为此高兴的同时，不能不记起：在欧洲，建立反对我们的第二条战略战线时，我们也帮了忙。如果我们当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正确的估计，它的出现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我还想举这样一个例子。近十五年来我们在追赶“化学

浪潮”时是遵循的什么思想呢？这耗费了巨额开支，占用了大量生产能力、劳动力和资源。

有谁计算过，为这种活动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而现在，为了销毁化学武器，不得不为此再花费资金来建设相应的设施。

最后，我们在不断积存我们自己称之为最野蛮的武器时给我们自己和国家的意图造成了什么印象？国家的声誉和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有人会说，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关心，我们要对他说：这是对什么能加强国家，什么会削弱国家这一问题的最粗浅和歪曲了的观念。

即使只具有最起码的技术知识也足以使我们明白：化学武器对于我们和欧洲国家要比对美国更为危险。在这一领域竞争的结果是对他们有利，因为地理条件也对我们不利。

这种例子还很多。

外交决策要算经济帐

现在来谈谈另一个对国家安全来说也同样重要的问题——政治决策的经济价值问题。关于对外政策的经济收益。外交政策中的每一步骤都有自己的价值，或者是能给国家增加些收入，或者是从国家福利预算中挖出些东西。有时挖出的东西太多了。在政治天平上粗暴草率抛出的砝码总是使得指针急剧地移向减号。

还需要研究，为了防止与中国的对抗我们是否做了应做的一切呢？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抗使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付出了什么代价？

到了该学会考虑这种或那种政治模式的经济帐的时候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还要谈，现在暂时回到裁军问题

上。

早在80年代初就应建议在欧洲安全方面建立全新的关系

我们已经确信，在裁减军队和欧洲常规武器方面采取积极开放的立场是多么重要。解决许多重大安全问题的钥匙就在于此。

在华沙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建议为东西方关系中开始历史性的转折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可能性。目前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维也纳会晤上，在那里，应为欧洲裁军和信任措施的谈判开辟前程。我们相信，这一期待已久的目标已临近了。

我们的纲领比任何时候都宏伟。其主要目标是消除各方最大的忧虑，在欧洲安全方面建立另一种全新的关系。

当然，很难说下一步事情会怎么样。实际上目前北约对这一谈判还没有个一致的意见。也许，他们是有意拖延。但无论情况怎样我们都不妨问问自己：是什么妨碍我们不能早一些，比如说在80年代初提出类似的计划呢？要知道，即使在那时它也不会与我国的安全，我们朋友的安全利益相矛盾。看来，对抗的情绪是太强烈了，它使我们甚至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利益。

对我们来说，这里还有另一点。我们是否为自己吸取了教训，是否认识到了在限制和裁减军备上所失去的机会使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毫无成果的谈判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西方很有可能有意将裁减中欧军队和武器的维也纳谈判引入死胡同。但我们似乎也不由自主地配合了他们，谈判进行得不够灵活机动。

14年的谈判毫无结果，这不仅是放过了现实的机会，而且也是败坏谈判原则本身的名声。

要改变国家安全问题为少数部门垄断的局面

假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解释不被某几个部门，其中也包括外交部垄断，而且这些部门过去又是不许批评的，许多类似的损失本是可以避免的。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就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也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环节问题做了阐述。报告中说：“在改革的年代里我们改善了，或第一次同许多国家，有的是邻国，有的是相距甚远的国家，建立了关系。而且同任何国家都没有搞坏关系。”

我想，不妨说，这些话中表现了唯一正确的和标准的外交生活和活动方式的公式。这就是改善接触，建立新的关系、不破坏现存的关系。

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找到朋友，至少也要不为它树立敌人

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国家寻找并找到朋友，至少不要给它树敌。这个任务又被新的内容所丰富了。与之相应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手段也扩大、丰富和完善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发达的轻重缓急的次序：

- 首先要大力全面地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 实行同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加强接触的方针；
- 就世界政治的主要问题毫无例外地同所有国家进行积极的对话和谈判。

我的任务不包括对这些先后次序全面地及逐项地做具体的分析。但是，我认为必须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观点来看待国家间的关系。

要扩大、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同盟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在今天，更确切地说，尤其是在今

天，在改革和革新的阶段，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我们巨大的、无价的财富，同时作为和平和进步的因素，也是人类的财富。

扩大它，完善和发展同盟关系，这意味着使和平更可靠、更安全了。这意味着变得更强大，就能保障我国调解争端的方针得以实现。

我们正在各个方面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

在思想领域接受还是背离这些方针对于社会主义共同进步的目标来说并非无所谓。

在经济领域，保障科学自主和技术工艺独立是未来不必为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命运担忧的最重要保证。大家庭国家协同一致共同步入科技进步的先进行列，使经济一体化的发达形式符合时代的要求，扩大直接的科技和生产联系，同西方经济同盟搭桥终于被列入了计划纲领。

在上层建筑领域，也确定了新的协调一致的立场。社会主义生存保障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和社会方面、青年、工会、社会组织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我们无权忽略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唤起的精神上的共同情绪、希望和热情，把它们看作是某种非实质性的东西。不久前我们在华沙看到的美好感情的迸发，明显地清除了贫瘠的土层，为美好未来之幼苗的茁壮成长开辟了天地。但这也不能免除我们以批判的态度认识过去的责任。

我们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的结构是在战后最初的十年中形成的。自然，这种结构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特点、反映了对联盟义务的性质、规定这些义务的法律程序的特有的观念。

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共同商定的相互关系准则在过去远未经

常得到实施

在随后的时期里，为在平等、尊重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加强兄弟国家的联盟做了许多事。在这方面可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声明。

但是，在实际上，共同商定的有关相互关系的政治原则远未经常得以实施。集体原则遵守不够、形式主义、讲排场、对发展的特点考虑得不够、不善于对其进行分析研究等都给共同的事业带来了损失。

苏共四月全会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具有了新的政治水平。它的特点是充满活力、真正尊重独立的权力，充满平等和重视相互经验的气氛。

大家庭各国都经历着一个探索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道路的非常时期。困难积累得不少。但是，现在当新政治思维在兄弟国家也受到支持的时候，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变化。

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已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一种模式

在和平共处被宣布为国家关系的最高的普遍原则，而自由选择成为新政治思维的核心内容的条件下，越来越有必要对一系列刻板观念重新予以认识。

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过程中，许多问题得到了答案，也对许多问题提出了答案。

直到阿富汗领导人于1985年底最终确认四月革命的性质为民族民主革命并在此基础上现实地对其前景做出估计之后，政治解决才成为可能。

民族和解政策应运而生，其意义不仅限于阿富汗一国。

我们相信，阿富汗问题将按照有利于阿富汗人民的方式得到解决。我们的军队正在撤离。在阿富汗的20个省份以及

象贾拉拉巴德城这样重要的地区中已经没有我们的部队。纳吉布拉主席的政权正在显示其生命力。

在这个地区冲突迭起的错综复杂的世界里闪射出一道光芒,出现了一种模式,一种独特的解决问题的“示范方案”。

当然,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因此解决的途径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然而,卷入冲突的各主要方面之间的谈判,建立国际保证制度、民族和解——这一切都是很宝贵的政治经验。

对纯心理因素也不应当忽视: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探索解决其他问题的途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可以说出现了“前进的浪潮”,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形势。

在中美洲,一系列最复杂的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公式。解决方案已开始付诸实施。其进程虽然异常错综困难,但毕竟在前进,当然,这使人产生了希望。

关于柬埔寨问题,提出了以民族和解政策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这方面总的趋势是积极的。

我们承认常常滥用“突破”这个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用这个词来说明目前正在举行的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多方会谈。政治机器在这里也终于开动起来了,它为实现安哥拉的和平以及纳米比亚的独立带来了希望。

现在说两伊战火很快就会熄灭也许为时尚早。但是,我们愿意相信,伊朗同意接受安理会598号决议,这意味着对这个国家,也是对伊拉克,迈向和平的道路已经打开。

越来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近东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可能出现转折的政治局势,最终将导致在集体的基础上全面解决问题。

塞浦路斯问题也在向好的方面转变。

在朝鲜半岛上进行新型的对话的条件似乎正在成熟。

毫无疑问，缓和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的进程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充满曲折，然而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广泛展开。同志们，阿富汗产生了“连锁反应”。

我们的外交必须全力以赴地推动和平的进程。我们将忠于列宁的原则：一个国家坚持什么发展方向，那是这个国家的内政。它自己应当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发展模式。而我们则继续忠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想，同时并不输出革命。

存在着另一种进出口，这是另一种唯一可行的援助与合作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在实际上支持一个独立国家的发展成长。更为正确的做法是，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估价一下，这种援助的效果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的能力，我们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的现实程度如何。

国家形象取决于国家的政策总目标及其价值观是否符合全人类的观念

在此，我想谈一个，据我所知，极少有人研究的问题。

我指的就是国家形象问题，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在当代的文明世界中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指的是国家声誉问题，它是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其他国家来说，某一个国家的形象如何毫无疑问并且首先取决于它推行的政策的总目标是什么，维护与实现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这些价值观念和理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占主导地位的全人类的观念和准则以及它自己的所作所为。假如有谁声称，他不能放弃一些原则的话，那么，他必须懂得，这些原则应当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在公民的衣食住行和福利上，在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以及在维护他们的公民

权利上通过物质形式表现出来。

同志们，不应做出一种样子，似乎国际社会的准则，在其观念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通常被称为文明行为的东西与我们无关。如果你希望为国际社会所接受，那么，你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和观念。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政治中的道德，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的统一等，这些问题都极其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

这怎能不使我们想起，年轻的苏维埃外交刚一起步便赢得了十分崇高的威望，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制定的进步方针，而在这些方针背后，在周围世界看来是个公正的、正确的国家。这个国家言行一致，为它所宣布的价值观念服务。

让我们回忆一下，关于我们的国家，世界舆论的浪潮是如何大涨大落的。

十月革命。“不准干预苏维埃俄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支持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全世界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我们的革命中看到了希望的火花和新时代的曙光。

30年代。大清洗破坏了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公正和正义的信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法西斯。对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巍然屹立的并将世界从前所未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苏联的感激、好感、热爱和尊敬再次达到了顶峰。

以后在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中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

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它们使我们，使我们国家的美好的名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今天我们正在建树这样一种对外政策，它应排除我们的行为违背我们的理想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的祖国正以另一种姿态呈现在世界面前。人类看到了她的新面貌。我们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继承了一份沉重的遗产，而且在短时期内无法扭转这种局面，但是，的确值得惊叹，我们国家的美好名声恢复得多么快啊！

令人吃惊和感到高兴的是，世界舆论对我们的改革预先就表示要给予并会给予巨大的信任和支持。

但是，正如常言所说：在自己的祖国却找不到预言家。

有时，可以听到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份重视来自四面八方对我们的议论。对此，我想强调下面一点。我们在去伪求真的同时，不能对人们是如何谈论我们，对我们怎样想的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的自尊自重，我们的良好处境，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周围世界对我们的态度。

国家形象也取决于国家对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所采取的态度，苏联改变了对待人权问题的态度

而且事情不仅如此。假如你自己都不认为你生活得正确和正直，那么，你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不尊敬自己，就无法在经济或精神领域取得大的成就。国家的形象就是国家经营管理的样板，国家通过它才能而且应当影响世界事务。国家形象就是国家对待本国公民的态度，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承认个人的主权。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把这个问题也作为一个关系到改革成败的最重要问题提出来。

我们之所以在对待人权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态度，并非因为有人向我们施加压力或者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投机，而是因为这种态度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和原则。

一切依法办事，而不依据某个人，哪怕是最高首脑的意志办事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规定了改革法制结构的严肃的任务，建立这样一种法律保障机制，它要保证一切依法办事，而且只能依法办事而不是依据某个人的意志，哪怕是最高首脑的意志。

这首先涉及到建立宪法规定的机制，修改刑法，制定一些关于新闻出版、信仰自由、出入境以及其他一系列已经开始的和计划要进行的工作的法律文件。为了使无罪推定、诉讼辩论、保证充分行使辩护权等项原则得以完全确立，必须进行大量的工作。

我们决不想对法学家指手划脚。我们只是在为捍卫我国对外政策利益所必须的范围内涉及法学。为此，我们需要司法部门在自己的活动中也采取无暇可指的立场，忠实地执行同我们的政治声明不相抵触的法律。

除了实践之外，还应对一些极为微妙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这些问题至今只是一般地解决了，没反映出其细微的差别，因而常常演变成为相当尖锐的问题。

将社会、公民的积极性与捍卫国家利益这一传统职能结合起来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公开性与民主化的浪潮上泛起了另一种，我认为从生态学上说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对公开性和民主化本身也有害的催化剂。

需要找到这样一些界线，以便使做为社会、经济和法律权利载体的公民能够毫无畏惧地行使这些权利，在任何专横行为面前得到可靠的保护。

而另一方面，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应被视为是非法的。

不要生造“敌人的形象”

我们深信：事先就主观臆断地对某件事概以粗鲁的老套是根本错误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自己的屏幕上反映出自己制造的“敌人的形象”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在排除任何虚幻想象成分的条件下把事物发生的客观情形再现出来。

各种各样的“敌人形象”妨碍在道德和文明的基础上改革国际关系、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以及准确地考虑利益。我们采取了降低对抗水平的方针，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说：

“让我们做个诚实的论敌，但不做敌人。如果你们愿意和平解决我们之间的争端，那么，我们也可以作你们的伙伴。”

这里显示出了一种力量。智慧与远见的力量。但决不是软弱。

四、加强同科学与文化的联系， 同社会公众的接触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阻碍新思想涌现的制度必然灭亡。

在一些主要大国从工业工艺社会转向科学信息社会已成为客观现实的情况下，用种种教条和禁令来束缚智力的发展将导致国家的落后。

脑灰质的价值剧增，对政治也成为催化剂，在政治领域，不经深入全面的科学研究已经不能就最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

对外政策应该多样化

如果想做到彻底开诚布公，那么就应当承认，我们过去以及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些外交政策理论、概念及思想都纯粹是出于暂时的考虑。正如在党代表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与科学毫不相干的和不必要的课题被强加在它头上。实际上，科学也被迫脱离了外交“生产”。充其量科学或者是在并行的航道上与外交并存，或者是跟在后面对已经提出的倡议提供论证。

请同志们不要见怪，对于造成对外政策的单一化和愚昧的绝对化的状况，外交界是可以对某些学者提出指责的。

多样化与科学中的垄断是不相容的。

最近三年来，情况有所好转。

在四月全会和党的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要求我们以崭新的态度对待外交上提出的实际任务，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参加了制定新的方针立场的工作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又有多少谦逊的、没有被冠以科学工作者这个崇高称号的杰出的战友呢。

我们认为在科学界不仅有内行的伙伴，而且也有可靠的盟友。由于科学思想国际化，科学成了国际关系中独立的主体，成为消除对抗和停止军备竞赛的一个因素，它才获得了这种可贵的品质。对外政策和外交直接关心恢复全世界科技人员之间的团结，关心思想的自由交流，它客观上能消除敌对和不信任的壁垒。

过去，政治家曾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今天，政治家们没有权利再充耳不闻了。

苏联外交对苏联和世界科学界开放

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对苏联和世界科学界是开放的。这

里说的是，如何使科学直接加入我们的行列。

在政治方面，就是要实现党代表会议确定的关于使科学直接进入政治的方针。

而从职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合作的体制、形式，确定相互利益的衔接领域和范围。

应该在互利的、经常性的、有计划接触的基础上实现加强对外政策的科学基础的任务。

谈到最一般的形式，这就是既要在对外政策的关键方向上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在采取任何一个重大外交行动之前，预先进行专家们的研究。

对此科学家们有自己的建议，我们也有自己的建议。显然，不应把它们看作是永远不变的经典。对外政策是灵活多变的，科学的建议也应当如此。但尽管如此，也应有精确的计划。

现在谈谈体制问题。一年前，我们成立了科学协调中心并开始了工作，它的使命是保证同科学界，同国内外的科研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有人建议成立负责科学技术合作的专门机构，它可以研究一切对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内容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譬如生态、可供选择的、能量来源宇宙等这些已经成为外交谈判、国际关系中的课题的问题。在停滞时期，我们忽略了急剧地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分布的工艺上的突破，这一惨痛的教训促使外交更为敏锐地注视着现在和未来。

关于在合同的基础上、按照实业界和创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的原则同科学建立联系，并明确规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主张是很有希望的。在有关伙伴关系的协议中也可以写进物质财政方面的义务，关于在部的协助下组织人员出差和

交流问题并由它负担这项开支。对此应当认真加以研究。

顺便指出，在科学领域的对外联系方面，我们在办理出差手续中限制过多、官僚主义已成为特有的现象。

我们认为，科研机关在交往方面应当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恢复原来的做法是适宜的，即：让一些最有天才的科学家长时间在国外的主要科研机构中工作，也让这些机构的代表人物到我们这里来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同国际实验室的合作经验是很有意思的，苏联外交部和科学院对促成这一合作给予了不小的帮助。

这次会议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外交工作中有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当然这远远不是全部问题。

在对外政策的历史和理论方面：对过去的经验作出科学的分析，研究“空白点”和“污点”。首先可以拟一份清单，列出至今仍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寻找必要的资金、建立物质基础并完成技术准备工作之后，进一步开放苏联外交部的档案，允许研究人员使用它们。

在国际法方面：制定将国际法制放在首位的完整概念，加强世界法律秩序，提高国际协议监督机制的效能。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实践中变得更为尖锐了。

在裁军以及各方面的工作中引起共同兴趣的问题举不胜举。

清单上的内容还可以列举下去，它的范围极为广泛。仍有大量的有待于研究解决的问题没有被列入，例如，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中的经济问题。对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人口增长情况的预测以及它对地理政治可能

产生的影响已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外交技术和独特的谈判机制。外交艺术在继续完善并且仍需要进行研究。国外的研究中心在研究和总结我们的经验。我们自己，首先是外交学院和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也应该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了。

外交工作应更加重视对外文化交流，要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内确立社会主义的领先地位

上面谈的有关科学的话也完全适用于文化方面。

我们应当商量一下，如何更充分地将文化的潜力引入外交实践中。

关于文化今天谈论得也不少，但是越来越着重于实用方面：人员交流、访问演出、举办展览，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措施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在国家最需要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可能实现自己本来的使命。

文化是一位活跃的和精明的和平使者。

健康的民族文化都倾向于超越民族界线。因为囿于民族文化的圈子里，它就无法向世界展示自己，展示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渊源和代表人物。民族文化应当走向世界，以促进世界团结并将其所获得的财富还给自己的祖国。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现在还想重复一遍：人类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拥有最丰富的精神和创造性资源、能够跟上现代主导思想的社会将占据优势。

时代要求以命令式的形式提出由此产生的任务：在精神和文化领域里确立社会主义的领先地位，使我们的社会在人类思维活动的主要方面成为提出革新思想的世界先驱。

存在着永恒的人类共同精神财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指挥式的命令方法给文化带来了不小损失。所谓文化对抗的粗浅庸俗的“理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国家是在进行文化扩张，但也存在着永恒的精神财富，为什么要把它们分为“我们的”和“别人的”呢？

改革这种不寻常的事在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智力的大发展。文化积极参与了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为重要。

在对外交往中，要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一切长处

譬如说，知识分子对解决人文问题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从精神和性格特点上来说，知识分子更为关心人权问题。对于每一位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保护信仰和灵魂”是高于一切的事业。由于知识分子的功劳才使我们在国内外人文领域开展的工作中拥有了巨大的潜力。

文化交流的使命在于准确地反映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

关于自己，我们有值得向世界介绍的东西，介绍我们的社会改革和关于我国各加盟共和国、各个民族和部族丰富多彩的文化 and 精神生活。

在对外交往中，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政策，必须最充分地利用我国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一切长处。国际交往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在自由交往中一些思想诞生了，或者死亡了。如果限制它，我们就注定要落后。放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与国外公众的交往就可以建立起文化界人士进行非正式国际交往的体系。

为此，建议用新眼光看待我国同国际的及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结构。

实践以新的方式揭示出开展民间外交的可能性。在关于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特别会议上，使我们确信了民间外交在促使人们对和平问题采取创造性的态度方面有多么大的潜力，它对政治家们有多么大的影响。

外交要同新闻舆论界结为联盟

最后，简单谈一谈我们同舆论界的关系以及对社会舆论的研究、考虑和培植问题。在外交部，以我们的高等学校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心。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帮助我们组建这一机构。中心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有意思的调查，其成果正为我们的工作所用。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一方面是通过它将社会舆论与计划采取的对外政策行动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去培育、造就这种舆论。

有一个建议值得重视，即应该定期向舆论界通报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情况，在外交部举办公开的社会政治题目的听讲会。有人主张建立人民外交俱乐部，还有人提出其他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

一些著名的苏联新闻记者——国际问题专家，一些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大政治评论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我们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会晤，但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

我相信，每个外交官都应当是政论家，每个政论家也都应当是外交官。当然，这里的意思是指要了解我们的脉搏是如何跳动的。这是一种理想的要求，许多在座的同志们都体现出了这种要求。

外交与新闻的联盟——在对外政策制度的体系中这大概是一种最有生命力的制度。这一联盟，就其影响社会舆论的手段和能力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不可代替的，或许也是最

有效的。

联盟的成员应当拟定现代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要尽量充分地适应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原则，适应多元化观点和独立判断的原则。

在这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绝对平等的，而利益又是一致的。

国际问题专家们正在就国际新闻如何占有其应有的位置问题进行着创造性的业务讨论。我们对这些讨论的性质和内容是了解的。同样，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虽然国际新闻方面也拥有优秀的创作人才，但暂时仍不能同国内的新闻处于同等地位。在诸种原因中有许多早已不取决于国际新闻的公民和职业的观点，还有许多原因至今仍在客观上保持着自己的抑制作用。

我们批评那些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国际问题专家们，他们也批评我们。真是谢天谢地，能够有人批评我们。这说明，确实有了某些变化。倘若十年前，无论是谁，要是在编辑部报纸上责怪外交部有封闭性，你试试看！

外交部准备向国际问题专家敞开大门，国际新闻观点应多元化

我们准备敞开外交部的大门。等你们以后来到我们各司、局并同那里的工作人员认识之后，你们会相信这一点的。他们也需要同一些主要的国际问题专家们进行业务交流，需要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建议。现在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在拟定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时，不仅要考虑学者的意见，而且也要考虑我们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们的意见。应当考虑，如何把多元化的观点和看法引进我国的国际新闻业务中去，如何以此检验方针和路线。这决不是个简单问题，不过，

让我们一起商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确信，我们的职业就象摄影机所强烈关注的那些职业一样富有英雄气概。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完全不需要拍摄一部《十七个外交春天的瞬间》的系列影片，并由一位迷人的明星在其中扮演外交官角色。为此只要到我们的使馆，例如驻黎巴嫩的使馆去看看就足够了，那里的人们是在炮弹轰鸣声中工作的。或者到驻纽约的代表团去参观一下，在那里，同事们是在对外政策思维高度紧张的区域里工作着。更不用说在喀布尔了，苏联外交官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每天都在经受考验和建立功勋。

五、苏联外交部正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进：

若干成果、问题和任务

现在我要谈一谈外交部内部改革的某些方面，它的实际内容。在讲的过程中我将尽量引用前面已经提到的民意测验的材料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们的改革是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经常性的进程。改革的目标，正如1987年党中央1月全会所指出的，就是要提高外交工作的效率，以使其充分适应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积极开展的国际活动。

改进苏联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外机关的结构，更新和完善干部队伍，提高苏联外交官的专业技能，这一切都是服从于上述任务的。

那么，有哪些成果呢？

外交部内的机构已作了重大调整

总的来说，外交部的现有结构，它的新的职能部门和地区业务部门日益面向最高的外交战略目标。象裁军、人文、不结盟运动、信息等方面的工作已经成立了单独的机构。综合与计划局已被改组，该局明显地得到加强，它的工作人员已经对研究重大课题和提出独创见解发生了兴趣。

从我们外交的地缘政治地图上正在消除一些“空白点”。各个环节的合并扩大本身已经表明了我們正在集中注意解决那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例如，为此而成立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局、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局、近东和北非局、太平洋和东南亚局、南亚局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司和苏联驻外使馆工作局、不结盟运动司。改组后的国际法局承担着重要任务。

大多数被调查的同志认为，结构改变对外交政策的改革起了积极影响。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大约30%——而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不认为对外交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喽，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结果。

强调工作成效的看法是正确的。

近年的国际谈判创造出了一套经验

正如我们所确信的那样，缔结协定，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并不总是哪怕是精心安排的谈判或讨论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必须把个人外交和群体外交的潜力考虑进去。

让我们回忆一下，日内瓦的核武器和太空武器谈判是怎样拖延下来的。比如说，在1986年7月有谁能够预见到他们后来所看到的那种发展呢？经过当年秋天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最高级会晤之后，实际上取得进展的现实可能性出现了。但是，还需要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

在分析随后的十二个月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看清谈判的目标，在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同时确定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接受的代价；

——了解对方的行为动机；

——积极发展自己的立场并建立一种期待成功的心理气氛；

——坚持协议中对自己重要的观点。

就阿富汗问题达成协议所取得的经验也是甚有教益的。在这些协议中不得不考虑到很多极其复杂和矛盾的因素。

无论是中导条约，还是阿富汗协议，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对于争取成功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应当总结这些极其宝贵的经验，把它变成实践和科学的财富。

在实践中确立先进的工作标准，善于同伙伴和对手进行对话，对交谈的题目和问题不加限制和不设禁区，这些也有利于最终取得优异的成果。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在自己所属部门范围内已有可能为对外政策的改革作出具体贡献。当问及是否已为此创造了必要条件时，他们的回答在原则上是肯定的。然而，使我们不安的是，几乎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占23%认为，调动个人主动性的条件尚不具备。

我想，我们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对外交官的党性的正确理解，即除了要有积极的公民态度之外，还要求具有高等、一般和专门的文化水平，还要能坚定地排除干扰，并力争解决属于外交工作范围内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部党组织——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在

解决外交部内部改革的一些问题上正在发挥更有份量的作用。共产党员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讲话更理直气壮了。民意测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谈谈关于积累民主讨论和集体决定的经验问题。83%的调查对象认为，现在，在改革的气氛中，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批判地评价现状。

总之，改组是正确的。比如说，如果不成立限制军备与裁军局，我们就未必能够应付这一最重要的方面所要求完成的工作量。此外，这个部门现在还承担着附加任务——协调监督和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主管机关都不得不按照全新的秩序进行工作。现在，大家都应当习惯于这种经常存在着的进行大规模检查的现实。

人文与文化联系局、国际经济关系局也开始在新的结构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国际经济关系局已经成为对经济工作进行全新研究的组织和计划中心。

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谈一下。

经济领域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中心地位，拒不参加一些世界经济组织是没有远见

现在，国际关系的经济方面正在占据中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某些看法应当重新进行思考。

过去我们曾经作出了一些显然是没有远见的决定。例如，决定不参加一些世界经济组织。这一决定使我们今天遭受了重大损失。

必须加入总的世界经济轨道，但是，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那么简单。国内的许多事情都要改变。但是，为此首先要具体地弄清楚，我们将要得到的是什么，将要失去的又是什么。需要进行准确的计算。以这些计算为依据的政策在执

行中就会具有更大的目的性。

有些事情已经做了。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态度，与这个组织以及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都建立了接触。不久前签署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关于经互会与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建立正式关系的协定。实际上，这涉及克服欧洲经济分裂的问题。转机已经出现，不过还需要很内行地、更坚定地、更主动地采取行动。

外交部各司局都成立经济室

现在，外交部各司局都成立了经济室。它们暂时还很不完善，但是，它们带来的益处是明显的。如今，各地区司能够更准确、更熟练地处理使馆提出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请求，更好地掌握区域性和集团性的经济联合体的行动。

中央机关和驻外机构的结构组建过程尚未完成。

其中，把裁军问题集中到裁军局看来是必要的，同时还要把化学武器、核试验等所有这个范围的问题都交给这个局。

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现在已经需要把研究科技发展前景问题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所有问题合并在一个部门。

看来，考虑到现有经验，有必要对人文局的机构作某些改动。这里关于保障人权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不过文化合作范围内的问题却落到了地方机关。根据上述情况，现在提出建议，想把这个机关划分成一个较大型的专业部门。有人建议把联合国教科文事务委员会划分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单位，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将要扩大地区司，在三个非洲司和两个拉美司的基础上组建两个较大的局级单位。

应当回到结构本身的“分类”问题上来，逐渐地使其规

范化。

司局级领导采取竞选聘任制，参加竞选的可以包括部外专家

同志们建议竞选聘任领导职务——局长和其他部门的领导。那好，关于竞选聘任的事，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参加，不在外交部工作的专家也可以参加。

我们就算说定了，今天我们宣布竞选聘任下列各局的领导人：科技合作局、驻外使馆工作局、非洲局、拉美局以及文化联系司。

我们应组织好与各加盟共和国外交部之间的密切联系，依旧提出这样的目标，即：利用它们的巨大潜力来加强各加盟共和国参与涉外工作的比重、参与国际经济、科学、文化合作的比重。

驻外机构的外交情报已更加客观，并且注意寻找和外国伙伴的共同点

现在谈谈外交部的驻外机构。

关于驻外机构的效率问题，在1986年5月会议上和1987年部委与部党委扩大会议上已经讲了不少。正如你们记得的，提出了许多问题。

其中之一是外交情报的质量。

现在送来的情报变得比较好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情报更加客观了，我的意思是说，更加真实了。

其中的新成分是注意强调寻找与外国伙伴的共同点。

但尽管如此，在情报急剧增多的情况下，质量问题仍然很尖锐。追求“数字指标”——这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仍然感到非常缺乏对政治、社会、经济、精神生活，对人口、教育、科学、工艺技术、社会意识的发展趋势和深层

变化的分析。除了个别例外，使馆都不熟悉驻在国的一些最大的科研中心和高等院校，也没有接近它们的途径，社会学和预测学也没有引起我们一些工作人员的兴趣。

最近，与驻外机构的反馈联系得到了改善。部领导、主管工作人员比较经常地到基层去。部委十分注意驻外机构的工作，研究和总结它们的经验。这有助于找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方法，说明在国外应如何进行情报宣传工作，改组使馆机构，改进大使主持下的各种磋商组织的活动，例如象驻波兰使馆采取的做法等。

提拔有创造精神的年轻人，发挥退休外交官的作用

我们的多数使领馆都任命了新的领导人。我预料，政治体制的改革将会把下述内容引入国家最高选举机关：大使们要定期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要在舆论界面前为他们所执行的政策进行辩护。显而易见，将来也要实行竞选聘任制。

现在已拟订了一份关于从事外交工作的条例草案。

这份文件将在全体人员中广泛讨论。但是我认为，现在就需要谈谈其中的两点。第一点涉及年轻人，第二点关系到我们的老将。我们的随员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这是不正常的。一些精明的工作人员在“低级助手”的圈子里转的时间太长了。外交工作中一些形式主义的界限和临时的障碍妨碍着真正有能力、有创造精神的人得到晋升。不应当妨碍。这里需要另外的标准。如果一个人表现很好，我们就要让他有机会晋升得更高些，越过一两级原定必须经过的公务等级的阶梯。不仅仅应当根据工作年限，而且主要是应当根据现实的功绩来给予奖励。

第二点：怎样帮助和更好地利用那些正在结束其外交生涯的同事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离职的痛苦。他们虽

已退休，但仍应同我们在一起，参加培训干部和科学研究工作。

我想，在外交工作条例中宜于合理地规定一个最高年龄界限，每个外交官在达到这个年龄时都要提交退休申请书，而部委则将决定是否接受申请。

就部务委员会的工作讲几句。我认为，现在这确实是一个进行集体的民主的讨论和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的机构。实际上，一切重大问题都要通过部委。有一个时候，我们曾经抱怨部务委员、司局负责人沉默寡言。今天出现了需要制定议事规程的问题。

由各位副部长率领工作小组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现在，如果没有部长在星期一召开的业务会议，那就很难设想我们的工作程序和制订重大建议的程序。

作为外交部长对自己还有所不满

在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我想讲讲我自己。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我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讲一下我在我们的集体里生活得如何，工作得如何。这是一种困难的，但又是幸福的生活，是一项繁重的，但又是有成效的工作。有成果，有前景，有同志们的支持——除了更大更好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希望的呢？但是，一种不能令人满足的心情还是使自己难以平静下来。

我对什么感到不满意呢？有许多非常重要和十分迫切的问题我都想亲自搞清楚，想彻底地搞清楚。我想寻根求源，了解专家们的意见，得到第一手情报。但遗憾的是，并不总能如愿以偿。

在有些事情上，必须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坚定性、原则性、效率。我觉得，在这方面自己还有某些不足之处。

最后是干部工作。尽管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多改进，但是不能确信没有毛病了。我尽量想不要仓促解决问题，要考虑得全面些，以便尽可能少犯错误。但是，这也不是总能如愿以偿。

我对这个集体负有责任。我愿意更经常地和深入地同人们交往，直接了解他们对工作、对我们的事业、对自己参与这个事业的想法。然而没有成功。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某种不顺利的标志：它意味着，机构尚有待调整，以便能腾出时间与人们直接接触，到国内旅行，与各种劳动集体会见。外交部长应该向他们报告工作，包括自己的和整个外交工作。还有，我们作出许多允诺，还承担了许多义务，但并没有全部变为行动和实践。我们还欠着很多债。全部还清它们，这是我的首要和直接的责任。

在改革的调色板上，那些用来描绘社会主义新面貌的诸多色彩中，我们和你们的色彩应该是其中最有力、最富于表现力的和最真实的色彩之一。因为社会主义首先要通过我们才能向外部世界表现出自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本质和利益内在决定了它要谋求和平，要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合作，要同一切民族和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文明关系。

不能停留在现已取得的成绩上。应当继续前进。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向党、人民和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怎样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这也是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代表会议就改革不应逆转问题得出的主要结论也适用于我们。

我们深信，在改革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同时，国际关系的变革也是不可逆转的。

国际关系的变革之所以不可逆转，是因为它汇入了国家改革与革新的统一潮流；

是因为它遵循党的方针，反映人民的愿望；

是因为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获得了苏联和世界舆论的信任，与最优秀的科学文化力量结成了联盟；

还因为在对外政策和外交内部本身，一种巨大的潜力，即智能和才干、水平和经验、专业优势和团体荣誉结合在一起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

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这次会晤将丰富这些收获。

（原文载于苏联《苏联外交通报》，1988年第8期，宜楚译）

探索东西方之间的新关系

论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问题

维·达希切夫

霸权主义就是打着救世主的旗号，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具有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1948年开除南共联盟，以后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分裂，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和摩擦，苏联都有错误。这种霸权主义还多次威胁到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授美国霸权主义以柄，造成大国之间结成反苏同盟。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陷于危险境地。

国内建设犯有严重错误，对外政策不可能一贯正确。对内政策实行高度集中化，对外政策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为消除东西方紧张局势，苏联应在国内外政策中彻底克服斯大林主义。但是，用新思维改变对外政策，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应把重点从处理东西方关系转为注意各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发展。苏联

* 本文作者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是苏联历史学博士，教授。

应仅限于以自己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成就来影响社会进步。

用新思维改变对外政策，需要很长时间

核时代和科技革命的实际情况，要求采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解决对外政策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刚刚才开始。显然，要作出重大的改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改革人们的思维方式，克服陈规旧习，克服影响作出对外政策决定的部门、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是最困难不过的。

摆脱象在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不正确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在这里，我们的政治思想几十年来所采取的立场，妨碍了寻找解决和平与裁军问题的正确途径。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说：“过去有过一段时间从不涉及尖锐的话题，而且即使并无恶意、但不同于官方观点的意见也不能发表。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请看出现了什么情况。针对国内生活各个方面，针对党和国家建设、经济、文化、艺术的许多主要问题发表了不少大胆的，有意思的，争论性的文章。但在对外政策领域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难道对外政策领域一切都正确，就没有与现在所执行的方案不同的方案吗？”

国内建设犯严重错误，对外政策不可能一贯正确

的确，在关于我们的对外政策的书籍和文章中，你找不到一处谈论任何错误或失误的地方。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当然，苏联的对外政策拥有很高的威信。它的特点一向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它的目的是

① 见本书第31页、32页。——译者

保证苏联及其盟国的安全、支持国际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但所采取的政策是否都正确？难道真的可以认为，我们在国内建设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在整个70年间在国际舞台上却从未出现过错误？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善于从中吸取教训。以前曾有过几次，也对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不是曾经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进行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吗？这些不同意见都是公开地、毫无顾忌地发表出来的。

现在，对外政策的最迫切任务是可靠地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所以，重要的是首先弄清楚军备竞赛和发生战争的本质和机制的问题。弗·伊·列宁曾指出：“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而每个国家又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中，这些国家彼此都处于一定政治均势的体系中。”^①任何一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急剧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意图，都会导致均势的破坏。为了恢复均势，其他国家便联合成反对潜在的或现实的最强大的国家（地区或世界范围的）的“反同盟”。而且甚至依靠吸收另一些国家参加“反同盟”，尽力动员“反同盟”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和人力的资源，来建立力量占优势的平衡。

任何霸权主义都蕴藏着自身灭亡的幼芽

“反馈”的作用往往由于一系列的因素而减弱。如果扩张自己势力的大国使敌人团结了起来，那它一旦放弃扩张意图，就会在“反同盟”阵营中引起动摇和瓦解。由于“反同盟”的实际成员和潜在成员中间存在各种矛盾，也会造成困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62页。——译者

难。但是，最终“反同盟”的力量会逐渐加强，以致向它提出要求的强国经受不住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抵抗。所以，任何霸权主义本身都隐藏着自身灭亡的幼芽。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霸权主义日益表现为以救世主自居，把某种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其他民族和国家

霸权主义的基础一向是要使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服从自己。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来，确切些说，从拿破仑战争以来，霸权主义开始越来越带有思想色彩，而且打着救世主说的旗号，即把某种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其他民族和国家。这样的霸权主义主要是在思想运动广泛开展的国家里有典型性。这种毛病也是美国政治所固有的。很久以来，美国就竭力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著名外交家R·巴克利写道：“美国人从第一个移民开始，就俨然以上帝旨意的执行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由于这一因素造成的对外政策困难是很明显的。因为在自己的行动中以命运宠儿的感情和自诩救世主作用的意识为原则，就是把自己同国际社会的强大力量对立起来。”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在反对霸权主义的行动中，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我们大家都记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法国、英国和美国建议，如果苏维埃政府同意站在协约国一方继续对德作战，就给它以援助（后来这些大国的武装干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它们想要扶植能够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在俄国掌权）。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虽然很迟）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的“反同盟”。

19世纪末形成的、20世纪中还在起作用的欧洲势力的传统格局是：以德国为首的中欧国家集团和与其相对立的“俄国（苏联）—法国—英国”三国同盟，战争条件下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参加三国同盟。德国两次试图用军事手段根本改变欧洲的平衡，使其对自己有利，并确定在欧洲的统治地位，结果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传统的欧洲势力平衡在德国扩张主义面前保证了俄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的安全的民族利益。弗·伊·列宁认为法国和英国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具有地理战略意义。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时期，他坚决主张，在对德停战协定上，写进一项关于无论如何要禁止德国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的条款。可见，苏维埃政府表现了对西方大国利益的重视，德国统帅部原打算在俄国退出战争以后给它们以决定性打击。

欧洲势力的传统格局不仅保证了苏联有能力反对德国侵略。它的另一个优点还在于排除了西方大国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为法国和英国需要在东欧有效地对抗德国的程度并不低于苏联。英国和法国的这些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归根结底高于同苏联之间存在的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30年代，德国法西斯开始抬头。所有的大国都很清楚，事态的发展将导致战争。莫斯科也理解这一点。尽管大家都理解，但直到1939年还在筹划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而当时可能扼制德国侵略的唯一办法只有恢复协约国。但法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当时面对纳粹的威胁，却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同苏联结盟。不但如此，它们还同希特勒调情，签订慕尼黑协定，这是它们的罪过。

第二次大战前英法奉行绥靖政策，不仅出于反共，还同斯大林对内大镇压有关

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斯大林消灭红军优秀指挥干部使红军丧失领导人之后，英国和法国也就不再认为苏联是重要的可靠的军事盟国。而且它们也难以再同这位最高统治者打交道，因为他是一个践踏任何人类道德的、运用残酷的罪恶手段进行前所未闻的镇压以确立自己的权威势力的人。

斯大林处于极其严重的形势下，最后终于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使我国免于战争，尽管是暂时的。

当苏联走出欧洲势力的传统格局的时候，法国和英国就单独同法西斯德国相对峙了。结果希特勒统帅部获得了极为罕见的机会，使自己能够在开始进攻法国之前在西线集中136个师，在东线只留10个战斗力较弱的师对付苏联。这使法西斯德国有可能迅速击溃法国并几乎控制了整个西欧的资源。后来，这种情况又落到了苏联头上，1941年6月22日苏联自己不得不同希特勒军队单独对峙，这时国家的安全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强国本可以袖手旁观，幸灾乐祸。但英国以及后来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抛开对斯大林制度的成见、反感、厌恶以及由于苏德条约而产生的令人不快的情绪，从他们的民族利益出发，选择了支持苏联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这一唯一正确的道路。欧洲大陆上的敌对势力的平衡机制重新发挥了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开始形成。沿苏联西部边界出现了许多友好邻邦，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决定确定了战后欧洲的

格局，这一格局顾及了我国安全的正当利益和为粉碎法西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看来，结果对于我国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是，不久前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国认为苏联地位的明显加强以及苏联影响扩大到中欧和东南欧，是对欧洲平衡的不能容许的破坏，是对它们利益的威胁。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西方大国就开始酝酿制订对抗日益增长的苏联影响的计划。战后时期这些计划变成策动反对苏联的“冷战”的现实。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美国填补了德国被击溃以后形成的势力真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成为强大的和直到今天还长时间起作用的反苏政策的因素。所有西方大国联合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政治联盟，矛头直指苏联。拥有强大潜力的西德也被吸收加入这一联盟。与此相对应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几乎只能依靠苏联的力量。

这样，出现了西方大国的反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个从成员和军事实力（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来说都是空前强大的反苏同盟。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出现了霸权主义倾向

这种分野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可能是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心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对它们的利益的直接威胁，于是求助于“遏制”、“打击”、“威慑”等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在发展军备竞赛中的首要目标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对西方的不体面行为有很深的认识，而同时到目前为止还总觉得我们在各个阶段所持的立场都是一贯的和唯一正确的。其实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也有可以认为，而且已经被认为是霸权主义的倾向在起作用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弗·伊·列宁。他同过去的卡·马克思

和弗·恩格斯一样，坚决反对“为别国人民”“造福”。他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分子十月革命以后提出来的左倾计划：用暴力把革命扩展到西欧、阿富汗、印度和其他国家去。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①

这些原则与实际是一致的。克服了“世界革命”的危险的幻想。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国内战争以后，一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只允许自己拥有总数56万人的军队，难道这一事实今天不使人感到惊奇吗？这说明一代杰出的外交家——契切林、李维诺夫、克拉辛、沃罗夫斯基等人作出了巨大的功绩，他们善于把来自外部的对我国的威胁降低到最低程度。我国武装力量的规模还说明苏联不打算威胁任何国家。只是从30年代开始，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后，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才迫使苏联增强国防力量。**斯大林对外政策实践的基础是布朗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对内政策高度集中，对外政策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不仅在国内政策上，而且在对外政策上，列宁的原则被严重歪曲了。实质上，斯大林及其亲信的对外政策实践的基础是与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的布朗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极左思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在各国推行这个统一的模式，而无视它们的民族特点。对内政策中实行高度集中化，在对外政策上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1948年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体系，并指责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47页。——译者

它的领导人犯了滔天大罪，只因他们拒绝屈服于斯大林和执行他的指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后来，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发生分裂，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冲突和摩擦。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可以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是不正确的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关系可以建立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硬性原则之上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的想法，证明是不正确的。不管这是多么令人惋惜，但事情竟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尖锐对立和武装冲突的地步。

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不只一次威胁到东西方间的政治平衡

对外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傲慢，不止一次地威胁各国之间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的扩张利益把防止战争危险的任务放到了次要地位。国内使用的是类似这样的宣传逻辑：“既然西方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在世界上所进行的进步的社会变革和领土变动，那就说明它是侵略者。”一方面我们攻击西方的立场，升高战争危险的程度，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开展广泛的保卫和平运动，并不惜资金组织和平拥护者的群众运动（难怪50年代流行过这样的笑话：“为和平而斗争，成了为荡然无存而斗争。”）多年以来，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行为的准则和思维的公式，成了领导干部的心理，他们实际上做了自己的宣传的俘虏。

对方过去以及现在怎样习惯地看待苏联的政策，怎样认识苏联的目的？在西方大部分舆论界眼里，苏联——这是一个危险的大国，它的领导人总想通过军事手段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并在全世界建立苏维埃模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西方在反对苏联扩张的论点下联合了起来，给进步力量造成很大困难

关于苏联扩张的论点是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基本的能够发挥凝聚作用的依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统治集团把任何进步的社会发展过程，几乎仅仅看成是全球政治平衡进一步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这给资本主义地区和发展中世界的进步力量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使他们常常遭到残酷的镇压。

苏联的欠考虑行为使美国为扩大霸权主义利益找到了借口

华盛顿积极利用“苏联的军事威胁”，目的是保证自己在西欧的占优势的影响，在世界各个地区扩大自己的霸权主义利益，建立广大的军事战略基地网。我们方面考虑不周的行动，使美国的扩张主义集团为自己对许多民族的侵略行为，为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为生产样式日益翻新的杀人武器，找到了如意的借口。而美国政策的危险的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呢？它们同样靠“苏联的威胁”生存。

70年代之初，苏联的导弹核力量达到了使美国不愿意发生全球核冲突的水平。这样，东西方之间的缓和时期开始了。西方政治家的注意力转向了用和平手段达到反苏的政治目的。他们把特别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经济的削弱、寄托在苏联经济的低效率上。这预示着西方要损害苏联的国际地位，缩小它的势力范围。为了执行这一政策，要求放弃“冷战”，消除同苏联相互关系中的尖锐冲突，就广泛的问题达成妥协。

70年代初的缓和为苏联提供了降低同西方的对抗水平的机会

缓和也为苏联提供了机会。出现了把同西方的对抗降低到最低水平从而防止“反同盟”力量的进一步增长。可以把

有些资金用于解决国内任务，即解决政治和社会进步、国家的民主化、使国家经济走上集约化发展道路等方面。

西方认为，苏联是利用缓和来增强军事力量和扩大势力范围

对于美国及其盟国来说，正如很快就发现的，它们只是在保持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现状的情况下才接受缓和。但是，在西方的观念中，苏联领导积极利用缓和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为了同美国以及所有与之对抗的大国取得军事上的均势，——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事实。由于越南的那场战争而陷于瘫痪的美国，只好痛苦地接受苏联在非洲、近东和其他地区的影响的扩大。

所有这些在西方都被说成是苏联威胁的进一步增长。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国家执政的极右派政治集团由缓和急剧转向对抗。苏联又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从来没有过的压力。

由于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西方认为苏联扩大势力范围达到了危机的顶点。在以往的时代，这可能会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但是，核毁灭的威胁不允许西方同苏联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反同盟”采用了其他施加压力的手段。主要的一个手段是疯狂地进行最新的军备竞赛，以致就连强大的西方经济都难以承受。资本主义世界把精神的和物质的资源集中起来对付苏联。他们宣布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讨伐”。

苏联遭到世界各大国的反对

“反馈”作用使苏联在对外政策和经济方面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世界上的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中国都来反对苏联。要与它们强大数倍的优势潜力相抗衡，超出了苏联国力的范围，是很危险的。

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失误和外行才使苏联处于危险境地

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在苏联同西方的关系中，能否避免如此强烈的尖锐冲突呢？

毫无疑问，是能避免的。我们认为，危机主要是由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失误和解决对外政策任务的外行态度所引起的。

提出的总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和平、安全、裁军、合作、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但是，明显缺乏有针对性的、内行的、经过科学论证的、经过仔细检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估计世界的整个形势和力量对比时犯了错误，从而没有进行重大努力来调整同西方的主要政治矛盾。在我们从政治上、军事上（通过提供武器和派遣顾问）、外交上卷入地区冲突时，我们忽略了这些地区冲突对于苏联同西方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以及对于它们的全部相互关系的影响。**苏联的真正利益在于保证良好的国际环境，不在于在发展中国家追求微小胜利**

对苏联真正的民族国家利益缺乏明确的认识。而这些利益根本不在于追求微小的、实质上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上层政变有关的形式上的胜利。真正的利益在于保证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便苏联进行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可是，当时认为不需要任何改革……

我们作出的决定缺乏创造性，这使我国的对外政策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里根政府逼迫我国大幅度地提高军费开支。美国1979年军费开支是1220亿美元，到1985年增长到2840亿美元。为了保持军事均势，在这巨大的非生产性开支方面，我们跟在美国后面，5年间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

~~军备竞赛——也同战争一样——可以认为是政治的另一~~

种手段的继续。为了停止军备竞赛，使它失去意义，需要消除政治矛盾，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当然，把解决政治问题同解决军事问题分开是不正确的。毫无疑问，可以平行地解决这两类问题。但政治问题占首位是很明显的。70年代，缩小和限制美国和苏联之间军备竞赛的一切努力都遭到可悲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基本的政治问题没解决，这些努力才毫无成效。

为了彻底和坚定不移地抑制军备竞赛，必须根本改善苏联同西方的政治关系。在这里，单一的军事问题谈判是不够的。归根到底，问题不在于这方或那方拥有多少核武器和其他武器以及军备的水平应该降低到什么程度。主要问题在于苏联同西方列强之间是否能达成政治临时协定，相互之间是否能够高度信任。解决裁军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在政治思想方面。进一步的“反馈”作用，与苏联相对抗的“反同盟”的力量之增强或者削弱，也都将取决于这一方面。

苏联同西方列强应当放弃全面对抗；互不干涉内政，也不干涉第三国的内政；建立广泛的和平共处；不捅对方的痛处；不损害对方的利益，不争取单方面的好处和优势。

为消除苏联同西方间的紧张局势，苏联方面应在国内外政策中彻底克服斯大林主义

消除苏联同西方的政治和军事的紧张局势，这是一个要求双方共同努力的过程。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在国内外政策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在组织机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彻底克服斯大林主义。这里说的也是关于建立良好的国际条件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为由少数上层人物作出对外政策的决定、歪曲地描述外部世界、使苏联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这些因素长期使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

化陷于停滞状态。

争取社会进步，重点应从东西方关系转为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发展

在20世纪的年代里，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1945年以后，苏联扮演了在世界上扩大社会主义范围的军事保证人的角色。结果就陷进了同主要帝国主义势力极为尖锐的对抗之中。导弹核武器使这一对抗具有极为危险即冒险的性质。

现在，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不仅从保卫和平的观点，而且从世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来看，把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的重心，从苏联与西方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重新转移到苏联、社会主义各国、西方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内部社会政治发展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在1917年可以在一个国家——俄国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冲破帝国主义的链条，那么现在对于在本国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迈进就有了更加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苏联可以而且应该仅仅以自己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和文化的成就来影响世界的社会进步。这就是列宁主义关于苏维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任务的基本方针。完全恢复这一列宁主义思想的意义，是改革的崇高目的之一。

我们政策中的这种转变完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它将大大加强各国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理论上、科学上和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和互相充实社会主义力量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团结将变得内容更加丰富，将更会显示出本身的特性。

在核时代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的崭新任务，既要求完全新的途径，也要求实现这些任务的完全新的方法——这就是苏

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结论，这次代表大会为彻底重新评价对外政策思维中的有意义的东西奠定了基础。我国对外政策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以下原则：拯救人类文明免遭核毁灭的利益，高于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物质的、个人的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这一原则发展了列宁主义思想。

（原文载于苏联《文学报》，1988年5月18日，刘彦章译）

改革，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 会议和对外政策

1. 过去认为消灭阶级压迫是解决全人类问题的前提。现在的看法是，不从全人类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不能指望阶级斗争获得成功。现在要优先考虑全世界共同利益，解决普遍民主性质的问题。

2. 各国必须淡化并协调各自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就意味着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3. 保持利益均衡而非力量均衡，是苏联在一个阶段的和平战略。民族利益仍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各国都带着自身的民族利益参加国际活动。苏联出于本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提出相互依存的思想。

4. 苏联在几十年内执行的不是和平共处政策，而是以核对抗相威胁的政策。苏联对军备竞赛也负有一份责任。

斯大林认为只有打倒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才能巩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高；在第二次大战前对法西斯德国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估计不当，错误地进攻芬兰；战后对西方抱极大怀疑态度，对马

* 这是苏联《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联合举行的座谈会记录，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编者

歇尔计划反应过分。

此后的外交失误包括：认为地球不会因世界核大战而毁灭，追求数量上的力量均势，不恰当地卷入地区冲突。

5.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外交一贯正确的公式，至今还在起作用。还没有解决外交决策处于垄断局面的问题。在20和30年代，曾把对外关系问题当作国内权力斗争的工具，以外部危险来恫吓反对派。勃列日涅夫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一度竟成为保证领袖的正常出现。

外交政策的收益

П.Г.亚诺夫斯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全苏党的十九次代表会议引起了国内和国外的极大兴趣。苏共的战略不仅包括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内容，而且包括为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确立各国关系中的广泛的和平共处原则而斗争。

可惜的是，我们对于20世纪末期新现实的本质显然认识得晚了。应该弥补被我们疏漏了的东西，并首先注意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这类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全人类的利益与阶级的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新命题：不首先考虑全人类问题，就不能指望阶级斗争获得成功

从理论上说，一切似乎都是明确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是列宁都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解

放全人类，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没有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摆脱了战争灾难等等的社会。正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由于全球性的问题——军备竞赛、战争，其中包括地区性战争——日益尖锐以及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受害最深。因此，正是劳动人民最关心全人类性质问题的解决。他们认为，这既是阶级的，也是全人类的崇高使命。

同时，如果以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消灭阶级压迫是解决全人类性质问题的前提，那么现在我们的出发点则是，不以全人类的口号和任务来武装起来，就不能指望阶级斗争获得成功。

同时为了解决全人类的和阶级的问题，必须具体地确定斗争的形式和斗争的内容，提出具有说服力的和鼓舞人心的目标。这项任务只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才能解决。

И·И·安东诺维奇（哲学博士、教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虑苏共对外政策战略的同时，我想提请注意世界历史的辩证法本身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民族和区域性发展模式的数量和特点都在增加。初看起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歧按历史进程的逻辑应导致某种程度的单一化至少导致比较均势的力量之间的抗衡。事实上，随着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加强，它的多样性在增加，变得更加复杂化。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的后果。所以党才提出了世界整体论，号召把力量联合起来为反对人类灭绝的威胁而斗争，号召人们认识到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一致性。

世界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其核心为利益均衡

多样性中的同一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公

式，它反映了对当代世界特点的理解。达到这种同一性是极其困难的，但这是国际现实中最稳固的形式，它确认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有权维护自己的个性。

同一性的核心就是利益均衡。过去，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谈论得很多。今天我们谈论世界现实中的另一个话题——利益均衡，并且认为这种均衡应服务于巩固和保障和平的事业。

民族利益仍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本世纪末，我们确信，各民族国家所阐明、确定并用以以为世界发展进程打基础的民族利益，依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最近40年间各种国际联盟的形成，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正是根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时代基本矛盾分清民族利益和民族国家的。而各个国家总是带着自身的民族利益参加任何一个集团。

但是，在历史上，尽管迄今为止各种联盟都是为和平而建立的，但它们却带来了战争或经常性的战争威胁。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超出了世界上各种联盟的范畴，并可能在某一阶段使这些联盟成为过时的军事政治组织。这就是新的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它是不能自动实现的，为了它的胜利要进行许多斗争。

强调利益均衡，并不排除阶级对抗，只排除使用军事力量

从力量均衡达到利益均衡。我想，这就是改革时期苏联对外政策主张中表现在原则上、理论上、精神和政治上的新颖的东西。当然，这既不排除竞争，也不排除阶级对抗，也不改变在这种对抗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力量，不改变在这种对抗过程中结成一定形式的社会力量。这只排除用军事手段解决对抗的方法和企图。

“利益均衡”是一个阶段的和平战略

因此“利益均衡”这个提法是摆脱核毁灭的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是一个从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从当代第二个一千年迈入第三个一千年这一阶段的和平战略。社会主义向世界提出的和平战略，本身很富有说服力，因为它不仅指出未来属于谁，而且还在培养共产主义者，使他们肩负起新的历史责任。这个历史责任的重大，在过去时代的真正历史实践中还没有人能体验过。

过去卷入了一系列同苏联的切身民族利益联系很少的问题

Б·Д·皮亚德舍夫（历史学博士、《国际生活》杂志主编）：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领导层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观念的1985年4月全会之前，苏联对外政策处于复杂状态。外交事务问题繁多，其中有些问题如何解决还闹不清楚。首先就是阿富汗问题。隧道的尽头看不到一丝光明。苏联对外政策积极活动的范围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卷进了一系列问题之中，这些问题实际上与我们的切身民族利益联系很少。

具体形势的复杂性模糊了我们对外政策总方针的前景和方向。70年代至80年代初，我们把很多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生活中的外在现象。在此期间，一系列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面貌的真正关键性进程却被我们放过了。譬如，亚太地区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我们惊奇地看到，在那里不知不觉地出现了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相互依存概念出自正确理解苏联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党的领导提出了双重性质的任务。第一，确立新的概念和推行对外政策的新方法。第二，拟定具体的实施步骤。世界是整体的和相互依存的概

念在那时就已经提出，并为后来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发展。还不能说，这一概念已经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对它已经完全明白。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富有成果的思想，对此，我们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这个概念和实现这个概念的实际步骤的基础，主要在于正确理解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民族利益。

对外政策应该有收益，并同国内事务紧密联系

这个新颖的提法用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对外政策应该是有收益的。这虽是纯经济术语，但却具有极深刻的思想。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行为，我们全部对外政策计划和军事战略计划都应该最深刻地与国内事务，与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对外政策的所有步骤都要考虑，它们将如何影响比方说俄罗斯非黑土地带的情况。如果能为改善国内局势创造新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对外政策。说得很简单，但我以为，意思是清楚的。

人们把世界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的概念本身称为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革命性质。如果求教于列宁，那么就会发现，列宁关于处在一系列国家之中的年轻俄国对外政策的思想实质恰恰是，俄国不应生活在与世界隔绝的围墙之内，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各国必须淡化并协调各自的意识形态倾向

现在这个思想适应着当今世界的状况，已经发展和深化了。简单、易懂和富有生命力是这一思想的实质。如果我们赞同世界是整体的、相互依存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应该保持安宁。为了在各国关系中确立这种安宁，不管它们在意识形态、思想和观点上彼此多么不同，每个国家，包括超级大国

在内都必须淡化和协调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使之既符合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也符合于其他国家的利益。

生活在一个整体的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就意味着要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减少军事紧张气氛，切实走上裁减军备、削减军费的道路。我想提请注意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合理足够理论的重大的原则性意义。但同时需要指出，我们有些专家却为模糊这个理论的含义费了不少力气。

各国之间和平共处意味着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B·B·亚历山德罗夫（历史学博士、世界政治与苏共国际活动教研室教授）：尽管抛弃了“各国间的和平共处是两种对立制度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的公式，但苏共完全不否认两种制度的矛盾与对抗的存在。然而，在核宇宙时代，两种制度的对抗只有也只能通过和平竞争与和平竞赛的形式来进行。

各国间的和平共处意味着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换句话说，现在把各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纳入世界政治的领域是极其危险的。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都必须抛弃“敌人形象”的僵化思想，代之以“竞争者的形象”。

M·A·蒙强（历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交流研究所研究员）：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这大概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最尖锐的问题。我们却常常把自己的全部裁军热情都倾注到消灭能够毁灭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但是，不应该忘记常规武器。因此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应该同时既适用于核武器，也适用于常规武器。只有大量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并且将来把它们销毁，才有可能在裁军的整个过程中取得现实成果。

卷入地区性冲突不仅过分，而且很不恰当

我们卷入地区性冲突不仅常常被认为是过分的行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很不恰当。我认为，放弃国际主义义务——援助、支持现代世界中的社会进步力量——就等于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政治的艺术恰恰在于，要找到一些完成这种国际主义义务的形式，它们将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阵地。

同时，国际政治的艺术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盟友和朋友，或者在迫不得已时，中立那些明显的敌人。如果一些具体的措施和行动妨碍或者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些措施和行动就不能称之为政治。显然，这个原则也可适用于部署在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的“SS-20”导弹，它曾经导致西欧和美国在军事—政治战略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

吸取教训 展望未来

皮亚德舍夫：我想发挥一下我早先曾泛泛表示过的一个想法。很遗憾，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没有可能详尽地从理论上研究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没有可能详尽地研究它同其余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前景问题。但是在构成他最后一个时期政治遗产的那些著作和演说中，从他的逻辑和他对世界的看法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看到了未来的苏维埃俄国是一个与世界各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全面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国家。列宁的这一立场得到了他的最亲密的革命战友们的赞同。列宁是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他在国外度过了许多年，他与世界的文化、传统

和政治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思考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未来时，不可想象列宁会把它设想成为与其他国家脱离，用一道围墙与其他民族隔绝起来的国家。有一种想法看来是没有道理的，那就是：列宁可能认为可以使人民对国界以外的事不闻不问，使他们孤立于当前世界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之外。

列宁说过经济规律比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更大，斯大林时期人为地制造相互隔绝的环境

列宁说过，有一种比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经济规律。他这一思想并不单是针对资本主义西方而言，也在同等程度上针对着苏维埃俄国。他指出，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苏维埃国家不同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顺便说一下，在苏波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趋于稳定。实际上，当时苏维埃国家没有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因此没有必要使俄国处于受包围营垒的状态。出现了安定地从事经济工作和恢复工作的可能性。没有发生国内紧张局势、没有无谓的牺牲，也没有无根据的敌视。列宁就这样制订了方针。很遗憾，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当政时人们违背了这一方针。就这样出现了一种人为制造的环境，对此，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焦尔金游地府》一书中写道：“在共同的天花板下，每个人都有一堵自己的墙，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和划在门锁上的疆界。”

H·H·卡普钦科（《国际生活》杂志副主编）：如果观察一下我国在精神与思想领域的发展情况，那就会发现，在个人迷信时期和停滞时期，最严重的损失是这样或那样以种种不同手段和方法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辩证实质。片面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被极其简单地理解和解释的

阶级因素。结果导致这一学说中全人类的和人道主义的内容被贬低了。

H·B·扎格拉金（历史学博士、世界政治与苏共国际活动教研室教授）：我们通常都在求教列宁的对外政策。这样做是自有其逻辑的，特别是如果以和平法令为出发点来看。和平法令是在与当今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它直接表达了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理想和目的。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形势是非常特殊的，当时还不清楚世界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反应如何。我认为，恰恰是当时形势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我们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理想和目标。

尔后，局势开始变化，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国内战争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不承认苏维埃俄国，正如当时情况表明的那样，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在第八次俄共（布）代表大会（1919年3月）上，列宁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是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到来之前，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①我记得这是在1919年。

列宁早就提出过“持续共处”及“俄国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但是，还在1920年11月，列宁就提出了历史发展新阶段的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并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力量均势，按照列宁的估价，这种均势可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和平喘息”这一术语被“持续共处阶段”

^①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126页。——译者

概念所取代，还提出了俄国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过程。

但当那些既无列宁的远见，也无他那种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能力的人接替列宁的时候，理论发展方面的情况却成了另一种样子（要知道，即使在“阶级斗争严酷”的条件下，即1919年，列宁就强调过世界的整体性）。20年代中期，各集团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争夺对党的控制的斗争。这时，这些集团中的每个集团主要不是在分析国际局势，而是要从列宁的理论遗产中选择那些对它们最有利的论据。

列宁去世后，外部危险屡被用作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

这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说，在1924—1925年间，每个集团——一方面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都在用战争威胁、外部危险来恫吓对方，“新的阶段”这一术语被抛弃了，又只是在谈和平喘息，强调这不是持久的，要准备反击近期必然出现的侵略。这无论如何与现实的国际形势没有联系。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向对方提出指责，说正是他们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削弱了党和国家。

1927年初，在同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斗争激化时期，斯大林非常积极地坚持下述理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布哈林对此则谨慎得多。当反对派作为一个组织被消灭以后，斯大林又嘲笑他自己曾那样顽强坚持过的提法，他说，反对派用战争不可避免来吓唬我们，而战争在哪里呢？然而后来，他再次用战争危险正在不断增长的说法来武装自己。这发生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当时斯大林正在进行反对布哈林的斗争。

换句话说，对现实国际形势的分析退到了第二位，外交

实践脱离了理论。在契切林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候，这一实践从本质来看仍然是列宁主义的，目的在于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当然也曾发生过困难，例如，在1927年，当时与英国发生了冲突。但冷静地来看，非常清楚，实际的国际条件并不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右翼势力组成新的反苏集团的可能性。实践证明了列宁关于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稳定的和平关系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但理论上权宜之计的态度占了上风，这自然就给我国外交政策实践带来了重大损失。

但是这种权宜之计的态度并不是一贯的。我们举1930年为例。斯大林在一年的时间里对国际局势做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估计。一个是：苏维埃俄国的每一项新成就都会增大它同帝国主义国家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增强了国际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俄国的敌视。过几个月，他又提出了相反的一个估计：在建设性发展事业中的每项成就都会加强国家防御能力的基础，使得组织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更加困难，从而使国际局势趋于稳定。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将他的两个对立的估计协调起来；而是认为战争最终不可避免，还是有可能将其制止呢？是从帝国主义按其本性会产生战争危险的立场出发呢，还是从这一危险在某一具体时期可能降至最低程度的立场出发呢？

以“小牺牲”赢得胜利的理论使斯大林对战争破坏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在实际政策中，防止战争的方针早在1932—1933年就开始执行了。苏联代表团在伦敦经济会议上曾提出了“经济作战”的思想，苏联还加入了国际联盟，而过去同该联盟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然而，在理论上并不是这样明确。1935年共

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了有可能防止战争的结论。但整个来看，斯大林并不坚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他坚信他自己在20—30年代不止一次提出的关于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工人阶级的朋友”会在背后给发动反社会主义国家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以打击的论断，这显然影响了他对如何对待战争危险性这个问题的态度。

这一论断是极典型的幻想，实际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相信社会主义本质上应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强大，这导致了对未来战争的艰苦性估计不足，并提出有可能以“小的牺牲”赢得胜利的理论。这种概念不只是建立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而且建立在侵略国家的工人阶级将支持苏联军队这样一种教条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估计不当，苏芬战争是错误的

亚历山德罗夫：只有什么也不干的人才不犯错误。但错误与错误不同。对战前国际形势作出主观评价的后果是沉重的。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给苏联对外政策带来了损害。这反映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对英美矛盾估计过头，而对英美法集团与德意日集团之间的矛盾估计不足。伟大卫国战争前夜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都伴随着必要的外交艺术。1940—1941年之交的冬季苏芬冲突的发展是犯了错误。

斯大林时期形成苏联外交“一贯正确”的公式，至今仍存在

更有甚者，许多著名的苏联外交家遭到了迫害，其后果是束缚了外交主动精神，产生了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正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一贯正确”的刻板公式，至今我们还难以摆脱。

战后苏联提出许多和平倡议，主要是为了揭露敌人而不是促

成协议

扎格拉金：战后时期，苏联外交提出了许多和平倡议，号召不要进行“冷战”，阻止加剧军备竞赛。但是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却是多么失算！曾经有过“和平公约”的想法，但是与这个想法同时，提出了北约组织成员国身份不能与联合国会员资格并存的建议。以这种方式提出建议，西方能够接受吗？显然不能。如果选择的方式显然不能被另一方接受，那么建议又怎么能会被接受呢？

战后，斯大林受苏德条约经验（这对苏联外交来说是一个不成功的经验）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有着极大的怀疑，他认为，反正与它们不可能有稳定的协议。提出和平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做为和平的敌人加以揭露。

核战争危险出于两个体系的对抗而不是帝国主义本质

无疑，帝国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样。但是有以下几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核对峙和核战争危险是怎么产生的？是帝国主义本质或是两个体系之间进行的对抗本身产生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参加对抗总有两个方面。一方的选择影响着另一方的选择。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危险来自对抗，而不仅仅来自帝国主义，那么我们就将看到更为复杂的世界图景，我们就将弄清楚某些可能的疏漏，譬如说，西方的某些步骤是可以防止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引起了西方消极的反应。

如果我们说，只有帝国主义对军备竞赛和核危险的形成负有责任，那我们就会仍然抱住一个公式不放，按照这个公式，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人类的危险就将继续下去，和平的保证就不可能有。

问：您的这个论点是否与双方“同等责任”的论点相类

似？

扎格拉金：关于这个论点，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和美国对“同等责任”的理解不一样。重要的是理解对方的逻辑。要知道，对于相信苏联是“邪恶的帝国”的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根据社会舆论调查资料，60—70%的美国人都相信这一点），接受“同等责任”的论点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承认美国也在某些问题上不正确。这样就已经偏离了“邪恶的帝国”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进步。

苏联对军备竞赛也要承担一份责任

这一方面同西方的社会舆论有关。另一方面，这也同我们的对外政策理论有关。我们长期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那么，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不承担军备竞赛的责任，军备竞赛是强加给我们的呢？前一个论点同后一个论点不相协调。总应当具有某种逻辑。

问：但是，难道社会主义不是争取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吗？

社会主义在世界经济中还不是主导力量

扎格拉金：很久以来，我们还是从字面上去理解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这个观点。但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在经济上还不是主导力量。资本主义还控制着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潜力要大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潜力。

帝国主义仍然是战争危险的根源

A·A·米戈拉季耶夫（哲学博士、世界政治与苏共国际活动教研室教授）：但不管怎样还是不能忘记，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是军备竞赛的首倡者和主要推行者。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对现实事实的分析和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列宁的著作中

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得到了确认。但是，不能用旧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这点也是明显的。扎格拉金提出的问题是，军备竞赛是不是起源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的本身，是不是起源于两种社会制度间的斗争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身。如果是这样，那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对军备无节制的增长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何况在停滞时期，我们在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领域中也有过错误和失策。

我的观点是，战争不是两种世界制度的对抗的结果。因为，这种对抗能够是，而且应该是和平的。两方中的一方如果自觉地要将这种对抗引导到“战争的羊肠小道”上去，才会出现战争的危险。而这一方常常是帝国主义。我国的个别的不当的行动在过去能暂时使局势复杂化，甚至尖锐化，但是，这些行动不能被说成是战争的根源和战争的原因。社会主义对于进行战争，也就是对于军备竞赛，既没有经济的，也没有社会的利害关系。“同等责任”的论点是反苏宣传的发明。苏联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它不得不关心维护和平，加入强加于它的军备竞赛，以免另一方军事上占优势。如果提出问题：谁打了第一枪？这就是真相。

战前，斯大林对法西斯德国威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同时，我还认为，斯大林在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时，采用了教条主义的和专横的随心所欲的作法，这使苏联人民、红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最严重的失误是对西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部署估计错了，对来自主要的侵略策源地——法西斯德国的威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战后，斯大林对战争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估计错误

战后，在5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科技革命开始加速发展，斯大林对待许多世界政治问题又表现出严重

的教条主义态度。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1952年）中预言：在保卫和平的运动取得了大量成就的情况下，“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已经出现了“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①。实践，实际生活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可是在这里，盲目地追随斯大林的教条，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对马歇尔计划作出过分反应，失去了可能延长战时同盟的机会**

安东诺维奇：斯大林给列宁的党在20年代奠定的外交政策战略加进了就事论事的、主观随意的作法，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都给我们的对外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认为，在1947年，当提出了“马歇尔计划”时，本来可以更加克制地研究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当然，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要在美国所要求的条件下参加欧洲大陆的国际经济合作。但是，要知道，可以对它提出反建议，并为其实现而奋斗。而且，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成功地延长在战争年代结成的同盟的团结，并且，能提早几十年就着手建设一个整体的世界。

几十年内没有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而执行了战争边缘平衡和以核对抗相威胁的政策

过分的、病态的猜疑，在那时阻碍了斯大林深入地、全面地估计世界形势。结果，我们在几十年内，执行的不是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我们所执行的，开始是“在战争边缘平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4页，第621页，第622页。——译者

衡”的政策，后来则是以核对抗相威胁的政策。错过了许多现实的合作机会。最为可怕的是，过分的猜疑和教条化开始被领会成一种“不会失败”的独特的立场，而这在长时期内使我国对外政策的活动丧失了现实性和灵活性。“不会失败”的立场结果变成了“不会成功”的立场。

在你们的五月号杂志上刊登了庞金写的令人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题为《非要有自我批评和自我分析不可》。这篇文章对我写的关于“开放性”和“封闭性”是在我们的制度下按照对外政策的具体情况可供选择的两种状态这种思想提出了争论意见。他认为，“封闭”状态的必要性是不存在的。

把封闭状态绝对化导致40年代末和70年代末的国际孤立

我不打算过多地卷入这一争论，我只想说，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和它的领袖们，有权对尖锐而紧张的历史局势，根据客观的必要性，根据本国和盟友们的利益的要求作出反应。全部问题在于，要使对外政策具有灵活性和能够适应现实形势的变化所提出的要求。我们过去表现出把“封闭性”状态绝对化的倾向。主要的不幸就在于此。

在30年代，这曾导致个人迷信时期的种种罪行，在40年代末，这曾导致国际上的孤立。这种孤立~~在70年代末再次出现~~，但是，这已经是由于停滞的原因。这样一来，我们没有能够享受到60年代和70年代执行的积极的对外政策的成果，而“开放”制度似乎又重新滑倒在对~~外埋头于政治防御~~，对内夜郎自大和自我吹嘘的状态之中。

扎格拉金：斯大林死后，在1953—1956年间，不论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出现了突破，解决了一系列冲突（在朝鲜和在印度支那停战），建立了最高级的接触。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恢复了列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

赫鲁晓夫时期，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比对社会主义更加危险

随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冲突——在近东，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在加勒比，局势出现危机。每一次冲突都使世界处于核灾难的边缘。为什么这些冲突具有如此危险的性质？那是因为对世界发展的规律性简单化的认识占了优势。一方面，根据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类比，产生了一个信念，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结束帝国主义的存在，并由此出现了一个思想，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要比对社会主义更加危险，虽然社会主义不希望这次战争。这一思想在赫鲁晓夫的某些讲话中也可以看到。

安东诺维奇：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苏联那时提出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和平纲领，而赫鲁晓夫却不小心抛出了一句话：

“我们将埋葬你们。”这一类的失误，而且发生在那样的高级人物的身上，就被敌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正好是我们的敌人坚持不懈地扩大这种潜在的不信任的时候，这种潜在的不信任是很容易接受著名的“邪恶帝国”这种说法的。

社会主义阵营将以牺牲资本主义阵营为代价求得巩固，这是苏美对抗形势的思想根源

扎格拉金：世界成了苏美对抗的人质。这种形势的出现，是由于对优越性和社会进步概念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的理解是建立在斯大林早在20年代就表述过的思想之上的。这就是：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将以牺牲另一个阵营为代价来获得巩固，这就是进步的康庄大道。这种理解使人们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个别孤立的冲突看成是当代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看成是进步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力量的关键所在。世界发展的逻辑被描述得很简单：一个国家机

械地脱离一种制度而加入另一种制度。

赫鲁晓夫时期，占优势的看法是，地球不会因世界核大战而毁灭

O·Γ·奥比奇金（历史学博士、教授、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我们历史学家在分析这种或那种政治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围绕着它有什么样的内部斗争的时候，感到很困难，遇到的阻碍是缺少文件作依据，许多东西我们就是不知道，而追溯对外政策思想产生的根源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在1955年1月，那时的苏共领导讲了一个思想，说在双方都拥有火箭—核武器的情况下，出现了整个人类能否生存下来的问题。但是，当时占优势的是另一种立场：如果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按照规律发展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由于一些偶然事件被毁灭，其中也包括世界热核战争。

勃列日涅夫时期，认为地区冲突结果将决定社会发展

当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我们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开始具有现实性的特点，找到了对付美国侵略越南的成功的方法，避免了直接对抗，并将这种对付办法同在基本问题——防止核战争——上的对话结合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对世界发展现实的简单化的理解又占了上风，那种认为地区冲突的结局将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的看法又重新起作用了。

追求数量上的力量均势，给苏联自己制造出许多问题

还表现出对力量均势的简单化的理解。一味追求数量上的均势，而把技术要素看成是次要的事，这就丧失了现实主义和健康的理智。技术要素简直被遗忘了。“以一个火箭对付另一个火箭”这样的计算方法是比较简易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某些类型的武器数量较多，例如坦克，那么，我们

就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制造了一大堆问题，其中也包括同西方社会舆论有关联的问题。西欧人很早以前就明白，在欧洲打核战争就等于整个大陆的毁灭，它将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苏联继续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它超过了合理足够的限度，超过了真正可以给侵略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阻止它进行任何敌对行动的限度。

在阿富汗问题上，没有从世界相互依存的角度考虑到国际影响

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也没有被考虑到。如果以阿富汗为例，那么，我们解释派军队进入阿富汗的基本论据之一就是，这个问题只涉及苏阿关系，派军队进驻是一系列条约的相应条款规定的，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相应章节的规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世界的相互依存性，那么能不能这样认为：与苏联和阿富汗两国有关的某些事情不会涉及第三国，例如伊朗、巴基斯坦，也不会涉及苏美关系？

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内问题已经行不通

米戈拉季耶夫：说到阿富汗，这一事件的教训之一是，由于阶级之间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原因而发生的内部冲突，不仅能够使一个小区或地区的局势严重尖锐化，并且还会使整个世界的局势严重尖锐化。地方性的冲突有可能导致国际武装冲突，并进而引起一切消极后果。阿富汗事件与国际关系中产生的新现象——民族和解政策——有联系，难道这不是从优先考虑世界发展的利益和解决普遍民主性质的问题出发来解决阶级的、政治的和思想的问题的独一无二的经验吗？这个政策在阿富汗、柬埔寨、尼加拉瓜获得了积极的发展（虽然有着很大的困难），这就证明，在解决国家内部的问题时，使用军事手段已经行不通了。并不排除同保

守势力、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但是要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并且采取新的、非军事的和更加文明的方式。

扎格拉金：一句话。我们在承认另一方是平等的对手或伙伴时，也应承认对方也有着自己的合法利益。能不能够设想，只有我们才应该进行抵抗，而对方就没有权利进行斗争呢？对方有这种权利，并且进行了斗争。

要建立不受领导人个人优缺点影响的政治职能体系

卡普钦科：不需要任何的科学分析，甚至那些在理论问题上没有很深造诣的人们都明白，在我国形成的政治职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协调，存在明显的混乱。而党所提出的广泛而详尽的民主化纲领，作为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改正这类现象，并制定保证办法，使社会发展不受各种次要因素的支配，不管各种级别的领导人本人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我们在这方面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极其悲惨的教训。在这个方面，很少有谁能同我们相比。

安东诺维奇：让我们以1975年为例。这一年是我国对外政策战略获得胜利的辉煌时刻，它的标志是赫尔辛基协定的缔结。西方那时指望，我国接受了“第三篮子”^①计划后，在国内会出现经常性的反对派运动。这个打算落空了。我们的对手本想等待时机对缓和给予反击，但我们不能给他们以

^① 1972年至1975年3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又称赫尔辛基会议）第三阶段（1975年7月30日至8月2日）会议上，各国首脑通过并签署了“欧安会”的《最后决议》，其主要内容的第三部分被称为“第三篮子”。这部分内容规定，与会各国承担义务促进各国人员、组织和机构之间自由地交往，允许有关家庭团聚、不同国籍公民结婚以及个人或集团旅游等。这部分内容，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并在它们坚持要求下通过的。——译者

任何挑衅的机会。可是，我们派军队进入了阿富汗，就给予了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的动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虽然如此，结果却不好。我们的行动被缓和的敌人利用了。再一次出现了“没有胜利者”的结局。

停滞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成了保证领袖的正常出现

如果谈到我们称之为停滞时期的那个阶段，那么可以说，经常性的和耐心细致的外交工作由于以下的原因而受到损害。这就是，外交的主要任务成了要保证领袖正常地出现在谈判桌旁和正常地离开谈判桌。由于领袖不能读完为他准备好的材料，专家小组和专门机构的大量筹备工作都白做了。由此而导致主观主义的浪潮迭起，这些浪潮使我们的外交丧失了现实性。要知道，例如，早在阿富汗冲突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就有可能从那里寻找出路。但我们却陷得更深了，因为，向公众舆论报道总书记的积极作用成了主要关心的事物，而总书记事实上已经不能起任何作用了。

一句话，停滞时期也是对外政策战略的停滞年代。深刻的客观发展趋势和坚定的阶级目的性传统仍然在起作用，但是都被主观主义的错误掩盖起来，或者干脆就是在作表面文章。这是外交活动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蜕化堕落的最地道的表现。主观主义的病症是危险的，治疗它需要有顽强性。这种病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打断深刻的客观形势的发展，但有时可能使它变形，以致社会在许多年中都不能摆脱这种变形所带来的后果。

民主化是唯一的保障

对内对外政策国际化，才能使国际社会具有基本的道德价值

和人道主义价值

安东诺维奇：在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中，争取和平的战略得到了全新的、目标明确的表达。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讲话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消灭军国主义，争取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克服“第三世界”尖锐的危机现象，这样就能为社会解放和进一步吸引千百万人投身于历史性的创造活动提供条件。因此可以说，党的对外政策新战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它具有道德的标准。

这就有可能在20世纪末使历史乐观主义作为全人类的哲学得以恢复。而除全人类的乐观主义外，还有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使世界共同体具有基本的道德价值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并在这一基础上将世界共同体推向21世纪。只有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活动朝国际化发展，这些价值才可能实现。

皮亚德舍夫：在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苏联社会全面的民主化进程中，我们依靠的是列宁无比珍贵的遗产和我们自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有益东西。我们还有一个源泉，就是朋友的经验。当前十分重要的是注意研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

南斯拉夫的民主化和开放边界的作法有可借鉴之处

比如，南斯拉夫自治制度有其长处和短处。如果我们注意研究这些利弊，那么我们就可以节省出多余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可以避免犯错误和取得成功的方法。比如说，吸收政界和社会各界参与制订和实现直接涉及居民利益的决定。

当然，不能完全同意南斯拉夫的经验，有些东西明显地过头，比如说，批准条约，甚至任命大使问题也需要通过93

个不同级别的组织。我们觉得这样做太过份了，但这是南斯拉夫人的事。重要的是另外一个方面：有这么多的人和组织参加决定问题，因此民主化在排除了个人迷信和滥用权力的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来。

还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从60年代初起，南斯拉夫开放边界。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家没有护照，只有公民身份证。用身份证代替了护照后，南斯拉夫人很自由，他们可以随便到任何与南斯拉夫有互免签证协议的国家去。这种互免签证协议不仅和所有欧洲国家，也和别的大陆的很多国家签署了。当然也有这样一些人，由于安全原因，由于有犯罪情况等等，不发给他们护照。但大多数公民是可以自由出国的。

现在约有100万南斯拉夫人在国外。近年来又掀起了第二次迁居高潮，这次移居国外去的是有技术的知识分子。

“智力外流”给南斯拉夫经济带来了不良后果。但是，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认为，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南斯拉夫人，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有好处的。南斯拉夫人以这种方式打入西方高技术领域，然后再回到祖国利用所取得的经验。在国外赚得的外汇存入了南斯拉夫银行。这样，一面筹集一定数目的资金，一面就开办私人作坊、餐馆和其它企业。所以南斯拉夫人在对比开放国境政策的利弊时认为，他们得到了好处。更不用说有关人权、迁徙自由等等政治敏感的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现仍缺乏用社会舆论修正外交决策、检查外交是否符合内政目标的机制

蒙强：我想在这方面谈些看法。在大大加深我们生活中的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情况下，国家对外政策领域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仍处于批评和社会监督之外。问题主要不在于对外政策通常是由少数人“秘密”制订的（虽然也可以用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来解释，说这些问题只须有专家参加解决即可，也可以说在一定时期内部分消息尚须保密），而在于现在缺少用社会舆论修正决议的机制，缺少监督对外政策是否符合国内政策主要目标的机制，缺少协调军事领域中和国际舞台上的行动的机制。

没有广大群众参与讨论外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行动，就很难想象我们能以什么方式来实现业已提出的把国际关系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一目标。

苏联国际形象的改善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改革

И·Т·亚宁（历史学副博士、科学部副主任）：国外对我们对外政策的一切行动和倡议的认识都以近几十年的国内政策为前提。对于过去我们社会中占上风的犬儒主义，虚伪道德，对于社会结构僵化，“取消”社会舆论等等，也就是对于一切只能引起停滞的坏的干扰，现在我们已经说得和写得很多了。知道这些的不只是我们。在西方，无论是严肃的学院刊物，还是低级的报纸，都已充分地加以报道。行政命令式的体制塑造了我们的形象，这一体制的实质也影响到外交的行动。因此我认为，当前苏联对外政策威信的提高，国外同情苏联的情绪明显增长，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而是因为我国国内的改革政策，改革已成为国际生活中的最重要因素了。

在批准中短程导弹公约的过程中，在最高苏维埃，其中包括工作组在内第一次开始了比较广泛的讨论，树立了良好的开端，但仍很不够。在我们的议会中建立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必要性业已成熟。

我们敢于公开地谈论自己的过去，正如我们的伙伴所认为的，这就是我们不再重蹈覆辙的一个保证。那种曾使西方社会舆论感到如此恐惧的“坚如磐石”的社会正在消失。国家的领导主张同知识分子和舆论界对话，谈到必须信任他们。这就自然而又必然地加强了对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所发表的种种言论的信任感。

一切形式的垄断都有害，还没解决外交决策中的垄断问题

政治理论家的任务不少。我们中间是否很多人都能明确解释什么是国际关系中的非意识形态化？而什么是“合理的足够程度”？如果是全民国家，“阶级的对外政策”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深入地对这些和其它范畴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由于在相应的党政文件中我们找不到必要的“规定”？怎样才能避免对外政策决定制订中的主观主义呢？怎样才能打破对外政策决定制订中的垄断局面呢？一切形式的垄断都是有害的。什么是对外政策的民主化，什么又是人民外交？

而这又仅仅是我们的政治理论家当前正在小心翼翼进行试探的那些领域中的一部分。科学的浪潮正在冲击，但遗憾的是战线尚未铺开，而是采取了突破的方式：时而在一个地方突破，时而在另一个地方突破。

人民外交重要，但是准备不足

E·A·诺任（哲学博士、思想工作教研室教授）：所谓人民外交，显然可以把它说成是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国际交往，以便在整体的矛盾的世界中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当然，首先是解决在火箭核时代的生存问题。有时人民外交能够取得使职业外交家们望尘莫及的成就。比如说，通过宗教组织来解释我们政策的实质，由于美国和欧洲业已形成传统，这

些宗教组织都同广泛的社会阶层保持着联系。

苏共中央研究了进一步改进苏联公民因公出国的问题。由于我国外贸、生产和文化部门直接对外交往，今后前往资本主义世界出差的人数将会激增。善于和国外听众交谈，善于使对抗转变为对话，这应当成为这些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可是正如最近卫星转播所显示的那样，有时我们在故作姿态，苏联的爱国主义成了自吹自擂。我们不应该求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使我们的交谈者满意，应该明白，对方在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下生活了几十年。

苏联和经互会各国的贸易往来对苏联不利

A·M·沙尔科夫（经济学博士、世界政治与苏共国际活动教研室教授）：我们的盟国和朋友长期以来主要致力于大力发展彼此间的联系。我国与经互会国家间的贸易额总共占我国外贸额的60%多些，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它国家与经互会的贸易额则占70%到80%。这就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关系领域中发展一体化的基础。

但是，给没有指望的外交项目大量投资的事已经干得不少了。外贸部和其它部门的有关机构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工作放任自流，没能改变现状。与此同时，燃料和原料贸易加剧了我国经济中的不利现象，给国家的预算带来了不良影响，从而也给国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仅在70年代后半期，从苏联进口的原料产品在价格上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使经互会的欧洲各国节省了约500亿美元。而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来说，这意味着国家的产品无偿地输出了。可是燃料和原料的低价格并没有刺激经互会国家节约资源生产和热力工程的改造。

尽管在经互会范围内多次就必须平衡贸易问题进行协

商，但多数国家在与我国的贸易中仍长期保持着逆差。很难想象，在苏联的市场上有销路的商品找不到货源。对整个经互会机制进行最重大的调整，即经互会的改革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制度应以广泛社会公正为原则，不应为领袖提高声望服务

卡普钦科：社会主义不是为领袖提高声望和听取应有或不应有的颂扬而设的宝座。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民、劳动者既是金字塔的基础，又是金字塔的顶端。这种建筑物的力量和牢不可破性就在于此。社会主义作为完美的新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区别于过去所有的社会结构，其历史使命也就在于此。这一建筑的基础看来是和顶端一样牢固的，因此它也就不怕任何震动。可能从建筑学和谐规律的观点来看，这里不完全合乎逻辑，也不完全符合其标准。但是，从社会和谐的观点来看，保证这一建筑的完美和牢固性是一定可以做到的。要知道，社会建筑学有它自身的规律。

我想，大家不会曲解我的意思，所谓曲解是说，似乎我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金字塔式的结构。真理不一定就在金字塔的顶端。做这种比较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应该建立在广泛公正的社会原则之上这一思想。而这些原则与个人迷信，停滞现象和社会主义扭曲的其他表现都是不相容的。

要彻底民主化，否则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本身并不能保证不走回头路

奥比奇金：保证不走老路的问题，包括对外政策在内，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常历史学家所固有的那种乐观主义我

是赞同的，同时我也想说，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本身也保证不了不走回头路这一点。只有彻底地和全面地实行国家整个生活的民主化，才可能有这样的保障。

（原文载于苏联《国际生活》，1988年第6期，陈玉荣、夏安平、赖万宁、涂多琳译，崔松龄校）

选择的自由

伊·马拉申科

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紧密相联。对内持一元化观点，对外便难以容忍多元化表现。斯大林曾借冷战来对内加强个人专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行政命令做法。没有内部改革便不懂必须彻底更新对外立场。国际关系需要民主化。选择的自由应成为国际上的普遍原则。苏联认为阿富汗人民应有这一自由。苏美都应把选择自由的原则扩大运用于自己的盟国。

历史的发展有多种方案。当我们思考我们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深信这一点。很多年来，不论是在关于我们国内的发展问题上，还是在关于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问题上，我们一直过于听从“最高真理”的左右。今天我们看到：抉择是存在的，这过去没有注意到；错误也是存在的，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本文作者伊哥尔·马拉申科是苏联历史学副博士。——编者

对未来的教训

社会主义多元化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最佳方法

但是，历史没有假定式。已经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便是事实，对事实可以承认或者保持沉默，但不能加以改变。对未来说来，必须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不能遮住眼睛走历史的道路，而不看“周围地区”，不看周围的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社会过程。或许可以用影片《悔悟》中的隐喻的话来说，道路不通向殿堂，但这只能责怪自己，我们谁也不能责怪。

探索新的道路被宣布为政治邪说，而且选择的权利事先就被否定了，这使人类遭受了许多不可弥补的历史损失。见解、政治立场的多样性，不过是社会发展在客观上有多种方案的自然表现。因此，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并不是不可信的奢谈，而是我们社会发挥正常活力的必要条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我们还要克服我们当中很多人的那种把多元化视为异端的根深蒂固的态度，要知道，数十年来，坚如磐石的统一，我们社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一直被宣布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我们的社会应当是多样化的统一体，而我们不可能回到死气沉沉的“一元化”时代去。

对国内问题持一元化观点，对国际上的多元化表现必然持怀疑态度

对外政治是对内政治的继续，社会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必然反映出它关于自身的观念。多年来，我们对国际舞台上

的多元化表现实际上是持深刻怀疑的态度的。而在这里问题不仅涉及我们的思想方针，而且涉及国际现实。

“……他就是反对我们”？

数十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当然总是构成一幅五光十色的图象。但是，这往往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它后面隐藏着几个大国的统治，而其余国家充其量只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尽管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世界霸主，但国际关系却具有深刻的反民主的性质。

对于美苏对抗长期持你输即我赢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两极的，即“双极的”结构，其中扮演主要的对抗者角色的是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打牌规则简单化到了极点。美国的每次“赢牌”都被看作苏联的自动“输牌”，反之亦然。国家关系的极端意识形态化，产生了对世界的黑白视觉观，即世界被明确地划分为“自己人”和“外人”、“朋友”和“敌人”。从对抗的主要参加者的观点看来，下面这个老口号表现出了对外政策智谋的精华：“谁不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反对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每个国家在这场全球性的对立中都必须清楚地确定自己的位置是在这一方还是在那一方。这样一来，选择的自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就变得非常有限，甚至根本不存在了。

美国制造的冷战便于斯大林借此加强个人专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行政命令方法

“冷战”首先是美国的杰出人物作出的选择，这些人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寻求过动员美国社会支持华盛顿的全球实力方针的办法。而他们的这种选择又使斯大林有可能在我们社会中保持一种“被全球包围”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他在国内加强个人专权制度所必需的。这也使他能够在同那些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关系中更顺利地推行行政命令的方法。

然而，到了后来，我们的行动则往往只是对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的反应，尽管不总是对等的反应。由于对待对外政策采取这种立场，我们选择的自由就是很有限的了。我们陷进了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集中一切力量从军事方面与帝国主义抗衡，却不去充分地利用加强我国安全、改善国际环境的政治工具。不过，对我们的主要对手来说，在国际事务中进行选择的余地最终也是极为狭小的——“冷战”的逻辑不让人们看到当前世界上的实际变化。

没有对内改革，便无法认识到必须彻底革新对外立场

假如没有我国社会内部的改革，我们未必能够理解到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立场彻底革新的必要性。我们已经认清国内的官僚主义命令方法的弊病，并且提出关于这种方法对我国对外政策的消极影响的问题。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有时甚至连一些重大的决策也不经过集体的全面的讨论和分析，有时也不同朋友们进行必要的磋商。

乍看起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的领导人是有最充分的选择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当了自己偏见的俘虏，甚至都不去设想解决某些问题是可能存在抉择方案的。对整个社会来说，这种立场使我们支付相当多的费用，因为“并没有时刻考虑某一种行动方案将使人民付出什么代价，会导致什

么结果”（戈尔巴乔夫）。但是，社会并没有选择，选择是别人为它作出的，虽然用的是它的名义。

对付行政命令体制的专横的可靠办法，只能是社会的彻底民主化。没有选择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我国对外政策问题的公开讨论已经开始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民主的讨论，就能很好地保证任何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我们的任何一个重要的行动方案都不会被社会所忽视。

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权利

国际关系需要民主化，自由选择是各国的权利

国际关系也需要民主化。选择的自由也应当成为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成为它们甚至不顾最强大国家的态度而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忍让不仅应当成为文明社会的成员之间的行为准则，而且也应当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的行为准则。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每个社会都受到传统和偏见重负的影响，因此总是倾向于不仅把自己的选择看作唯一正确的，而且还总要把它强加于人。

美苏对抗将完全失去意义

这种立场今天不仅是毫无前途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它所以毫无前途，是因为当代世界具有多样性，这可以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忽视这一事实只会对自己有害。承认自由选择的原则的通用性，意味着使自己的观念适合于当代的现实，这也是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前提。当然，可以故意认为过去几十年当中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世界照旧是两极世界。但是，最近时期美国和苏联与其说是象各自团结一致的大军

的首领，不如说是象当着众多的观众彼此被无休止的角斗弄得疲惫不堪的角斗士。结果双方就面临着这样的前途：从国际发展的实际过程的观点看来，它们的对抗将完全失去意义，而否定其他国家的选择自由，将会犯可怕的混淆时代的错误。

否定选择的自由是不道德的

当关于人类文明的存亡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出来的时候，不接受选择的自由是不道德的。否定选择的自由，只会导致一切国际冲突的加剧和产生新的冲突，使人类越来越走近它的灭亡。况且，今天看得很清楚：威胁我们生存的不仅有堆积如山的核武器，而且还有文明本身活动造成的其他后果，例如，环境所受到的灾难性的污染。尽管人类文明硕果累累，但人类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仍然食不果腹，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妄想垄断真理和反对各国人民（其中许多国家的人民还刚刚成为世界历史的实际主体）选择的自由呢？

只有靠榜样的力量

我国在严峻的历史考验中曾经维护了作出选择的权利。因此，我们也很关心那些选择建设新社会的道路的各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始终竭力帮助它们维护这种选择。许多国家的人民把苏联看作他们同帝国主义干涉作斗争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中的停滞不前和保守趋势的发展，军事援助竟成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进行援助的主要形式之一。于是我们又重新被帝国主义拖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军事实力桥头堡的斗争之中。

应该让阿富汗人民有选择的自由

我们不想对我们的朋友的不幸袖手旁观。但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地提出一个社会应作出什么样的现实的选择。在7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可能深信阿富汗只会选择社会主义，对这种选择是应当支持的。然而，从实际上看，阿富汗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力图作出具有很大的历史和民族独特性的选择。新的政治思维使人们能够清醒而客观地估计现实，而今天，由于日内瓦协议的签定，阿富汗人民就有可能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政治方面充分地实现自己的选择权利。

苏美也应该让盟国有选择的自由

选择的自由，这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有“登场人物”都应当遵守的通用的原则。但是，比如说，美国就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缺乏应有的热情，尽管在它国内实际上存在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它还大唱高调标榜自己酷爱全世界的民主事业。要知道，选择的自由还应当扩大到自己的盟国，而对华盛顿来说，好象放弃“结盟”思想是特别困难的。关于同时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建议不就可以使情况有所缓和吗？即使这个前景目前看来还很遥远，但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今天就应当以更多理解和忍让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盟国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所作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必须摒弃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搬到国际关系上来的作法。当然，每个社会都有权相信自己的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每个社会在接受自由选择的原则的同时，都不能用暴力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别人。要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选择，只有靠榜样的力量。

（本文原载于苏联《新时代》，1988年第29期，张秀珊译）

和平共处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Г·季利根斯基

苏联国内仍有人不愿放弃“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一公式。这反映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的怀旧情绪。没有内外敌人便不可能有斯大林制度。斯大林需要国际紧张局势，以对内维护镇压统治，对外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加强对西方的仇恨心理。

发展新的政治思维要求我国对内对外政策、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基本目的要有透明度。显然，正是对这种透明度的渴求引起了对“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一著名的理论公式的批评。

我国所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对象”是由资产阶级执掌政权的国家，而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个词有什么含义的话，可能就正是旨在反对那个资产阶级。

防止核灾难是工人阶级最高最迫切的利益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和平共处是与工人阶级、与其他反

* 本文原题“透明度好处谈”，现题是我们改的。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作者季利根斯基是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总编辑。——编者

帝运动的阶级斗争的利益相一致的。防止热核灾难，是这个阶级最高的最迫切的利益所在。和平共处能为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因而也就是为实现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理想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有效地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能加强民主进步力量的地位，有助于它们孤立帝国主义反动派。但是，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与和平共处的政策之间的这一相当复杂的相互关系简单化，把两者之间的关系混同起来，那就不对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述那个公式会使我们的国外敌人如此满意，他们蛊惑人们不要相信“苏联是爱好和平的”。若把这个公式再同赫鲁晓夫的名言“我们要埋葬你们”联系起来，那就很容易证明，和平共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共产主义扩张政策”的诡诈伎俩而已。

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同胞为什么也不愿意摒弃这个公式，这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我想，这里有实质上不同的两种理由在起作用。一方面，有些人的想法是他们担心摒弃世界舞台上的阶级斗争会导致对革命原则的背叛，会导致我国政策反帝目标的削弱。

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那些怀有类似忧虑的人不妨想一下，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对革命进步事业的主要的决定性贡献在于社会主义的榜样具有吸引力。今天比任何时候看得更加清楚，当社会主义暂时还未证明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物质和精神领域，在发展个性的民主和自由方面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情况下，就未必能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会掀起争取社会主义的群众斗争高潮。社会主义只能在与资本主

义展开和平竞赛的过程中去证明这种优越性。

回击帝国主义反革命输出，要同防止核战争的任务相结合

与此同时，和平共处的方针并不意味着对帝国主义政治的某种宽容。回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包括回击输出反革命的行径仍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方针的重要原则。但是，这种回击的具体形式在当代条件下应当与更高的全人类利益，即防止世界性热核战争的任务结合起来。认清世界舞台上各对抗阶级利益之间斗争的现实性是一回事，把和平共处政策看作为这一斗争的工具（或者“形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的立场无异于拒绝这一政策的总目标：保障持久和平，把敌对的社会体系的对抗不可逆转地引上两者之间开展和平竞赛的轨道。

在维护这种立场的企图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诚然，这些理由并未率直地表达出来，只是被一种似是而非的“阶级”分析方法掩盖了起来。实质上它们反映的是对个人崇拜时期的怀旧之情，是一种不愿意接受我们社会的革命性变革的感情。

斯大林需要国际紧张局势来维护在国内的专横统治

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与其对内政策相互关联的。这也完全适合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方针。这里同样存在许多有待历史学家去填补的“空白点”。但现在也已经发觉这一方针的自相矛盾之处了。战后年代，苏联的外交活动旨在揭露战争贩子，为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竭力阻挠使帝国主义挑起的“冷战”变成热战。但是，这一活动中缺少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真正关心，缺少对舍弃“实力地位”政策的真正关心。斯大林为了在国内维护其专横的镇压统治，也为了把这种权势扩大到社会主义体系的其他国家，就很需要这种紧

张局势。因此，就用加强对西方的仇恨心理去回答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所实行的反苏主义。这类因素大大地削弱了保卫和平政策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损害了这一政策的效果。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用以颂扬斯大林的权势，斯大林实行大国主义

战后年间，苏联人的爱国主义，由于战胜法西斯主义而高涨起来的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被用来颂扬斯大林的权势。国家的威力和尊严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大国主义”逻辑取代了真正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价值观念，替破坏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替针对全民族大搞恐怖活动的做法开脱罪责。这个逻辑掩饰背离国家政治理应坚持的社会主义目标，诸如增进劳动群众的福利，发扬民主等等。所有这一切也不能不反映在国家的外交活动中。

没有内外敌人，斯大林的制度便无法存在

如果没有内外敌人，斯大林的制度就无法存在，因而这一制度就必定要设法让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心怀恐惧。《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声名狼藉的反改革宣言的政治理想就是这种货色。要知道，这篇宣言的作者用令人非常难以捉摸的解释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与世界资本相对立的国际工人阶级的机构”去偷换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的阶级关系的命题的。这并非偶然。这是配合反苏宣传的明目张胆的“伴唱”。要知道，如果我们跟着尼·安德列耶娃承认我们国家决不仅仅是我国人民的机构，那么我们会使它有理由将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它自身的疆界之外去……

和平共处政策的目的在于防止核战争，还要发展国际信任与合作

真正的彻底的和平共处政策所要建立的并不是惧怕武力

的和平。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防止热核战争的威胁，而且要使这种战争不可能爆发，要发展以合作和相互信任为基础的，有助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关系。我们国家、我国的政策应当唤起各国人民的不是恐惧，而是信任。这是一项充满无核世界、公开性、民主化、民族平等思想的政策。我们越是彻底地摆脱国际关系中武力对峙观念的羁绊，摆脱支撑这种观念的各种诡辩说法，就越能迅速地达到这一目的。

（原文载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88年第6期，袁坚译）

意识形态互不相容，但是……

弗·库兹涅佐夫

国际关系需要也有可能非意识形态化，这包括：选择自由，不制造“敌人形象”，抛弃领导世界的野心，不以意识形态标准确定政治立场，善于在国际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分歧。

两种意识形态互不相容，但是应该摒弃排斥一切异己思想的态度。要承认并努力激发人们的全球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确立全人类的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这将在世界上更得人心。

当今世界上，许多事情在发生变化。在新思维的影响下，国际政治无论在整体上或在局部上都变得更加平稳，更加明智。我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新的观点看待事物，而不再局限于在我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陈规旧习。我们对于和平共处的概念，对于本国的和国际的安全，对于军事因素的作用，以及对于许许多多其他事物的观念，都得到了更正。

那么，意识形态呢？它在新的条件下是否也在改变？

不是光靠面包活着

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未减弱，人类活动也依靠人类价值观念的整个体系

在当今世界上，在科技革命主宰一切，种种经济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极端紧迫，人们不得不为摆脱战争和生态两大灾祸而紧张斗争的形势下，意识形态的作用丝毫没有减弱。存在决定意识——这是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了的一个公理。但是也有意识决定存在这种反馈现象。我们看到，新的政治思维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新的世界的前景。它不仅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而且已经开始作用于世界政治。

尽管世界为种种物质问题所困扰，但是，它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在努力寻求对自身，对自己精神的、智力的和文化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作更深的认识和估价。总之，人类并不是光靠面包活着。人类活着还靠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民主和进步的思想，靠千百年来形成的全人类价值观念的整个体系，以及其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公正和民主的和平。

历史上有过不少次“十字军讨伐”，它们不仅是为了掠夺别国的领土和财富，而且是为了惩罚和迫害异端思想，异端信仰。回顾一下不久以前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表现得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战争。例如，协约国曾经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德国也曾力图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意识形态斗争仍然起着极大的

危害作用。正是这种斗争，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就导致了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铲除共产主义”的学说，导致了“核威慑”的观念，产生了经济上和工艺上排斥世界社会主义的方针，产生了“里根主义”，这个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地球上到处都有“莫斯科之手”。

意识形态公理不容冒犯。思想斗争的残酷无情有时并不亚于战场上的厮杀。如果说有一些人这些年来一直鼓吹“铲除共产主义”的话，那么另一些人也就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予以回报。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赫鲁晓夫那句感情冲动的話：“我们要埋葬你们。”还有其他一些过火的言论和行动，它们给了某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用来指控所谓的“赤色危险”、“共产主义扩张”，谴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侵略性”。

“十字军讨伐”已经告终

两种意识形态不可调和，但国际关系需要也有可能非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的对抗是否影响了世界政治，危害了国际关系？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是现实主义者了。不过这种对抗终究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客观事实。使这种对抗非意识形态化（这样的口号过去提出过，现在也还在提）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迫使人们想得一样，或者说，不可能使当代文明的智能潜力划一化。

然而，象国际关系这样的领域，是可以而且需要使它非意识形态化的。这不是什么善良的愿望，更不是天真的愿

望，而是核与太空时代的生活本身提出的庄严要求，这个时代已经使“十字军讨伐”（既包括军事上的讨伐，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讨伐）彻底告终。它只要求在意识形态分歧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以求得共同的生存。但并不是说要实现某种趋同或建立某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互相对立的两个极端。列宁的要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二者必择其一的论点，仍然完全有效。

也不是说要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牺牲自己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和平。需要在制度对立的国家之间建立关系方面，在军事政策、安全政策的各种问题方面，不要掺杂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战争与和平的各种问题上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要使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完全符合各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保护人类文明的利益、国际安全的根本利益。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这样做了。这个做法在提交联合国的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共同提案中已经做了陈述。建立这个体系不仅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任务，也包括人文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草案中关于人文的部分规定，在传播和平与裁军思想方面，在实现人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人在和平条件下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实行国际合作。草案认为必须加强各国人民相互谅解与和谐的精神，增进他们彼此对各方面生活的相互了解，根除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根除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排他性。

这就是国际关系走向非意识形态化和人道主义化的途径，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消除人和人类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的

途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对手都面对着一个现实的根本理论问题，即在现实的世界发展中，从而也在政治中，把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结合起来的问题，成为世界性的实践。

非意识形态化的五条要求

非意识形态化就是承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作出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选择的自由。

非意识形态化就是不要去制造“敌人形象”，不要把“潜在的对手”描绘成凶神恶煞，使社会意识军国主义化，放弃“心理战”的教条和粗暴的恶意宣传，放弃所有在国际交往中被认为属于精神侵略和帝国主义情报活动的行径。

非意识形态化就是抛弃“领导”世界事务、强迫别人改变自己的信仰的野心。

非意识形态化就是不以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和成见确定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非意识形态化就是善于在政治上、在国际关系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

关注全人类的问题

符合人道主义目的的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价值，已出现全球意识

意识形态互不相容。但是它们同新的政治思维应当是能够相容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要它服从于维护世界上的生存和文明这一人道主义目的，它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要它具有崇高的合作思想而有助于和平，

它就具有一定的价值。

两种意识形态在许多方面继续决定着我们这个矛盾同时又互相依存的完整的世界的面貌。但是我们也看到，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全球意识。弗·伊·韦尔纳茨基^①就曾经得出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觉活动的结论。这种智力的活动境界被称为智力圈，智力圈越是能更好地得到开发，更有效地得到充实，我们这个共同的世界就会越美好，越有前途，越完满。社会主义只要不以空泛的宣言，而以其对于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全人类理想的切切实实的奉献，以其对待生活中各种现象的真正科学的态度，在发展和丰富人的全球范围的自觉活动方面就可以大有作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确立全人类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

要记住列宁的话：“……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②改革使正在革新的社会主义能够保证在国际化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说也是这样，它的使命是要使自己成为全人类团结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确立全人类的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树立崇高的理智、道德和精神原则，在世界上造成摆脱偏见、猜疑和敌意的新的健康的气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要使正在形成中的对全人类一切问题、即对人类的烦恼、不安和痛苦的关注心理国际化。

① 苏俄理论生物学家（1863—1945年），智力圈学说的创建人之一。

——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39页。——译者

容忍异己思想

意识形态需要现代化，对异己世界观要多一些宽容

看来新思维对政治要比对意识形态更容易发生影响。意识形态比较更加拘泥于陈规旧套，对变革和外界影响具有更大的抵抗力。但是意识形态这个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武库，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也需要现代化，需要更新，要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

时代迫切要求我们摒弃一切偏激和狂热，一切对异己思想的极端粗鲁的排斥，以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上采取的势不两立的态度，摒弃那种宁死不“赤化”的想法，同样也要摒弃宁死不“白化”的念头。尽管东方和西方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它们无论如何不应该象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①那样毫无意义地互相仇杀。多一些对异己思想观点的宽容，多一些对异己的世界观的容忍——这是我们这个渴求和谐融洽的世界提出的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之一。

意识形态的互不相容，绝不意味着在寻求极为必要的国际信任上，在实现团结全人类致力于全球各个方面的社会进步的全盘计划和设想上不能相容。对话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政府之间，议会之间，政党之间，各国人民之间都要进行对话。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专家们也该从独白转向对话了。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得人心的是能够激发人们树立全球意识的

^① 这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个世代为仇的家族。——译者

意识形态

……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理想和价值观念体系在相互斗争，并加强自己对世界社会意识的影响。谁也无法禁止或取消这种斗争。不过既不当应当把它看得过于复杂，更无须对此忧心忡忡，因为思想的交锋能够得出真理。主要的是不要让意识形态的竞争转移到将不会有任何胜利者的战场上。

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更好？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更得人心？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更符合人民的意愿、时代的要求？这些问题应当让人民和历史来回答。这就是因人类许多世纪来的经验而聪明起来的新政治思维向我们提示的。

显然，更多的成功机会将属于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理解当代的问题和需要的意识形态，将属于能够吸引各民族的精英为人道主义、和平和全人类的理想献身的意识形态，将属于能够激发人们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在统一而完整的世界里树立起全球意识的意识形态。

（原文载于苏联《新时代》，1988年第32期，周秀凤译）

和平共处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阿·鲍文

过去断定和平共处原则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有人甚至断言这种关系不应包括互不侵犯原则。这出于以下认识：各国利益完全一致，把苏联经验强加于人理所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和平关系不言而喻。这都属于斯大林主义。现在苏联已改变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不恪守和平共处原则，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理论上，不再把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准则同资产阶级的民主准则截然分开，而认为应以新的现实内容充实后者，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民主准则，实际生活说明，使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一致有许多因素，包括：各国的不同利益，民族主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传统，各国关系中的历史积垢、领导上的可能错误言行，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早在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般民主基础即已得到巩固。

和平共处原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长

* 本文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作者阿·鲍文是苏联《消息报》政治评论员。——编者

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行，不适用。在论证这一观点时，通常的依据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起主要调节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各国之间基本上不会发生战争。因此，他们之间的“共处”按定义来说就是和平的。

在达曼斯基岛^①事件之后，在中越冲突之后，又说这不过是“偶然的”、“特殊的”情形，不能据此在理论上作出结论。但是这些情形同理论的相互关系是颇具戏剧性的。只要有一种情形无法包容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中，那就足以说明这些理论框架必须改变和扩大。

不恪守和平共处原则，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把和平共处原则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领域，这也可以用较为一般的理由来说明。问题是这项原则并非只限于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它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法律结构，其要素是国家间关系的一般民主主义准则（互不侵犯，平等，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等等）。如果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存在、它在社会主义类型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作用不以恪守普通的民主规范这一坚实基础为依托，那么，这种原则就不可能实现，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扭曲。

今天，这一思想似乎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但只是在付出了许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各种错误、冲突、危机局势之后，这一思想才牢固地进入理论，成了实践的基础。可以说，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这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同一般民主准则对接和结合的长期过程，上述准则的总和构成和平共处的现实内容，国际主义并不排斥和取代和平共处，而是对它加以充实和丰富。

^① 即我国的珍宝岛。——译者

现在，问题已经提出，对其答案也作了概括的表述，我们再来较为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吧。

—

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原则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国际关系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形成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范围中排除了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国际主义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第二，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学说和革命运动中国际主义关系的经验的基础上，准确程度不同地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和规范；第三，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规范适应了新的条件。如果说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制定和深化划清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类型的国际关系同旧的资产阶级类型的国际关系之间的界限，那么，以新的现实内容充实资产阶级民主规范并使之变为普通的民主规范，就体现了全世界国际关系体系发展中的联系和继承性。

马、恩、列对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性质只作过最一般化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仅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作过最一般的论述。马克思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由普通道德规范来进行调整。恩格斯认为每个民族的独立是在为共同目标进行的斗争中实行“和平和自觉”合作的必要条件。同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不难看出，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要超出民主主义的原则和规定，而

且按其本质说来将要依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运动中民族的东西和国际主义的东西之间、独特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全部复杂性。他们懂得，按其性质说来是国际性的工人运动，是在民族的范围内、在一定的国家构成体的疆界内发展的。因此，它不能不适应该国社会政治环境的特殊条件，不能不受到同某一民族属性有关的感情、观念和传统的稳定的综合体的影响。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对民族的东西和国际主义的东西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相互联系有个正确的估计，这实际上就是国际主义问题，就是将工人阶级各支队伍的努力联合起来的问题。这个方针要求在两个方面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伪装革命的世界主义、对待民族利益的虚无主义态度，也反对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实行闭关自守、将特殊利益置于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之上的企图。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活的灵魂和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密切相关，它是科学的革命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

社会主义国家间应有和平的关系被视为不言而喻

在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阐述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性质的看法的为数不多的文件中，可以举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决定。决定中说：“只有那些符合各国和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兄弟般关系并由十月革命宣布的原则才能成为各国人民真正和平的基础……。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关系将不仅是和平的关系。这将是各民族劳动群众在其为在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

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结成的联盟”^①。这里所说的符合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关系和联盟的原则，就是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应该注意“不仅是和平的关系”的提法。这就是说，和平关系、“和平共处”可以说被看作某种十分自然、不言而喻的东西，既不需要专门的分析，也不需要专门的论证。至于可能发生的冲突，那么当时并不是从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角度、而多半是从每个国家的政策中民族的东西和国际主义的东西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来考察的。

列宁提到自愿联合、充分信任、小心谨慎、极其关心各个民族利益等原则

列宁没有等到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出现就去世了，但在他这个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范畴来思考问题的人看来，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深刻的国际主义现象。我们在列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大大超越自己时代的思想和意见，这些思想和意见过去和现在都是理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复杂性、调整好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指导方针。他写道，新社会，这“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②列宁在说明这个思想时，强调指出，“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③当列宁说这些话时，这些话并无现实的实践的内容，因为这种内容只能由历史来充实。我们只

^① 《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566页。——原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1页。——译者

^③ 同上。

有现在才能认清列宁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所具有的全部原则性和启发性意义。

列宁领导着一个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国家的共产党，他对民族关系的原则极为关注。在思考各族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的发展道路时，列宁写道：“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暴力，它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对兄弟般团结一致的明确认识，完全的自觉自愿。这样的联盟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谨慎地去实现这种联盟，不要把事情弄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设法消除许多世纪以来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私有制以及瓜分和重新瓜分私有财产而结下的仇恨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①。还有一个经典的论题：“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②总之，自愿、充分的信任，十分耐心和谨慎，极其关心各个民族的利益——按照列宁的说法，这就是自由的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关系”的政治（和心理）前提，也就是兄弟般和同志式关系的前提。

列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

然而，尚在这些前提得以变成新型国际关系中的生动内容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获得政治存在之前，它们已在苏联的疆界内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46页。——译者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39—240页。——译者

曾经是个复杂的过程。没有先例可循。各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彼此发生了冲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倾向有所表现。列宁不顾疾病缠身，参加并指导了辩论。在苏联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他开始口授其著名的报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列宁在这方面写道，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①列宁一再坚持认为在对待少数民族、“小民族”方面要“非常谨慎”，“非常客气”，“让步和温和”。

1923年7月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苏联宪法开始生效，《消息报》写道：“我们为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合理的国家制度的新榜样……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组成给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确定了未来的各国工农政府无疑会加以利用的一种新的经验……”。后来这样的政府在出现时，确实确实依靠了苏联的经验。这一经验在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无论从解决每个国家国内民族之间的任务的角度，还是从调整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说来都是如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52页。——译者

二

斯大林主义强调的是各国的一致性，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因此被冲淡

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只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当新型国际关系开始形成之时才开始出现的。促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相互接近的思想政治基础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首先是通过苏联向年轻的尚待巩固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形式来实现的。但当时的实践和理论均曾受到斯大林主义的严重扭曲。

只要注意一下战后头十年的科学文献和政治文件即不难看出，一种简单化的、肤浅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规律和性质的看法占了上风。当时所设计的大致是这样一个公式：同一种所有制体系，同一个阶级掌权，同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利益一致、政策一致，绝无冲突和矛盾，友谊牢不可破，等等。这样一来，诸如平等、互不干涉，尊重主权之类的相互关系准则便有意无意地被掩盖起来了。在理论上是清楚的，这些准则继续有效，而且正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们不再是形式上的规定，而是有了充实的现实内容。这些准则被载入调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所有条约中。但实际上把侧重点放在了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性、坚如磐石的团结、兄弟国家间牢不可破的友谊方面，而没有放在那些突出各国的独立自主和相互平等的原则上。

各国的实际利益和领导人的认识远非永远一致

从理论上讲，这样的“侧重点”是不应存在的。从理论上讲，牢不可破的友谊应当同相互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但问题

正在那种符合原则、符合理论上非常明晰的抽象概念的历史社会进程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而在实际上、在生活中它表现为阶级和政党的活动,表现为制定政治方针的人物的活动,这些人不仅受原则的支配,而且也受实际利益的支配,受自己的经验和自己对事件的理解的支配。而这种经验和这种理解远非永远一致的。同样,实际利益也远非永远一致。于是就为理想与现实脱节、原则与实践脱节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始于1948年春的同南斯拉夫关系中的冲突,敲响了关于原则可能同实践不一致的第一次警钟。遗憾的是,斯大林主义的沉重负担,感情上的冲动,当时那种远非创造性的气氛,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不成熟,这些都妨碍了对冲突原因进行内容丰富的分析,并从中汲取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50年代苏南关系正常化只被视作“个别情况”

始于50年代中期的在苏共中央倡议下实现的苏南关系正常化,突出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一般民主规范的重大意义。这是正确的和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因为苏南问题被视为“个别情况”,其解决办法在当时并没有在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相互关系的性质的一般概念中得到反映。

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情况是复杂的。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苏联、苏共竭尽全力巩固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阵地,使他们团结成为兄弟般的大家庭。我国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出发,乐于介绍自己的经验,帮助训练干部,发展经济和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支持朋友。另一方面,斯大林时代的惯性在继续发生影响,平等原则遭到破坏,并非总是考虑到兄弟国家的特殊性,对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感并未予以应有的注意。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团结。在表面上“坚如磐石”的后面,怨恨和恼

怒的情绪在蓄积，形成了民族主义分子得以滋生和反苏情绪得以出现的土壤。^①

苏共二十大指出必须坚决摒弃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方面的错误做法。但是新方针的实施步履艰难。必须克服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的惯性，重新认识一些看似一目了然的原理意义。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表明，在客观上业已成熟的变革受阻和政治领导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条件下，局势可能失去控制并且带有危机的性质。亚·卡达尔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过，前匈牙利领导人的错误“主要是忽视匈牙利的特殊性和民族特点……”^②。正如事件所表明的，这不仅适用于匈牙利。机械的、往往是强加于人的对苏联经验的复制，对平等原则的贬低，这些既给内政、也给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带来了困难。

问题在于民族利益与国际主义、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原则如何结合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纠正错误，必须理解它们，必须对革命运动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作出回答。简而言之，这些问题可归结如下：怎样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的国家的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结合起来？怎样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种不同利益协调起来？怎样把由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引起的民族自觉感和民族自豪感的洪流导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轨道？^③

① 《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性质》，1964年莫斯科版，第6页。——原注

② 见亚·卡达尔：《文章和演说选集》，1960年莫斯科版，第502页。

——原注

③ 尤·安德罗波夫：《列宁主义是革命毅力和群众创造性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演说和文章选集》，1984年莫斯科版，第76页）。——原注

可见，建立和维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稳定的相互关系问题，不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表现为一个如何把民族利益同国际主义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如何把国际主义同严格遵循一般民主主义准则或者说和平共处原则紧密联结起来的问题。这里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公式和模式。政治艺术就在于：在每个具体的场合下，以对业已形成的情势所进行的仔细研究为依据作出将国际主义的和民族的利益和目标正确地结合起来的决定。如列宁所说，为了“达到”使各民族结成真正巩固的自愿的联盟，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善于在每个具体的场合既顾及某一个国家的利益，也顾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般民主基础得到巩固

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原则的宣言，对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情况的正常化和健康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宣言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兄弟合作和相互帮助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实质上，这是详尽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同一般民主原则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第一篇文献。苏联政府的宣言受到兄弟国家的普遍欢迎。苏联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之间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并签订了新的协定。在这些谈判中，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清除了由于主观原因而形成的扭曲、积垢和摩擦。虽然从现在看来，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充分，这些关系的一般民主基础却得到了巩固。

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结束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第一阶段

在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这个阶段的范围内，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以及将它们的民族利益同世界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复杂性。从各方面情况看来，在这个阶段的范围内显露出一些问题、倾向、情绪，将会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在地理范围上的进一步扩大而继续存在下去。

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无法接受互不侵犯的原则

不难理解，如果没有严格遵循各国相互关系中的一般民主准则作为基础，那么要建立国际主义的真正兄弟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这些准则的总和实质上与和平共处原则无异，构成了这种关系的内涵及其政治法律结构。然而这个事实未被科学地固定下来，我想与其说是由于理论性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因为和平共处首先被当成了非和平共处、军事冲突、战争的反命题，而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仿佛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难以置信的。

赫鲁晓夫的下述论断在当时是典型的：“当我们说共处时，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这些力量相互对立，它们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为了使这些矛盾不致引起战争，就需要共处……简而言之，共处原则的目的就是不准打仗。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没有斗争和仇视……”

“因此，将‘共处’一词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未必恰当。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谊和互助

的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①

后来开始有人尝试把和平共处原则引入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其中也断言国际主义原则“好像”包括了和平共处原则。但就是这种羞羞答答的设想也遭到了某些学者的坚决反驳。他们的论据好象是这样的：这种论断“不能同意，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更高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它不能包括和平共处的内容，原因很简单：这个内容中有机地纳入了互不侵犯原则，而这一原则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相互关系中无法接受和完全不可容许的”。^②然而历史再次表明，什么可以容许，什么不可容许，历史有它自己的观念。

早在50年代末，在两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之间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征兆。1960年4月中国领导人多少公开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开始了逐步发展成为长期和尖锐的敌对状态的论战。

60年代出现中苏两国不再和平共处的情势

我们感兴趣的和平共处问题同激烈的思想和政治冲突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莫斯科和北京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本质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也因为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共处不再是和平共处的情势。两个同属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之间仿佛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和难以置信的武装冲突竟然成了现实。

^① 见尼·谢·赫鲁晓夫：《争取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1958年莫斯科版，第106—107页。——原注

^② 见H·M·米诺相：《和平共处法》。1966年罗斯托夫版，第179页。

——原注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提出了为国家关系原则建立理论根据的需要

当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是反常现象，是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抵触的。但是经验表明，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本质”在最早的纯理论中是不会独自存在的。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的发展可能引起不同性质的深刻的变形，其中也包括在对外政策中偏离社会主义“准则”的倾向。这种偏向的摆动幅度可能增大到极限，超出这个极限就可能发生军事冲突、武装对抗。当然啦，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乃是极端的、达到极限的、而且但愿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但问题并不在于此种冲突的数量，而在于其原则上的可能性，在其“可想像性”，这就为理论概括提供了材料，这种理论概括之需要，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也是为了准备迎接未来。未来总是充满着意外情况，未来所包藏的，不仅仅是一些出人意料的好消息……。

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年代里，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稳多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工作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内容充实了。普遍增加了分清主次、不加剧现有（和现存的）分歧、自我批评地评价自己的活动的本领。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其发展的规律性、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原则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当然，每个国家有各自的问题、各自的直接任务，各自对这些问题和任务（极不相同的）理解水平。但也有共同点：发展中消极倾向逐渐增多，与此相应，必须抛弃“初期社会主义”的模式，创造一种能有效运转的国民经济体制，在政治上确定社会主义的多元论，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潜力。

各国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产生了有益影响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最早开始探索新的道路。然后是匈牙利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和围绕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苏联最高领导层保守情绪的加强延缓了、但未能阻止变革的进程。从70年代末开始，激进的改革席卷了中国。从80年代中期起，苏联开始进行根本的革命性的改革。在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中也可以感觉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和发挥职能方面采用了新的方法。

所有这一切均对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充满活力的公开性有助于加强非形式主义的、真正同志式辩论的比重，有助于建设性的讨论和对阻挠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的解决。经济集约化是为了提高一体化过程的效益。相互研究彼此的经验、成就和失误，愈来愈意识到在评价和决定方面的多样化乃是必不可免，这些都有助于更好地相互理解，也就是有助于巩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在《十月和改革：革命在继续》这篇报告中明确地阐述了以40年实践总结为基础的当前对社会主义世界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的理解。照他的说法，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使人们有可能按照公认的原则更好地安排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无条件的和完全的平等。这就是执政党对本国国内事务负责，爱国主义地为本国人民服务。这就是关心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这就是相互尊重，认真地对待朋友们所取得的成就和体验过的事情，自愿的多样化的合作。这就是大家严格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践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社会主义世界今天正在蒸蒸日上，处于变动之中，并正

在探索组织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尽管并非没有阻力，但那种以为存在着无问题无矛盾的世界的教条主义的空想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社会进步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广泛深入的发展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同时，由于一系列主客观方面的恒久不变的因素的作用，旧的困难和矛盾还可能再次出现。

社会主义各国进一步相互接近的趋势是主要的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以及其内部任务顺利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按基本的社会经济参数、社会政治参数和文化参数将会进一步相互接近，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的团结关系将继续加强。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也还存在着另一种趋势。随着一些新国家，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不一样”，“不相似”的效果将再次出现，产生民族利益的差别的条件、产生各种分歧、困难和矛盾的条件将要保持下去。

社会主义国家间发生分歧、处理彼此关系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正是这种趋势决定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方向。正是这种趋势为全面揭示和坚定不移地运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新型国际关系中指导性的、宪法规定的原则创造条件。至于上述趋势之中的第二种，那么，它可以说是反映了一种“环境的阻力”，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成长过程所固有的不均匀性、不平衡性——无论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都是如此。如果说第一种趋势是“有利于”巩固团结和统一，那么，第二种趋势就包含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会暂时削弱团结，产生导致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正常的相互关系的错误。

不能保证各国不作出错误的决定和行动

这里有几个因素正在和将要起作用。首先，社会主义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将超过可见的将来的范围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常”新的问题，其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实验室的条件下预先加以检验的。这个问题要在实践活动中解决，而在实践活动中是不能保证不发生失误和错误的。人们照例是囿于自己的经验、信念和偏见。而以往的经验中未曾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可能导致会使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复杂化的错误举动和不正确的决定。

各国发展水平和传统不同，造成具体利益不同，可能使事情复杂化

那些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处在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不同水平，其社会结构各不相同，革命运动的经验和传统也各不相同，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些状况不能不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需求和具体利益上打下烙印。对一些国家相宜和有利的东西，可能对另一些国家就不适用。客观上在某些问题上的利益不相符合和因此而产生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事情复杂化，因为这些利益在执政党政策中可能会有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反映。

正在建设（或将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国家在经济、社会上的落后，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处于边缘状态的阶层和集团占大多数，缺乏民主传统，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原则的扭曲和各种右的和“左”的倾向创造了条件。

考虑到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即：各国人民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并非凭空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曾是民族压迫、敌视、纷争间的敌视、纷争和互不信任的时代。为了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得纯洁而明朗，使之摆脱怀疑和积垢，摆脱过

去的一切莠草，需要重新翻耕古老的地层。而这在短期内是做不到的。当民族主义情绪的毛病复发，渗入到执政党，渗入到其各级领导的时候更是如此。

以上列举的客观和主观因素都可能加强民族主义的欲望，而当这种欲望哪怕暂时占了上风，就会出现发生尖锐冲突的土壤。

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会起影响

最后，不能不考虑到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影响。如果说以前我们的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推回”社会主义上，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改变并“丰富”了自己的战略。现在他们不仅指望实力，而且把希望寄托在复活和加强民族主义的观点上。帝国主义者以他们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鼓励社会主义体系内的“离心倾向”，挑起该体系中各国间的怀疑和疏远。在这种形势下（在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的条件下这种形势也仍将维持下去）特别重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思想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不断地协调兄弟国家的对外政策，始终不渝地遵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和一般民主性质的准则，其中包括和平共处原则。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上升到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经验的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的管理机制和调整机制将制定出来并回到完善。这将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真正兄弟合作的潜力，并相应将矛盾和误解产生的消极后果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在任何可以预见的发展阶段上，和平共处原则、相互关系的一般民主准则，仍将是兄弟国家合作的基础，仍将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大厦惟一能信赖和支撑的基础。

（原文载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88年第7期，马金文译，张祖武校）

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及其发展趋势

奥温尼科夫

帝国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帝国主义存在的外部条件，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过去不同了。决定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内部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能把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组织视为一体。跨国公司的发展，使超级垄断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军国主义基本上不是经济范畴。军国主义有可能刺激经济于一时，但也会对经济发生反作用。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对军界工业界集团企业加以限制。在社会危急形势下，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超出狭隘阶级利益，以全民族利益为重。西方统治集团有可能增强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把国家利益置于垄断资本利益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不排除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竞争时也采取克制态度。鉴于非殖民化是缩小暴力的历史作用的重要前提，

* 本文原题“稳定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现题是我们改的。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作者理·奥温尼科夫是历史学博士、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编者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出现了排除大规模公开暴力行为的趋势。

世界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三个集团

20世纪在国际关系的实力体系中引起了急剧的动荡和变化。这是世界上蓬勃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国家集团或分系的结果。第一个国家集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第二个、在社会方面与第一个相对立的国家集团的是从前者中分离出来的国家，最初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第三个集团，国家数量最多的集团，是由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大约一百个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它们的特点是：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社会经济方面它们当中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

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是同这三个国家集团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向稳定的世界推进的前景首先取决于如下几个关键问题的解决。第一，如何减少源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及其狂热热衷于军国主义的癖好的主要的战争危险？第二，能否保证年轻国家的自由发展，消除不公平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紧张状态？第三，社会主义首先以其经济政策能使自己对世界发展的积极影响增长到何种程度？

今后社会发展取决于这三个集团的相互作用

归根到底，社会进步和社会倒退的总合力将首先由上述三个最重要的国家集团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由它们加紧努力或放松努力的行动所构成。只有这样，世界文明的未来才能在实践中辩证地和综合地形成。

抑制实力冲动

对和平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使国际关系患战争痉挛症这一有机本性，削弱和消除这一威胁，乃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想求得解决这一任务的办法，就要解决一系列非同寻常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造成战争威胁

这个危险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产生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决定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怀有统治、压迫和扼杀那些不听从恣意妄为者意图的垄断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在这个二位一体的结构中，垄断原则显然占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国家所执行的实力侵略政策是从垄断的实质中派生出来的。

这一政策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在国际的、国与国之间的水平上周期地使用粗暴的武力。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了20年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夺走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尽管如此，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在美国，军国主义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想提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卸任美国总统，后来这个职业军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忧心忡忡地把国内军界工业界集团的膨胀称为“最有挑衅性的”现象，认为它的权力“可能成为几乎是独占的”^①。最近几十年军备竞赛一直不

^① 德·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1956—1961年）缔造和平》1965年纽约版，第615—616页。——原注

断扩大。现在军备竞赛竟搞到难以想象的高空，搞到宇宙上去了。

热核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那么，难道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要葬身在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挑起的热核战争中吗？

社会主义绝不能容忍这样的前景。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曾提出关于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一原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达到了新的分析水平：历史进程，社会进步进程为和平发展，为协调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积极合作和创造性的共同行动创造必要的前提——政治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前提。

帝国主义存在的外部条件和内在规律都有了变化

这方面极为重要的前提当然是根本改变帝国主义存在的外部条件，首先是由社会主义提供军事战略方面的均势保证。尽管如此，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本性仍不能由于外部条件的影响而改变。因此，极为重要的是看资本主义社会里过去必然导致战争的那些内在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否有了改变。

新的政治思维要求认清几个确凿的事实。

资产阶级国家并未同垄断组织融为一体，在危急形势下能够超出狭隘阶级利益，以全民族利益为重

第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国家和垄断组织的完全融合、结合，最初看来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注定如此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般说来，这种完全融合、结合在理论上是难以想象的。为什么？在任何一个划分成阶级的社会里，尽管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但它总还有别的职能。未必有理由忽略这个别的职能。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

人在谈到这一职能时，是把它作为在对立的阶级利益冲突威胁到社会本身存在的极端情况下来维护该社会的任务而提出的。^①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处于危急的形势下是能够以全民族的大局为重，而不仅仅以狭隘的阶级利益为重的。**西方统治集团有可能增强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心，使国家原则高于垄断原则**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垄断组织之间划等号，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容许的错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肩负着同垄断组织斗争重担的共产党，也都指出了这一点。它们强调说，这意味着否定群众干预重大政策的任何可能性。

一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有保持一定立场以维护整个民族利益的客观能力，另一方面，广大居民阶层有使这一潜力发挥作用的主观愿望，——这两个方面，从历史的起源来说，是预防垄断组织的掠夺本质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走向极端的“保险”。有重要的根据认为，在热核灾难临头时，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自我保存机制对于抑制垄断资本在国际舞台上不负责任的实力冲动也是有效的。现在，这种实力冲动对公众的最大危险正是在这里。实际上这是西方统治集体、国家领导人增强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心的问题，是使国家原则高于垄断原则的问题。这也是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战运动，使之成为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认识到国际关系非军事化的必要性的极其重要手段的问题。

跨国公司的长足发展，使超级垄断组织和国家的关系复杂化
第二个事实。战后40年来，跨国公司在基地民族国家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页。——译者

外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使它们在国家垄断资本体系中的共同利益在不小程度上瓦解了，使共生现象复杂化了。在跨国公司和社会的政治组织的民族国家形式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纽结，而且这个纽结迅速拉紧了。

这个问题很尖锐，而且是多层次的。首先，在膨胀了的私有者的帝国的心目中，国家不再是过去那种经济上的最佳地域单位了。超级垄断组织感到它们的活动范围太小了，所以冲出国界经营具有全球规模和带有全球性质的业务。同时，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上不仅尚未过时，而且正竭力巩固自己的阵地。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共同行动和合作的模式目前至多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因此，跨国公司虽然具有全球规模，却好象是在个别国家之间悬空架着的一样，没有一根支柱。

超级垄断组织对国家感到失望还有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军事战略条件发生变化，国家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是资本在国外使用力量的驯服工具。资产阶级早已宣布民族国家存在的唯一对外职能价值是进行战争。既然核武器的出现根本改变了战争的性质，那么不妨认为，国家因而已几乎完全失去了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大垄断组织和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和其他利益矛盾，意味着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轴心上出现了明显的裂痕。这些矛盾开辟了史无前例的、有希望的前景，首先正是在国际活动方面。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瓜分世界已经可以不通过战争形式，而通过和平方式

第三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吸取了它的教训，出现了一些十分稳定的征兆，表明帝国主义通过改变力

量对比来解决问题的典型作法（不是在次要问题上，而是在关键问题上），可以不以战争的形式，而是以另外的、破坏性小得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首先涉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解决方法。不要忘记：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现在，“按实力”、“按资本”重新瓜分世界的竞争，尽管很激烈，但是是通过“和平”方式相当平稳地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和角逐的主要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已经有40多年连因争夺霸权而互相打起来的战争的边缘都不曾接近。

不排除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竞争也采取克制态度

因此，保护国家垄断资本地盘的利益有效地调整了帝国主义阵营内进行实力争斗的手段武库。这种使竞争只能采取“纯”经济的和政治的方法，是合乎理性的国家原则能够战胜垄断组织的返祖天性的证明。既然这样的事在那些过去认为根本办不到的方面办到了，那么，在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直截了当地说，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要是也能采取类似的克制态度，上述先例就可能具有重大的突破意义。

军国主义基本上不是经济范畴且会对经济发生反作用

第四个事实。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病态地和危险地热衷于军国主义的情况下，医治这种疾病的相对可能性的关键在于：西方的军国主义化是否已成了它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反常的条件，或者说它是另一种职能？

当然，对一系列强大的公司和集团来说，生产杀人武器所得的利润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刺激。但是这样的公司毕竟是少数。总的说来，西方统治阶级培植和支持军国主义决不是把它当作最大的、因而是不可代替的投资场所，而仅仅看作

是生产部门之一。诚然，这种兴奋剂有时也被一般地用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它象任何一种经常注射的麻醉剂一样，却在破坏着机体的正常活力。美国现时的经验就证明庞大的军费开支是多么沉重的经济负担。这又增加了一个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使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也使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

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对军工企业加以限制

军国主义——这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职能，换句话说，基本上不是经济范畴，而且更重要的是，是直接由国家调节的范畴。不难发现，当战争有可能发生，或者当政治激情冲动起来，使国际形势非常紧张时，军国主义这个摩洛赫^①就洋洋得意地抬起头来，人们眼看着他肥胖起来。当这些可能性减少时，则是另一个样子。全然不排除如下情况：资产阶级国家鉴于在军事冒险道路上会遇到灾难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对军界工业界集团贪得无厌的胃口加以节制。

医治军国主义不会损害而只会有益于整个西方经济。这在政治上是可能的，因为军国主义在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中具有极其巨大的职能作用，而不是内在的经济作用。

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可能继续演变

总之，上述事实证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内部，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并证明它有进一步演化的可能。

总的可以说，到20世纪快要终了的时候，帝国主义自发

^① 摩洛赫是古代腓尼基人等所信奉的太阳、火、战神。祭摩洛赫时以儿童为祭品。这里借用来指惨无人道的屠杀暴力。——译者

发展成世界文明掘墓人的可能性被克制了。资产阶级国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全民族的安全利益，考虑使社会生存下去的任务，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因而也是整个世界文明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之所在。

民族解放因素

放弃了只让不容推卸责任的世界资本主义去解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观点

当代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批解放了的国家所面临的迫切的发展要求如何具体地影响稳定的世界的发展前景？以前我们的出发点是，既然社会主义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外围的苦难状况没有责任，那就让造成这些困难的人去解决它们吧。今天 we 认识到，“第三世界”的命运——这不仅是亿万人的未来，而且是世界文明综合进化的极其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那里的极其尖锐的问题不解决，必然使普遍的、和平的未来前景恶化。

在我们看来，最近几十年走上国际舞台的强大的民族解放力量为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增添了作用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不一定以同一个方式发挥作用。

非殖民化为缩小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提供了前提

从政治上来衡量，非殖民地化——对各民族进行殖民主义压迫的可耻体系的崩溃——把一个极其强大的动力解放出来了。非殖民地化标志着缩小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极为重要的“必要前提”的出现。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差不多在一百

年前就写道：“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①在这方面，非殖民地化，许多民族服从外国统治的全球体系的崩溃，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确定了各国独立发展的平等主权。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出现了排除大规模公开暴力行动的特点

当然，“古典”殖民主义虽然可耻地灭亡了，但帝国主义决不会完全放弃对解放了的国家的内政的干涉。不过在独立国家存在的情况下这点很难做到。因此，帝国主义虽然还在这些国家所在地区进行粗暴的军事干涉，但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总的说来，还是具有排除大规模公开暴力行动这一趋势的特点。在国际关系的广阔天地里，西方—南方这条线上，武装暴力的作用缩小了。

跨国公司使用“纯”经济力量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正常发展

但是好几十个国家的政治解放并不足以保证它们正常的经济发展。它们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之内，这一事实显然使它们成为使用另一种力量，即“纯”经济力量的对象。跨国公司就充当了对解放了的国家施加这种压力、使它们的经济崩溃的主要执行者。在经济新殖民主义的初期阶段，这主要是开采和加工部门的外国工业公司。当年轻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者在它们国土上的恣意妄为加以限制时，跨国公司就改变了奴役方式。它们把重点放在借贷资本、贷款上，从而把成万亿外债的绞索套在解放了的国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63页。——译者

脖子上。

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经济冲突中获胜

结果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中，极其尖锐的经济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年轻的国家，如果想获得独立发展，在这场经济冲突中就只能赢不能输。

这类国家的这一决心在西方也有人理解。在1985年发表的《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反对全球自由主义》一书中，美国作者斯·克拉斯纳尔对形势作了如下概述。作为一个集团，发展中国家看到，“不平等交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根本特点”。它们确信，“以市场为目标的资源分配方式”注定要使它们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所以它们力求把“通过提高南方的主权来限制北方的市场势力”^①这一国家法规作为它们在经济领域保护自己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解决办法也是把国家原则置于垄断原则之上（不管情况多么特殊：国家是“自己的”，而垄断组织是“别人的”）。

上述一切可归结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解放了的国家在国家机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基本上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国家机构能否具有某种不受这种发展规律约束的免疫力？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相当时期内十分彻底地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并在社会上保护大多数居民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有这种可能性。恩格斯曾表述过如下一种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

^① 斯·克拉斯纳尔：《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反对全球自由主义》1985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版第5、86、7页。——原注

“例外地”遇到国家政权“暂时得到”对基础的“某种独立性”这样的时期。这首先是在发展尚未完成、各阶级处于均势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例子就是17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而在19世纪则是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和德国的俾斯麦政权^①。列宁在提到这种“例外”时自己也作了一个补充：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情况也是如此。^②换句话说，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国家政权的某种“自主性”是可以保持几个月乃至几十年之久的。

大多数年轻国家的国家政权完全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十分彻底地从全民族的立场出发进行活动，而在社会方面则会保护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在某种具体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年轻国家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够发达，这个结论看来是正确的。顺便说一句，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排除某些发展中国家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正常的”周期而可能变成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情况。这种发展的迹象也是有的。

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政治核心是反实力、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

但是一方面，深刻的互相联系的原因即保护本国的政治经济独立免受外来威胁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内部阶级关系两极分化还不明显，使得解放了的国家这一集团的政治的基本核心是反实力的、反帝国主义的、全部民主力量的。由此产生了这些国家作为促进和平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因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译者

^②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页。——译者

的重要作用。由此产生了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保证和平地和独立地发展的斗争中的广泛协作，即首先为了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实力政策、争取实现人道主义的联盟。

社会主义的作用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使世界文明的和平发展不可逆转

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内还是在年轻的解放了的国家集团内，为世界文明的和平发展积蓄的一定潜力，其本身尚未为产生不可逆反应创造必要的临界量。根据人道主义原则从根本上改造国际关系的过程的实际开端，尤其是这一过程的稳定发展，要求强大的催化剂。世界社会主义应当起的正是这种作用。这是它的最伟大的历史使命。

战后关系的辩证法证实，历史发展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加强和发展决未导致和平共处原则的巩固。帝国主义企图在为时还不晚的时候纠正“历史错误”，在世界规模上实行社会报复。西方有意选择的同社会主义抗争的场所，就是军备竞赛——这既是为了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也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筋疲力竭。令人遗憾的是，帝国主义竟恬不知耻地打着防御“苏联军事威胁”的幌子展开了军备竞赛。

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作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终于在70年代初摆脱了危险的落后状态。社会主义对世界命运发生影响的新阶段开始了。苏维埃国家借助于军事战略均势以中断预示着灾难的战争周期，争取实现限制和裁减军备，制定和平的国际关系准则。在“缓和的十年”

中，在这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包括现实主义和责任感当时也在西方占了上风这个情况在内。

70年代曾没有根据地认为，增进缓和的深度和广度可以同苏联日益卷入地区冲突并行不悖

但是，这一起良好作用的过程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可逆性。社会主义因出了偏差而削弱了自己的经济阵地，也是一个不小的原因。以为加深缓和进程和扩大缓和的地理范围的任务可以同我国越来越多地卷入地区性冲突的行为（即使站在正义事业方面）并行不悖，这是没有根据的。

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相继出现的帝国主义最疯狂的实力野心的复活和增长，在苏联宣称为“邪恶的帝国”，美国执政当局强行制定的空前庞大的军事计划，——这一切把核灾难的威胁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军事战略均势不再是有效的制约因素了。世界文明前途未卜。

崭新的形势要求崭新的手段，以便在还可能办到的时候扭转战争危险注定增长的趋势。社会主义掌握了主动权。苏共中央四月（1985年）全会和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使形势根本好转的方针。其实质就是：对我国和对全世界提倡改革和新思维。

社会主义通过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发挥影响

国内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加速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这个任务还有极为重要的国际标准。大家知道，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是通过它的经济政策对国际舞台上的形势施加它的主要影响的。他强调说，一旦我们完成了这一任务，那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肯定就取得最终的胜利。^①这个思想多么深刻，上面我们已经从反面得到证明。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35—336页。——译者

只有美苏实现了经济均衡，美国才会在国际政治中采取新态度

值得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情况。美国研究人员也在探索执政当局危险的实力政策的出路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有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实现“经济均衡”或“几乎均衡”（外加军事均衡），才能促使美国统治集团“真正裁减军备并在全球政治关系中采取新的态度”。否则西方仍会怀着报复希望，即使不是在军事方面进行报复，也会在经济方面进行报复。^①这一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在美国也很流行：苏联不可能为自己取得与它的经济成果不相称的政治地位。^②常言说得好：尽管不愉快，但是大有教益。

在这方面，改革的经济成效应该创造出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还没有的东西来。这些成就应当为向着文明的国家间关系过渡的不可逆转性奠定牢固的新制度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上要突破“敌人形象”

社会主义对世界事件的进程发生影响的政治领域也是同样重要的。新思维在突破“敌人形象”这一老框框的钢甲方面可能达到的深度，它在普及方面能达到的广泛程度以及突破成见的巨大障碍的效率，显然将首先与社会主义的实际榜样的力量成正比。只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显示对世界命运负责的人，才能卓有成效地提出各国共同对世界命运负责这一命题。

足够的明智，防御性的军事学说和武装力量及军备的相

① A·加特纳、C·格泽尔和F·里斯曼：《里根除外，80年代可供选择的人》1984年纽约版第163—164页。——原注

② 见M·曼德尔鲍姆和S·塔尔伯特：《里根与戈尔巴乔夫》1987年纽约版第78页。——原注

应体制，军备、武装力量及军费开支的缩减，地区性冲突的政治调解，所有这类社会主义和平攻势的尖端范畴，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都是最有成效、好处最大的。正因为这样，期待社会主义实际影响在这些方面有巨大增长，才是正确的。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社会主义认为，在各国和各民族这个世界大家庭里它的作用就在于：激励人类自我维护的力量，促进向建立稳定的世界方面积极转变的过程，提出达到这种世界的实际纲领。在确定世界文明的命运中，世界社会主义的全部分量都要放在这个天平盘之上。

新的世界冲突总的说来可能是世界文明的未来中的最后一次冲突，因此考虑到上述情况尤为重要。由于反面的习惯势力有巨大惰性，世界局势的发展把人类引向不可避免的绝境仍然是有可能的。由于尚在制作的各种构件是新的和不太牢固的，我们这个星球的和平未来就更加成问题了。

正是从这方面来看，新的政治思维的巨大现实意义，把这种新的政治思维变成各国的实际行动的必要性，就看得一清二楚了。这一点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阿基米德杠杆，人类借助于它共同努力来把世界向稳定的和平发展方面扭转。

（原文载于苏联《国际生活》，1988年第5期，刘功勋译）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现实与幻想

阿·基瓦

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在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实践中未能得到证实。这是苏联错误估计资本主义消亡和社会主义壮大进程的结果，是停滞时期官僚主义体制运行机制的体现。

马列主义并未创立完整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蒙古和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的跨越阶段发展，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不能随便套用、视为规律。苏联长期没有看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极大复杂性，前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同原宗主国保持并发展了紧密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某些代表人物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并不是通例，革命民主派缺乏群众。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极其困难。

如果一种思想经过了大量的博士和副博士论文、专著和文章、讨论会等的论证，还有人提出怀疑，这简直会使人觉

* 本文作者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基瓦是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工运和共运室主任。——原注

得不可思议。但我国社会深刻的革命改革形势正是这样，无论是何人的权威意见，人们再也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是要求证明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价的正确性。在这方面，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思想也不例外。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以后，报刊杂志和公开的讨论对这个思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群众对发展中国家“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提出许多疑问

对此我毫不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当我在全国各城市给一些劳动者集体作有关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讲演时，常常收到一些问题提得十分尖锐的条子。而且在广大听众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专家都未必能解答的问题。下面举几个例子：

“人们总是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优越性，但是这些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发展往往比其他获得解放的国家还慢，人们生活贫困，有时甚至还挨饿？”

“按照卡·马克思的学说，落后国家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它需要有力的、各方面的外部援助。但现在我们自己还存在着这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能够去帮助这些国家吗？！”

“我认为，最终只能有一个可悲的抉择：或者我们将使它们的落后状态保持下去，因为我们无力给它们以大力援助；或者世界资本主义将帮助它们，把它们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您说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是我们进行反帝斗争的盟友，是社会主义的后备力量。那么我向您提两个问

题。第一，我们应如何理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难道只有通过非资本主义发展吗？再说，‘第三世界’已经有不少国家达到了资本主义的中等发展水平。而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则比较少，并且主要是一些小的、十分贫穷的国家。难道这就是‘第三世界’中社会主义的全部后备力量吗？第二，非资本主义发展是否永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捷径？会不会相反？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犯教条主义？”

“我们对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态度，是否还是根据旧的政治思维来确定的？其实，我们同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印度之间的友谊对民族解放斗争和整个国际关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不比我国同任何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小，难道不是这样吗？！”

等等，等等。

新思维完全抛弃了苏联国家利益只能同“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紧密相连的观念

显然，以上这些问题提得并非都很合适，其中的看法也不全对。但问题不在于此。公开性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谈论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第三世界”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而新的政治思维同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发展过程是水火不相容的，它完全抛弃了以前流行的那种简单化的观念，即认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只能同选择了不同社会进步道路的两类国家中的一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对一些国家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且往往不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而且在物质上给予援助。苏联公众想更多地了解这些国家的现实发展进程。他们有权要求对这些国家，特别是对我们（决不是因为富裕，而是出于国际主义团结的精神）给予了经济援助，其中包括粮

食援助的国家进行更全面、更客观的报道。在这些国家里，死神日日夜夜威胁着我们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军事顾问；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的许多高级专家为帮助它们消除贫困、改变不发达状况，时常要在难以置信的艰苦条件下工作。

“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同蒙古和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情况不同

在我看来，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原则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早已得到证明。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和哈萨克，高加索、极北地带和远东的许多民族以及蒙古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前资本主义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关系的现象也发生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包括越南和老挝。不过，我们首先要说明，当代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同我国各民族和蒙古从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许多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国各民族的过渡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统一国家内完成的，而蒙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直接依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完成的。

有关“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本来就不科学

另一方面，苏联社会在停滞年代对非资本主义发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论述非常轻率、幼稚、不科学，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也违背现实，使人难以看清正确地、科学地对待这种现象的方法。因此，人们自然要问：苏联社会学有没有既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又作为经过实践检验的行动指南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思想的研究水平大体上反映了整个苏联社会学的发展水平。而后者，众所周知，

在很长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

有些领导人自命正确，把这一理论强加于人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理论的发展，不仅仅受到了一些虽写进正式文件、但却没有经过实际生活检验的原则以及某些领导人的错误意见的限制。个别负责人还常常盛气凌人地把自己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整个“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过程的想法强加给公众，他们总以为自己的观点当然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往往是教条主义的），常常毫无根据地指责论敌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立场的“背叛”，众所周知，受到这种指责在那些年代不是没有危险的，而且这对“第三世界学”（让我们使用这个新词）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遗憾的是，不能不指出，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能进行科学的辩论，都能做到不扣帽子，不把自己的观点标榜为唯一正确的、唯一阶级性鲜明的观点。因而实际上没有可能对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各种观点作一公开的比较，进行自由的辩论和讨论。

有人硬说马列主义已创立完整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这样一来，就使“按需解释”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断这种做法泛滥成灾。有人硬说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完整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提出了一种假设，即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用他们的话说，这种假设还有待证明和发展成理论^①。如果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得知有人以他的名义创立了“列宁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发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33页。——译者

展理论”，他一定会大为惊奇的。可是这个术语多年来一直充斥于我们这个读书王国的大量出版物。

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述萨达特上台后不久在埃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出现的新现象。一家学术杂志编辑部因为怕……得罪萨达特而不予采用，虽然我对萨达特本人和他的制度未作任何抨击，而只谈了埃及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走上公开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

类似事情还可以再举一例。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所长写了一篇文章，论述有关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问题。我作为这篇文章的编辑，自作主张从这些国家中勾掉了埃及。电话紧跟着就来了：“阿·瓦·！请恢复埃及的名字！否则会得罪人的……”为了不得罪人……只好又写上……真是颠倒了逻辑！

遗憾的是，本文作者也受到了主观主义观点和认识的影响，未能始终科学地分析各革命民主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

“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提出适应了许多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的愿望

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在当代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而发展到社会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卡·马克思早就强调指出，每个国家不一定都注定要经过他所揭示的按阶段发展规律中的全部阶段。^①何况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开始得到积极研究的时候，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有了以前发展落后的民族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范例。至于亚非国家的社会舆论坚决赞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译者

成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姑且不谈各社会阶级力量的代表赋予“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具体含义），我就不必说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向亚非国家的公众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象科学地分析现实所要求的那样告诉他们，由于客观原因，大多数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概是注定要经过资本主义（虽然不一定是形态上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那么亚非国家的公众就不会理解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即使经过一千次的科学论证，也必定会引起亚非公众的强烈反响，而且会同加强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以巩固和平、回击军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后策源地、反对新殖民主义、为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民族独立发展创造条件等政治目的相抵触。

这一理论同苏联对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胜利的不现实估计直接有关

其实，我们自己也没能清醒地估计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时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崩溃，不出几年我们就会在人均产值方面赶上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前途，因为它，按照当时的说法，“诞生得迟了”。可见，按照这个逻辑，只剩下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极大的复杂性

今天，从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积累的经验来看，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们怎能如此简单化地论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煞有介事地打算把亿万人从“资本主义的火坑”中解救出来，并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民主制思想，但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有关方面却并没有搞得很清楚。既没考虑几十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国家和文化发

展水平各不相同，而且往往都很低的国家从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也没考虑为了使许多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前进，需要援助它们巨额资金，而不论当时或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世界社会主义显然都拿不出这么多的资金。就连我们的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措施我们也没考虑，而从经济实力、从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地位（军事基地、双边和多边军事政治协定、强大的亲西方社会政治力量）、从对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和人们的心理等等的了解来说，对手都大大超过了我们。

60年代前半期后，前殖民地同原宗主国间的紧密联系大大增强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考虑到前殖民地同原宗主国保持着比60年代前半期紧密得多的联系，60年代前半期有几十个年轻国家登上了独立发展的舞台，反帝情绪在这些国家的社会舆论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时隔不久就清楚了，“宗主国——殖民地”之间在殖民主义年代建立起来的十分广泛而牢固的联系，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联系，不是那么容易割断的。

前殖民地作为独立国家发展的时间愈长，它的经济状况、国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愈糟，民族国家愈是经常对国民使用强制手段（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屡见不鲜），公众对宗主国在殖民地命运中的历史作用的想法就会变得愈好，而不管这种作用当时在现实中究竟如何。

绝对化和盲目推广使左派力量迷失方向

我认为，我们在提出获得解放的国家在当代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正确的原理时，对这个问题缺乏应有的深思熟虑。第一，这个原理被绝对化了。在说明非资本主义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时，

改革前一直在我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机制中形成的赶任务作风占据了上风：通过决议和执行决议多成为目的本身——追求“优秀”指标，想要“包医百病”，等等。非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被作为斗争纲领也推荐给了根本不适合走这条道路的那些国家的进步力量。这些国家已经有了自己本国的垄断组织和财团等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中等发展水平，例如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这种做法在左派队伍中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坚决反对无根据地广义解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们正确地指出，这样提出问题会使左派力量迷失方向，偏离为当前的和长远的目标而斗争的正确道路。

根据苏联经验提出改造设想，不符合当地情况

第二，我觉得，为了在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创造先决条件而进行改造的基本方针，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非常公式化，甚至可以说是教条化。其实，除了非资本主义改造纲领，东方的全部特点（首先是传统制度）实质上仍旧存在，而这本身就使争取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等领域实现预定措施的最坚决的尝试变得徒劳无益。事情大概也只能是这样，因为我们设想的基本改造阶段是我们自身经验的继续，而决不是对那些当时我们还不很熟悉的亚非国家的现实深入了解的结果。

其实，正如人们所说的，如果要想解决把15—20亿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居民引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巨大任务（问题正是这样提出的：“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①），那就必须要对上层建筑

^① 《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1964年布拉格版第294页。——原注

和经济基础方面的这种转变机制进行周密思考。因为需要有一种能够顺利发展的社会模式，以便逐渐在经济、政治领域，在社会和民族关系、文化等等方面为社会主义创造先决条件。

民族民主国家政权无法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然而，我们先不谈获得解放的年轻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是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共同执掌政权，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因此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是某些非常情况的结果。我们要谈的只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过去曾经或现在正在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或者可以说是它的潜在的后备力量。首先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民族民主国家的政权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当依靠哪些社会阶级力量？有些国家工人阶级实际上不存在；有些国家工人阶级力量很小，人数也不多；有些国家工人阶级组织得很差，缺乏政治知识，受着传统的社会联系的束缚，在很多方面甚至还处于古老的观点和观念的影响之下。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通常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些国家有共产党，它们同执政的民族民主党派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公开敌对的关系。

其次，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农民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是表现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而根本不是在争取对社会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的斗争中。至于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它们基本上还很少受到阶级分化的影响，还是一支消极的社会力量。

最激进的政治力量是中间阶层，认为他们必然向往科学社会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在这些国家中政治上最积极的激进力量过去是现在仍然

是所谓的中间阶层即知识分子的代表、职员、军人（首先是军官）、大学生等，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人们不禁要问：我们根据哪些社会发展规律，说小资产阶级和激进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必然向往科学社会主义呢？同样，我们根据什么对代表这些阶层的民族民主政党的官方思想体系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展抱以希望呢？要知道它们对社会主义、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多半都有着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理解，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纲领和自己的实际行动纲领。

就拿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来说吧。它们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搞社会主义，但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吗？不是。它们的社会主义中既有民族主义，也有宗教，还有所谓非剥削资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等等。而且这些政党在一些国家取得政权后的行动正好表明它们的言行是一致的：它们走的是自己的路，既没有表现出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近的丝毫迹象，也没有表现出为科学社会主义创造先决条件的意图。

在民族民主制已经行不通的情况下，还以为埃及会迈向科学社会主义

让我们另举一例。在苏联的书报中多次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如果不是1967年以色列的侵略，那么埃及执政的革命民主派就会完成向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演进，埃及也就会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我认为这是极大的误解！对于加·阿·纳赛尔这位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想把国家从落后的泥潭中拉出来、在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真诚愿望，我们丝毫不想说三道四，只是要提请读者注意下列情况。早在纳赛尔生前，民族民主制国家的

模式就已经行不通了。埃及在第三次阿以战争中的失败和对这次失败的责任者的追究，恰恰暴露出被60年代初期改革的革命口号所掩盖的东西。（这次改革，我们把它看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实际上主要是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它确实也打击了旧的大资产阶级，但客观上却为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成长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究竟暴露出什么呢？暴露出国家政权大部分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手中。

据后来查明，国家第二号人物，加·阿·纳赛尔的密友阿密尔元帅以及其他许多掌权的“自由军官”，在1952年革命后很短一段时间内就都发了大财，他们对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已不再感兴趣。只要国家的实权掌握在军队手里，纳赛尔就不能不重视他们。纳赛尔的另一个战友安·萨达特后来实际证实情况就是这样，他在就任总统后公开采取了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大量吸引外资的方针，但并没有遇到“自由军官”们（当然不包括阿里·萨布里集团）任何稍微激烈的抵制。顺便说一句，萨达特推行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在纳赛尔改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生产基础结构，首先是国营大企业。

发展中国家的国营经济成分不一定是最进步的所有制形式

因此，我国社会学中广为流行的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营经济成分同其他成分相比在历史上一贯是更进步的所有制形式的观点，我认为是不正确的。研究表明：国营经济成分在社会中的作用取决于国家的阶级本质，取决于它由谁管理、管理的民主程度和效率，取决于它是为谁服务的。

在一些获得解放的年轻国家中，国营经济部门在不称职的、贪赃受贿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管理下搞得一团糟，它们对

公有财产（即全民财产）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国营企业经常被用来为私营企业主服务（实质上就是靠牺牲社会利益来刺激地方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成了专家统治论者和官僚们捞外快的地方，成了培养官僚资产阶级的温床，成了经营不善的典型，成了掠夺的对象。这些企业实际上损害了集体所有制思想本身的声誉，使集体所有制在群众心目中成了效率极低和无人负责的所有制。别的且不说，由于亏损的国营经济部门需要国家不断地给予补贴，这就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使本来就很困难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所有这一切只能使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愈益恶化。

我们将非资本主义道路强加在“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头上

然而，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作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工具的民族民主制国家吧。在埃及，由于客观原因即由于革命具有上层性质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这样一些特点，民族民主制国家显然是不存在的，而且应当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必然又会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认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军官取得政权后一定会在国内建设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呢？由于哪些客观原因呢？其实，对于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期待缅甸、利比亚等国的军官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激进民族主义者象我们一样理解社会主义呢？这是我们把走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图硬加到他们头上的，而他们与此毫无关系。确实，他们自己也经常谈论社会主义，但他们所指的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

左翼资产阶级一度向往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发展手

段，并指望苏联帮助

左翼资产阶级，在很多情况下还有小资产阶级，之所以倾向社会主义，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迅速改变长期落后状态的手段，是因为他们指望我们对解决这一任务给予卓有成效的帮助。如此而已。当我们国家进入停滞时期和我们在给予获得解放的国家以高效率援助方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当长期以来被我们捧作迅速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的国营经济成分搞得一团糟、而生产合作化几乎在所有地方都遭到失败的时候，拥护社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热情随之逐渐降低。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很快

而且遗憾的是，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此外，正是在这些年代，与我们在此前不久作出的论断相反，资本主义体系在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挖掘了大量潜力，并在新的扩张工具即在加速经济联系国际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帮助下，加紧向获得解放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还有，正是在上述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依靠跨国公司的力量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取得了貌似惊人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新工业国俱乐部。至于这些国家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它们取得的成果具有的矛盾性质，在大部分亚非公众看来是无关紧要的。昨天还很落后的国家今天却实现了工业化，这一事实本身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形势已经变化，还以官僚主义态度继续鼓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非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理想感到失望是毫不奇怪的。至于我们，我认为，则有点儿不知所

措。由于在停滞时期没能对我们过去提出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始终保持高速发展、资本主义在年轻的国家中站不住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广泛的可能性等论点作根本的修改，因此我们只能继续唱老调，特别是不厌其烦地作种种论证，似乎没有看到已发生变化的局势和现实情况。

看起来革命的行动并不都具有历史进步性

众所周知，停滞年代官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表面文章，力图把希望说成是现实。糟糕之处还在于，对于“第三世界”所发生的许多特点迥然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往往按照苏联的经验去考察，用过去的模式硬套。例如，如果某个年轻的国家将本国和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开展大规模的合作社运动，在左的口号下采取许多其他行动，那我们就会对此大加赞扬，并把该国欣然引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行列。然而每一个稍有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并非所有看起来革命的行动都具有历史进步性。例如，从反动立场出发即为了保留旧的、古老的社会制度或为了把某种不切实际的、行不通的发展道路荒谬地强加给社会，也会否定资本主义。众所周知，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坚决摒弃了资本主义，但同时连世界文明的成果也一起给扔掉了。我们时常谈论说：如果某一个革命民主制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没有向社会主义前进一步，那么要是它也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那它就必然会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说法简直令人吃惊。这样说就是忘记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进步会被完全封闭起来。

似乎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指出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似乎列宁没有同民粹派就俄国社会进步的途径、就资本主义

在这一进步中的地位进行过争论，似乎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各种政治力量立场的社会局限性的论点……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庸俗理解就象恶性肿瘤一样侵蚀着我们的社会学，我们对许多社会发展过程的研究方法充满着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

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转向工人阶级立场并不是普遍现象

当然，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资产阶级和贵族代表人物转向工人阶级的立场，历史上也不乏先例。然而与其说这是普遍现象，不如说是例外。甚至连那些按社会成分来说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向科学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的），也决不能看作是一种规律。

最有可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是7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某些国家的革命民主派

看来，最有可能接近科学社会主义并最终完全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是资本主义关系不发达的所谓“第二代”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指70年代走上这条道路的国家，以区别于60年代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的“第一代”国家）中执政的革命民主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真诚向往社会主义，希望全面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但这些国家中的革命动力还没有“第一代”国家中的力量大。政治上开展的工人阶级实际上不存在，宗法制村社农民的组织水平和政治觉悟都很低。中间阶层人数很少，只有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成为革命民主制度的实际支柱。但军队基本上也是由上述农民组成的，它不可能替代革命的动力，它有另外的职能。

革命民主派群众基础差

这样，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任何革命的命运都很危险的不协调情况：一方面，基本居民群众还没有挣脱氏族部落社会的社会和精神残余的束缚，仍在按旧时代的常规生活；另一方面，英勇的、先进的、但同基本居民群众相比人数很少的革命者队伍却希望同20世纪并驾齐驱。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克服这种不协调情况。这一类国家的革命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劳动者先进分子的政党，靠它唤起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积极性，动员他们去建设新生活。

但在这条道路上也有许多暗礁。劳动者先进分子的政党都是一些人数较少、社会成分比较单一的政治组织；它们宣布自己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组织自己的活动。然而问题是，这些政党在国家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很难在社会中实际履行领导作用，因为对于它们的思想体系以及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基本上不识字的广大群众是难以理解的。为此需要使群众的意识发生深刻的变化，当然还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进行重大的社会阶级变动。而后面这一点则要求全力发展经济，对整个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

以超前的上层建筑创造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

结果形成一种闭路循环。为了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顺利前进，需要进行重大的阶级变动（需要产生现代无产阶级、有较高政治知识和社会积极性的农民、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职员），而这又要靠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大多数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中都没有实现。可悲的是，关于政治同经

济相比、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比始终是前者占首位的著名论点（我们许多人在说明这个论点时常常引证弗·伊·列宁的话，看来他们忘记了弗·伊·列宁同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一样，从来都没有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截然分开，他认为只有在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这样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内政治同经济相比才可以占首位，而并非永远如此），关于超前的上层建筑可以创造与自己相符的经济基础这种常见论点，从来都没有为实践所证实过。

在相对来说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恰恰是经济基础决定民族民主派的政治方针。在只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取得政权的革命者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方针，并在上层建筑（远远地超越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领域实行重要的变革，但无论如何也无法马上建立起同人民民主革命（甚至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相符的经济基础，其中也包括经济基础的技术经济部分。至于革命的社会基础，由于经济衰落已经变得比革命的最初时期薄弱得多了。而且这不仅仅是上述两个国家的现象。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问题，仅仅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大量问题中的一部分。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也是要作出很大努力的。然而，如果我们确实想要把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思想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在非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规律，制定社会经济变革的战略，那就必须作出这样的努力。

（原文载于苏联《国际生活》，1988年第8期，涅尼刚、赵国顺译）

苏联对地区冲突的政策

叶·普里马科夫

今天划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应有新的标准。只有防御战争才是正义战争。进行民族独立斗争应有不给全人类带来核灾难这条界线。不应把地区冲突的原因完全归诸东西方对抗或归诸殖民主义遗产，而要看到当地的错综复杂因素。在推行民族和解的方针时，大国应遵守一整套“行为规范”，包括对不扩散核武器承担责任和就武器供应问题达成政治协议。美苏在地区冲突中的抑制作用开始增长。

对地区冲突性质的新理解和调解的新方法是近年苏联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地区冲突，不管是已经爆发的，还是尚在暗中酝酿，但随时可能爆发的，都会夺去人的生命，毁灭大量物质财富，阻碍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道路，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

描述地区特征，显然是为了把地区冲突同苏联和美国、

* 本文在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作者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编者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对抗区别开来。但是，一些地区冲突，至少是一些最危险的地区冲突，如阿以冲突，两伊冲突，阿富汗及其周围地区的冲突，中美洲的冲突，围绕柬埔寨发生的冲突，南部非洲的冲突，大国或者已经卷入，或者可能卷入。这些冲突正在加剧，它们具有一种稳定的、超出它们原来范围的趋势。许多地区冲突已对世界经济关系产生了最消极的影响（眼前的例子就是，两伊武装冲突引起的波斯湾“油轮战”）。然而，也许最主要的是，在国际紧张局势未消除的情况下，地区冲突可能成为破坏世界军事政治稳定、对普遍安全造成实际威胁的导火线。综上所述，在对地区冲突性质的理解上，新的侧重点和调解地区冲突的新方法，成为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以后苏联制定的外交战略的一个有机部分，就不是偶然的了。

新的对外政策立场

调解地区冲突被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的解决对于保障普遍安全很有必要。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能抛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核战争威胁着全人类文明的存在，而许多难以调解的地区冲突又有超出原来范围的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对待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问题，或者说，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问题呢？严格说来，这里谈的是，苏联对外政策新哲学是否能够回答世界上不仅以进化方式，而且以革命方式发生的、由客观的社会政治发展造成的实际形势提出的问题。自然，

苏联对外政策新哲学不能回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这一基本问题。

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分别谈谈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毫无疑问，在地区性冲突可能导致毁灭一切的世界核大战的情况下，对国际关系问题必须采取新的解决办法。即使旧的、“传统的”看法和思想依然存在，强调这一点也是需要的。

第二，我们的出发点在1986年11月的德里宣言中已经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必须从国际关系中排除战争和一般使用武力的行为。因此，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尽管克劳塞维茨当时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拒绝承认民族力量和社会解放力量可以利用它们拥有的手段来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然而，为了使这些手段的利用不致同核时代的现实提出的新思维相矛盾，还必须给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下一个更确切的定义。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后我们党所做的正是这个工作。

托洛茨基主义培养了好几代“革命输出者”

众所周知，列宁及其战友同托洛茨基及其同伙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是对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认为，革命形势，就其性质而言，是客观的，是由于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造成的，那时下层已经不想照旧生活下去，而上层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形势不能从外面带进来。至于说到托洛茨基分子，那么，他们是从世界范围内的“不断”革命出发的，实际上他们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但不是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托洛茨基分子否认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后，会相继在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

托洛茨基分子在实践上也企图以此为榜样，他们坚决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分子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俄国，实际上应当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继之而来的革命“施肥”。

托洛茨基主义培养了好几代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人”。这个主义滋养了，而且继续滋养着冒险主义、极端革命性，而这些东西，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和真正的革命性毫无共同之处。

同时，否定借助外援来制造革命形势，同拒绝向依靠现实的客观条件、为消灭本国人民受到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而斗争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也毫无共同之处。

苏联的阶级使命在于防止核灾难，反对向争取进步的国家输出反革命

在当前条件下，苏联如何实现自己的阶级使命呢？主要是把战争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这样做多么重要是无须多说的。一旦人类被卷入一场吞没一切的核灾难，那么任何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都将毫无价值。同时在当前情况下，苏联将以下述方式充分履行自己的阶级职责：为普遍和平的命运承担特殊责任，全力以赴，防止爆发核战争，与此同时，我国不仅决不放弃对进步力量和创造力量的同情，而且也决不放弃对它们的实际支持，无论过去或现在，我国都坚决反对向进步力量正在取得政权的国家输出反革命的企图。

战争正义与否的新划分标准：只有防御战争才是国与国间的正义战争

我们的许多对话者，特别是国外左派对话者提出一个问题：过去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现在这种区分是否

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那么，在新形势下区别它们的标准是什么？显然，这个问题在许多方面要同下面这个情况联系起来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完全把重点放在防御性军事学说、防御性军事战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武装力量建设模式上。因此，非进攻性防御将成为唯一被认为是正当的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只有防御战争才能被看作是国与国之间的正义战争。

进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不要越过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的界线

同时，维护本民族独立的人民的斗争，有权存在下去。这种斗争具体选择什么形式是不受限制的——任何人都不能把某些特定的行动模式强加给各国人民。但是，无论从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方面来说，还是从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冲突的其他国家方面来说，肩负的责任都加重了。正是这种责任感应当成为防止越过把争取人民权利的正义斗争同孕育着给全人类带来灾难的危险的形势分开的那条界线的保证。

民族和解哲学

综上所述，更准确地理解地区冲突形势形成的真正原因具有特殊意义。1985年4月以后，我们特别注意到了必须放弃仅仅从苏美对抗或华沙条约组织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的角度来考察地区冲突的作法。

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必须分析构成每一冲突形势的极其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且这种分析应当是综合性的。

东西方对抗有时掩盖了地区冲突的主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某些地区冲突成了彼此对立的两大军事政治同盟互相对抗的组成部分。人们已经在谈论，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各种不同的地区冲突。这种卷入有时把地区冲突原有的全部实际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掩盖起来了。在这方面近东的例子是很典型的。谁都清楚，如果不了解以色列扩张主义和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之间的历史冲突的实质，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的动因，而最主要的是，就不可能调解这一冲突形势。

在阿富汗冲突发展的最初阶段，不妨说，人们对这个冲突发生的内部原因、对其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错综情况注意不够。在阿富汗领导采取成立包括反对派势力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方针后，这个偏向开始得到纠正。

不能把第三世界的一切冲突都归结为老殖民主义遗产

所谓的“第三世界”现在是最危险的冲突地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地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分割开来的“古典”殖民主义的遗产。但是，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殖民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必须承认，在这个地带发生的冲突，也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的时期所具有的发展特点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性、执政的某些势力企图用对外扩张的办法来“代替”国内困难问题的解决——这一切无疑助长了冲突次数的增多并使冲突局势更加严重。最后，这是许多民族在解放斗争中遭到全部反动的、维护已经过时的社会结构的势力的抵抗的情况下，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付出的代价。

正确区分冲突的内在和外部原因，民族和解方针就行得通

把引起冲突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明确地区别开来，就

能现实得多地对待调解冲突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民族和解的思想作为消除或缓和地区冲突形势内部原因的一种方法已开始得到赞同（对苏联对外政策哲学中反映出来的新观点也可以这样说）。众所周知，在阿富汗、尼加拉瓜、柬埔寨都采取了民族和解的方针。这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此外，停止内战，然后建立相应的联合结构来领导国家，在历史上很少有，也许根本就没有先例。正因如此，许多政治活动家认为，这个方针不会起多大作用，或者根本行不通。但是，我们可以举出有充分根据的理由来说明民族和解作为消除地区冲突内部原因的手段这一方针是切实可行的。

美苏的抑制作用正在增长

1. 内部力量的对抗是在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对立体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对抗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外来因素不仅以支持这股或那股内部力量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它们的政纲中。“纯”内战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早就没有了，现在就根本不可能有。当然，许多人认为，在冲突中外来因素对内部力量消长的积极影响，会使和解复杂化。确实是这样，黎巴嫩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是，一旦从内部冲突中“排除”了外来因素，换句话说，一旦外部消极影响被消除，就会出现显然有利于内部力量实现民族和解的条件。

外部形势的这种“转变”是完全现实的，因为大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正在增加，它们——首先是苏联和美国——在发挥抑制作用，促使正在对抗的内部力量实现民族和解这件事情上的利害关系，客观上也正在增长。

民族和解也是当事国的邻近国家可以接受的唯一原则

2. 民族和解也许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它使邻近国家也能采取共同行动来制止地区冲突。这一点在中美洲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尼加拉瓜实现内部和解的任务，已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思想，使拉丁美洲各国积极行动起来并制定出调解地区冲突的计划。

因此，在当前条件下，民族内部和解思想尽管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但决不是抽象的理论。1988年4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纳吉布拉在塔什干会晤后发表的苏阿联合声明中强调说，民族和解政策能够调整阿富汗周围的局势，制止战争和自相残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平，成立有代表阿富汗社会的、包括目前互相对抗的势力在内的各派势力参加的联合政府。

有些地区冲突，对抗力量是由两个或几个国家代表的，如两伊冲突，阿以冲突。在这种场合，也应当用政治手段来消除冲突的内部原因。总之，显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军事手段不可能消除冲突的原因，不管这些原因是什么。**大国应遵守某种“行为规则”，首先是不再利用地区冲突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

至于说到地区冲突的外部鼓动者，那么，如果大国实际遵守某种“行为规则”，这类鼓动者的力量就可能大大削弱，甚至会完全不起作用。这里首先指的是放弃利用地区冲突作为加强自己在某个地区的军事存在的理由或借口的企图。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这种企图，冲突形势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对抗的一部分。

苏联坚定不移地执行收缩它在国外的军事基地的路线。苏联准备完全撤出它在别国领土上的武装力量，只要美国方

面也准备这样做。

苏联关于限制海军活动的建议，是直接为了减少在本国之外的军事存在的。我们提出了使地中海军事上中立化的建议。我们曾建议从1988年7月1日起冻结苏美两国在地中海的军舰数量和海军潜力，然后再规定它们的最大限额作为两国海军力量撤出地中海的第一步。

很难得出结论说，同样的主张在美国的政策中占了上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所作所为就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这里集结了美国及其盟国的相当大一部分海军力量，其目的据说是为了保障海上航行自由、保卫这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各个国家的利益。苏联原则上不否认这些利益的存在，同时也主张海上航行应有充分自由，但是它从未把这个问题同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联系起来。显然，放弃这种联系是检验大国在某一冲突形势的发展中采取“克制态度”的主要标准。

充分利用国际机构调解冲突

“外部力量”放弃与冲突形势的发展有关的单方面行动，一般说来有巨大意义。在苏联关于调解地区冲突问题的新主张中，利用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方面，近几年来苏联的立场，尤其是对利用联合国军事机构来调解各种冲突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苏联曾建议建立联合国海军力量以保障波斯湾地区的海上通行自由，并表示愿意把这个地区的苏联军舰交给联合国指挥。

由此很清楚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过去多半被人忽略了），这就是建立和利用负有保障全世界普遍安全使命的超国家机构的问题。需要说的是，对这个问题

的探讨目前实际上还处在起步阶段。

美国应承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享有平等的合法利益

在对待地区冲突方面，美国放弃沿用至今的、不承认与某一冲突形势有牵连的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享有平等的合法利益的作法，显然应当列入“行为规则”。我们所说的合法利益，指的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客观存在的全民族利益。

不要把各种冲突人为地联到一起

此外，还必须放弃实际上人为地把冲突形势搅在一起的作法。诚然，在许多场合，各种冲突之间有客观联系，这一点应当估计到。例如，如果不在调解整个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范围内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黎巴嫩冲突实际上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同时，试图在“让我们马上找到某些冲突的解决办法”这一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为地把一些绝对独立的、并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冲突搅在一起，只能使问题的解决复杂化，因为，这样一来，其中每一个冲突的内部原因和特点势必照例被忽视。

大国应对不扩散核武器承担责任

应该特别谈一谈关于大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承担责任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许多卷入冲突的当事人说，他们已经接近加入“核俱乐部”的边缘（根据来自不同渠道的西方消息证实，有人已越过这个边缘）。很明显，这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如果某个地区冲突带上了核色彩，那么，毫无疑问，这将造成一种直接威胁普遍和平的完全不同的局面。面对这种危险，单是保证说，某个大国主张不扩散核武器，或者不支持它的“地区被保护人”拥有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努力，显然已经不够了。需要采取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具体禁止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更严格地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防止核扩散的监督作用呢？总之，这一问题要求人们予以最密切的注意；各国的许多专家都看到了地区冲突带上核色彩的实际威胁，它不单是仅仅引起了苏联专家们的严重关切。

应就武器供应问题达成协议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更带普遍性的武器供应问题。看来很有必要结合一整套调解措施，就均衡减少向“冲突地区”供应武器的问题达成政治协议。

非常明显，我们提出的这些“行为准则”并没有把全部问题都包括在内。但主要的是，外部力量，首先是大国，以它们的共同的或者平行的行动来加强自我限制，是在牢固而公正的基础上消除地区冲突的必要条件。苏联准备在这方面进行合作。

（原文载于苏联《国际生活》，1988年第5期，李俊聪译）

纵然荆棘丛生，也要奋勇前进

（论新思维的前途）

瓦·扎格拉金

阶级利己主义是同人类进步事业不可调和的敌人。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全人类利益重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一部分属于阶级利己主义，也有一部分同全人类利益重合。新思维摒弃了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垄断真理的态度。新思维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成为人类思维合乎规律的一个发展阶段。

“新思维”，这个术语已经牢牢地进入国际政治语汇。但是，对于它的内容，对于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却很不一致，有些看法甚至相当对立。

举例来说，有人认为这无非是某种近于新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另一些场合，有人则用以表示“新的政治理论”或者“新的政治方法论”。还有的……

* 本文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作者瓦季姆·瓦连京诺维奇·扎格拉金，是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苏共中央委员、哲学博士。——编者

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说法很多。我想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一般说，意识形态总要落后于存在，这是久为人知的真理。思维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这种意识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关于思维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尚需进一步详讨），因而自然也会落后于存在。这种情况首先会在思维带上教条主义特征时出现。

教条主义或经院哲学长期成为主宰的思维形式

30—70年代苏联社会的思维就是这种状况。除去几个短暂的时期，或者更确切些说除去某些空隙（比如二十大），正是教条主义，否则就是经院哲学成了我们国家居主宰地位的思维形式。它与飞速进化中的存在，既包括国家的存在，也包括世界的存在之间的惊人的脱节盖源于此！实践之落空也由源于此，这种实践是靠着对于现实，对于生活实际变形的概念维持的。

70年代中期的危机现象也源于思维的变形

这种脱节，这种落空，或者更确切些说实践之非理性，便是变形地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原则、规范的重要因素，因而也就是政治环境中出现畸形现象的重要因素。7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包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中出现的危机现象，或者称作“停滞”，其根由就不仅在于政治的畸形，而且也在于思维之变形。

要克服危机现象，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思维，使之归依彻底的辩证法原理。恩格斯的结论是：正是辩证法才是最

高的思维形式^①。

世界的巨大变化要求更新思维

当然，无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其所以必须更新思维，是因为世界，尤其在近几十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变了样，而我们原来关于世界的居统治地位的观念已完全不适应于它的真情实况。这就极大地干扰了制定有效的实际政策，首先是国际事务方面的政策。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回到恩格斯的公式上来）变更我们的思维的形式和内容。

二

为此应当做些什么呢？

首先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一方面要深入领会它们的真正的涵义，另一方面要合情合理地历史地对待创始人作出的结论，注意这些结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总之，不能简单地重复某些引文，因为即使引文准确无误，也不免脱离环境和时代，而是应当去研究我们导师的思维逻辑，去研究他们的方法论。

应当恢复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和共产主义的全人类性等结论

还应当恢复我们学说的创始人的许多本不应被遗忘的、从教条主义立场出发作出错误评价或者甚至有意加以隐讳的结论的价值。这些结论首先涉及社会主义及其政策的人道主义实质，共产主义的全人类性，当然也包括如何看待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进而为争取全人类的解放而斗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译者

争的历史使命的真正的实质问题。

我还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①

……我要向读者提一个问题：你们过去在书本里是否常常见到这些话？我想不会。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和全人类的利益”^②相一致的话也很少读到。现在已广为人知的列宁关于社会进步的利益若与阶级的利益相比应居首位……的说法过去也少见。

的确，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紧密相关，工人阶级，这个不追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追逐）利己目的的唯一阶级，这个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包括它自身在内），保证人类自由的阶级的历史使命中的全人类内涵的思想是很值得注意的，实质上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但这一切居然都被遗忘了，在许多情况下是故意被冷落了。其所以要冷落它，是因为只有狭隘的阶级分析方法才会使人有更多机会来对无产阶级理想的人道主义实质及其相关实践进行肆意曲解。

可是，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人类已面对着共同的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86页。

——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77页。

——译者

胁，必须确保自身的共同生存时，这些思想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呀！它们为全人类，当然首先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何等巨大的精神财富呀！

……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恢复它们原有的价值。

不过，要更新思维，当然还必须现实地看到国内和世界舞台上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现象和强烈的发展愿望，但这种现实的态度并非意味着要把某些过程、事态、事实“圈进”事先勾勒好的模式，而是要勇敢地去正视生活，勇敢地深入到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中去，这些表现形态是那样纷繁，那样驳杂，有时会使人感到不悦，甚至令人悲愤。

只有这样，只有看到当代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和矛盾，才能保证对现实持辩证的态度，才能保证采取符合其要求的有效的政策。

在我们的时代，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互不可分的时代，这样的政策任重而道远，它不仅应以本国的内在要求为依据，而且要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同时考虑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考虑到人类的整体利益。

新思维应该集人类社会思想成果之大成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当代的思维及其当代的政策应当将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结合起来，统一于自身之中。这种思维的基础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但也包括人类思想几十年来所积累起来的一切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实质上，我们的新思维应当是人类社会思想一切实际成果的综合。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样的综合在更高的程度上是自然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便是一个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实际上开始得到实现的社会发展时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并

不存在根本性的困难。

三

彻底地运用辩证法去研究国际事务的过程，就能够勾勒出人类世界历史存在的当今时代的科学图景，一幅摆脱了早已过时的往昔陈规的图景。这样做就能够看清当代世界的立体型，一个异常丰富多采，矛盾深刻交织，同时有着万千条丝丝汇织而成驳杂整体的世界。

否定了有关多元化和矛盾问题的偏狭见解

同时，我们已经摒弃了认为多元化仅仅是产生离异和分歧的根源的偏狭见解，而领悟到多元化乃是各种经验取之不竭的源泉，任何文明都会重视这个源泉而受益匪浅。首先，社会主义文明理应体现出人类思想和实践的最高成就。

我们还摆脱了观察世界发展中的矛盾时的局限性。我们已经认清，这些矛盾不仅是发生冲突和造成疏远的基础，而且首先是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我们理会到，这些矛盾，哪怕是对抗性矛盾也罢，都是可以求得辩证解决的，根本不需要以战争为手段。顺便说一句，战争，这是解决矛盾最不辩证的方法。因为它会导致交战一方的毁灭，在当代条件下会导致交战双方，甚至未参战各方的毁灭。如是，按照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解决矛盾的途径完全可以不同……

我们认为，一切矛盾在其自身的运动中都在变化着、更新着。除此之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遗憾的是，本世纪下半叶诸如全人类各种利益和日益尖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之间的这类涉及文明存在基础的新矛盾直到全世界都在谈论它时，而且全世界又何只是在泛泛地谈论它，还是在热烈地争

辩着为确保人类文明之生存必须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和可能性时，我们才理会到。

这里正好又想起了不容许通过灾难性惨祸，通过破坏性剧变去解决矛盾的问题，想起了寻找解决矛盾的其他途径的愿望问题，这样的解决应当把各种经验加以综合，有步骤地向前推进，在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要相互配合的基础上消除实际对立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

过去不承认世界的相互依存性

对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我们的感受也已和先前不同。先前，我们实质上是不承认这种相互依存性的（尽管我们每一步，首先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方面会直接遇到它的后果）。不仅如此，即使有某几个作者曾经畏怯地思索过这个相互依存性及其后果问题，我们也几乎总是把这看作为阶级敌人狡猾的诡计。的确，帝国主义势力过去、现在和将来显然都企图利用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去加强比如新殖民主义的羁绊，以使弱国屈从于强国。可是，要知道，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能为发展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开辟广阔的前景，并为此创造新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至此，问题所涉是我们在世界这幅图景中，在其发展过程中看到的新东西。我们对其发展的条件也作出了新的评估。这些条件确实已有更新。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现在都承认：我们的文化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的，一方面它有着巨大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实力，有着真正无限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内部却又是那样脆弱，那样经不起被人的才能制造出的无形的，往往是破坏性的力量所摧折。我们的文化正是在这两种特性同时展现的

情况下发展的。

即使在过去的时代，文明的发展也总是起伏跌宕，道路曲折的，在其途程中既有急进，也有退却和弯路。但是，知识的进步要是一开始被用于行恶，那就会毁灭文明自身。人类还从未陷入过这样的境地。但今天它出现了。

观察世界已不再抱有成见

总之，过去我们是按照老一套框框去看待我们周围的现实的。尽管这些框框也许曾经是对的，其中有不少后来也还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反映世界的全部复杂性。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了某些新现象，但由于受到老框框的围困，这些新现象就没有得到反映，我们也就力求对其持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仿佛它们根本不存在一般。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抱着成见去观察世界了。于是我们看到世界原来完全不是我们先前认为的那个样子，这就正象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文件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一方面“受到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性威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共存、合作、政治解决尖锐问题的巨大潜力”^①。

是否我们所有的人对此都了解了呢？都领会了呢？我想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还刚刚起步，根本谈不上终结。而且我倒寄希望于永无终止之日。思维过程之停顿，思维之僵化蕴藏着巨大的危险。正因为这一点现今已被理解，因此可以寄希望于已经开始的过程将不会终止。

尽管有许多人在反对这一运动。

现在，在我国的书藉，在各种刊物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材料，它们的作者提出许多不同寻常的新问题。我

^① 《真理报》，1988年5月27日。——原注

们只要想一下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的整个思想的探索性，就可以理解这些问题实在是提得很有水平的。

对于这些新问题的提法反应如何？在许多场合这种提法受到支持，其最有效的说法是那是为解决出现的新问题的一种探索。但也有另一类情形，连提出新问题也想加以压制，因为这样做超越了习惯的框框。有时，他们还推说似乎某些新思想“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一经检验，原来并不违背理论，而只是不符合某些具体的结论。理论是一回事，在某一特定时期作出的，以这一时期独特的现象、事件、事实……为依据的这些结论是另一回事。

对待我们的理论，放弃教条主义的态度，实行创造性运用的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但这一弃一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实在是一项绝对命令。

四

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

思想本身无非是脑的产物。但思想一旦变成实践，便能成为物质力量。当然，这只能在思想是正确的，而实践与之相适应也是正确的情况下才办得到。

新思维，我们活动的现实哲学，要握有真理性，就应该在自己的实际结论中不仅充分注意到当代世界共同体这一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译者

事物，其发展的许多新的条件（对此上文已经述及），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内部的进程——改革进程的新的需要。

新的对外政策思想反映了人道主义实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改变苏联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以新思维为基础的新的对外政策思想，的确反映出了改革的要求。这一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其人道主义的实质。与这一实质相适应，它是旨在使我国国际交往的整个体制实施民主化。它还规定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世界发展的特点是：和平的整体性，人类的生存是头号问题

我国的这一新思想还充分注意到了世界发展的特点：一方面和平是整体性的；另一方面列于首位的应是人类的生存问题。

我认为，要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必须弄清楚这些思想，既包括国内政治方面的，也包括国际方面的这些思想的全部立足点和出发点。否则，概念就将是不完全的。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不会不看到，我国国内的政治使命不仅并不与全球性的使命相违背，而且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对外政策方针从过去以阶级利益为主转为现在以全人类利益为主

正是改革的人道主义要求与最突出的全人类的生存需要的结合决定了新思维和以其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方针的独特性，即由先前以阶级的利益为主转变为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主。对我们来说，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阶级利益，更确切些说放弃保障社会主义的利益。而且只有这样的做法才能切实地保障社会主义的利益，使其生存，使其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因而其命运是无法与人类的命运分开的，尤其在当代。

新思维的核心是，以社会发展利益为主

在我们的对外政策新思想中“列宁的以社会发展利益为主的思想具有新的意义”^①。这一思想是新思维的核心。

……在这方面人们向我们提出许多新问题，有的甚至还指责我们：怎么会这样呢？如果世界被分成敌对的体系，而世界的资本主义部分又被分成敌对的阶级，那还谈得上什么全人类的利益呢？

但问题是人类从客观上说无论过去和将来始终是一个人类。客观上过去和将来它始终有共同的利益，那也是不以其阶级分划为转移的。的确，阶级利益，在今天首先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对抗的。但它们是否就只有对抗这一面呢？教条主义者也许会因提出这样的问题而战栗。可坚持辩证法的人则承认：当然不是。

不管什么人，谁都关心生存问题。无论谁的利益都不会要求在核冲突的火炉中被烧死或者由于生态惨遭祸害而窒息身亡。既然如此，那就有了某种相互理解，乃至共同行动的基础。

阶级利己主义的立场是危险的

这个问题不简单。阶级利己主义（谁也难免受其诱惑）常常使你只集中注意分歧和矛盾，而妨碍看到共同性这一面。但现在应该懂得，阶级利己主义的立场对于它的任何一个代表来说都是危险的，不管他是什么人。因为这样的立场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是排斥任何协商、任何妥协，并因而是阻挠任何前进运动的。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原注

客观上，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这样做应当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本身的历史使命（我们已经谈过这一点）中不仅包括阶级的内容，也包括全人类的内容（可以说，这正是无产阶级与其先前的一切阶级的根本区别所在）。对于资本家来说，处境就比较困难了，它的那一部分与全人类利益重合的利益是与另一部分受其阶级利己主义控制的利益相矛盾的，而阶级利己主义则是全人类进步事业不可调和的敌人。

可以说，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担忧。但也不尽然。因为保证和平地解决时代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无疑是我们所关注的事。除了用这种方法，亦即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之外实在是别无他途。即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同样也都是别无他途：一旦文明毁灭了，工人阶级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时而还会听到一些反对意见，说那又该怎样对待无产阶级当前的阶级任务呢？要是资本家正在压迫、镇压、剥削工人，那还能号召工人跟资本家一起为求生存而斗争吗？以全人类利益为重的理论岂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放弃为争取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吗？

为全人类利益而斗争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是一致的

当然，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对某件事还不认识或者不理解，这并不是说这“某件事”不存在了。事实上，即使对工人阶级来说，今天为全人类利益而斗争也是与为阶级利益而斗争相重合的。因为和平、裁军，这不仅是明天的生存问题，而且也是今天应予解决的社会任务，而且也是今天保障劳动群众的政治权利的问题。还可以再继续列举许多这类问题，但一般说这是一个专门的题目。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底下我们继续探讨以新思维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思想。总之，应该以全人类利益为重，要摒弃实力政策和以战争方法解决当今世界的矛盾的做法。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首先是在保证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基本方针的基础。

五

40多年前，我国首先谈及核威胁的问题。我们早从1946年起就首先提出消除这一威胁，禁止原子武器，后来又提出禁止核武器的要求。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坚定地为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而斗争。但同时也并非始终合乎逻辑。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核灾难的致命威胁；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很长很长时间以来却认为在核战争中有可能取胜。这种想法在我们的各种文件里，包括党的文件在内都有反映。这种想法也反映在我们的某些实际决议中。

各国安全保障日益取决于政治、法律和全人类道德

但如果核战争是根本不能被容许的话，那由此必然得出结论：通向保障安全之路便是裁减军备。当代世界现实的影响和引发战争的一系列因素之可能受控使人们敢于设想，各国的安全保障将越来越取决于政治，取决于在履行国际事务中法的、全人类道德的主要作用，而不是各方之间的军事潜力对比。

再则，世界是彼此关联，相互依存的。而这就意味着如今的安全只能是普遍的。安全只能是所有人的安全，而且是指所有人同等的安全，否则就谁也别想安全。“需要的是使大家都感到同等安全，因为核时代的恐惧和担忧会引起难以

预料的政策和具体行动”①。

是的，在当代条件下许多事取决于苏美之间的关系。两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它们对全人类的未来负有特殊的责任。苏美两国有不少共同点，客观上需要彼此和平相处，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只能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看来，在经过四轮苏美最高级会晤（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和莫斯科）之后，现在双方对这一点都已经很清楚了。这是好事。

国际安全体系不仅需要苏美、还需要各国的积极参与

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保证可靠的国际安全体系不仅需要苏联和美国积极参与，还必须各国都积极参与。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世界自然要比美国及其在国外占领的基地广阔得多。在世界政治中不能仅限于同某一个国家，哪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的关系。”②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独特的欧洲，已经运转起来的伟大的亚洲，崛起中的拉丁美洲，正在积蓄独立力量的非洲——各大洲，居住在那里的全体人民都有权得到安全，当然也都有权参与可靠地去保障他们自身安全的活动。

还有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和平简单地理解为没有战争。可是，今天这样考虑问题就不够了。在核时代的条件下，光是防止战争爆发或者即使是提出避免发生核战争也还是不够的。我们深信，只有在不仅是整个地消除核威胁、战争威胁，而且还必须同时建立起不让这种威胁复活的可靠保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材料》政治书籍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原注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材料》第64页。——原注

障的情况下，和平才能持久。由此，我们关于裁军和裁减军备的思想要求把军备缩减到使每个国家只具备保卫自身不受外来侵犯，但不具备对任何其他国家实施侵略的能力的程度。

和平共处应成为国际新秩序

据此，我们还主张，和平共处，作为一项政策（现在无论对谁说来这都是唯一可行的）应当成为一种国际新秩序。

这是一种不使用实力的秩序；是建立在承认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秩序；是以睦邻和合作为主导，广泛交流科学技术成就、文化珍品，为各国人民谋福利的秩序；是保证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权作出社会和政治选择的自由的秩序；是为通过一切国家的集体努力解决当今已变得十分尖锐的全球性问题开辟良好的机会的秩序。这些原则现在都已被写进苏共党纲。因此，我们郑重宣布，实现这些原则乃是我们在可以预见到的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的活动方针。

六

近几年来来的发展进程在比先前更加广阔的基础上为反对战争威胁，依靠世界共同体的共同努力建立解决一切震撼人类的全球性问题的基础开辟了新的机遇。

……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涉及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说过，新思维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我们曾指出：这个新思维首先是恢复我们学说中某些已被遗忘的（比如说）真理的结果，也是重温我们那几位经典大师著作的结果。可为什么这一学说的思想也能为那些并不赞同我们的观点的人所接受呢？为什么运用这些思想便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呢？

当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构思新的观念和倡议时并不囿于一己之见，而是不分东方西方，对于其他社会势力的思想观念取博采众长的态度。上文已经提及，我们吸收了人类思想的一切精华。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党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之后也已摒弃了对真理的垄断。在这个丰富多彩、纷繁驳杂的世界上，真理只有注意吸取一切合理思想，不管这思想是由谁提出来的，才能被认知。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唯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取得丰硕的结果。

但问题也不限于此。理解新思维及以其为基础的政策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关键是我们把全人类的问题摆在首位，把政策的人道主义宗旨，国际关系的人道化等问题提上了日程。

新思维能推倒对社会主义及其政策不理解和持怀疑态度的种种障碍。它使我们的政策变得更容易为我们自己，也为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所理解，更容易被大家看清楚。简而言之，新思维摧毁了“邪恶帝国”的形象，以相互重视彼此的利益为基础筑起了跟所有的人沟通以达到互相理解，共同协作的桥梁。

苏联的新思维已开始变成全世界的新思维

最后，还可以说得更进一步。我们的新思维已开始变成全世界的新思维了。我们的思想有助于证明人类共同体能够理解他们的根本利益是接近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一致的。这些思想把形成整个有理智的人类的共同意识的进程向前推进了，尽管这一过程的发展很慢，甚至可以说非常慢，但它终究在不断地发展着。

在这方面还可以说：新思维是人的思维、人类思维合乎规律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标志着世界社会舆论

的觉醒，标志着世界社会舆论真的极度地活跃起来了，它预示着未来的许多东西。当然，将会有许多的辩论、争执、斗争。但如果我们今后不仅坚持新思维，而且还要发展它，扩大它，不断地以发展并深化相应的实践活动来充实这一过程，那么似乎未来在今天许下的诺言就一定会付诸实现。

（原文载于苏联《国际生活》，1988年第8期，袁坚译）

苏联与变化中的世界

阿·伊久莫夫、安·科尔图诺夫

长期忽视经济同外交的相互依赖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战后，依靠苏联军事威力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吸引力，取得了超过经济实力增长的外交成就。但是，用非经济手段加强外交的力量已经耗尽。从70年代初起，军事力量不仅不再能增强外交地位，反而发生反作用。但直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继续不自量力地追求军事战略均势，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在这两个方面同美国展开的竞争，使苏联处于不利的地位。苏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只在夺取政权初期起作用，总的讲政治效果有限，反而使苏联的包袱越背越重。

在外交领域也要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应在重新估计国力的基础上采取退守做法，确定在国外的经济利益范围和重点，停止对某些盟

* 本文作者阿列克谢·伊戈列维奇·伊久莫夫是经济学副博士，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列·瓦季莫维奇·科尔图诺夫是历史学副博士，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国际安全和政治研究室主任。

——原注

国的无偿援助，不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充当“保证人”。两种体系的竞赛归根结底不取决于阿富汗或尼加拉瓜，而要由两个制度的中心力量决定。

苏联在当代世界上起什么作用？我国的对外政策对于完成这一使命是否能起促进作用？过去起过这种作用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估价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如何估价过去的成就和错误，以及采取什么方法制定未来的战略。因此，在国内开展的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中，上述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显得十分重要，这绝非偶然。讨论苏联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问题时，要谈到我们国家在世界经济上、政治外交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文化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的体系中实际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希望取得什么样的地位；还要谈到我们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行为方式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

对于苏联的国家形象，过去长期盲目乐观，现在有人又一下子变得悲观失望

由于最近几年提倡公开性和自我批评精神，这个问题的一些新的方面显露出来了。我们意外地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形象在许多方面都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们发现，苏联在现代工艺方面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我们对自己的成就所作的传统评价已经站不住脚了。所有这些已广为世界舆论所了解的情况，有时使那些习惯于把我国当作象征，当作理想，当作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人感到十分震惊。

正如我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一些最狂热的乐观主义者一下子变得悲观绝望了。现在不仅在西方，而且

在我国，人们越来越大声议论，说苏联正在变成二等大国，变成“拥有核弹的发展中国家”，如此等等。自我批评发展成为自我抨击，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发展成为全盘否定以往取得的成就。

看来，抱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同那种对过去几十年采取盲目乐观的态度是一样危险的。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对苏联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对我国的对外政策潜力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客观而综合的分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的对外政策是怎样“出了偏差”的？在什么时候出的？为什么会出？我们是怎样采取了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一贯强加给我们的那些“比赛规则”的？什么时候采取的？为什么会采取？最后，弄清楚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的客观限度，以及这些限度与苏联社会的内部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

对外政策和经济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80年代所遇到的外交上的困难，都同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失去活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对不少人来说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当前如果说不是基本上，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正是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相对削弱这一情况，试图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对我国的阵地发起进攻。

过去长期忽视经济同外交的相互依赖关系

关于苏联的经济同对外政策的相互依赖关系的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被我国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忽视了。

显然，这方面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外交活动的历史似乎证明了我们取得的外交成就与经济的关系不大。建国70年来，苏联的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确实从来没有能够稍微接近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例如，现在按劳动生产率水平，美国的工业几乎超过苏联一倍，而农业则超过四倍多。然而，在这几十年中，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却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可不可以根据这一点就下结论说，我们在国际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同苏联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呢？我想不能这样说。就拿战前的那个历史时期来说，苏联的国际影响的增长在不小的程度上是与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经济生气勃勃的发展有关的，而当时正是西方经历“大危机”和萧条的时候。^①在那一时期，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了来自西方的人数可观的“经济移民”浪潮。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先是美国的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来苏联做工，他们是新制度优越性的最好的证明。

在战后时期，经济因素对保证苏联在国际活动中取得成就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一点在50年代特别明显，当时苏联的经济和科学都以战后时期最高的速度发展。在那些年代，西方看到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经济竞赛中有没有可能取得胜利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有人预测世界经济不久将要进入“苏联世纪”。我国的领导在那个时期尤其显得乐观，也真的指望“赶上和超过美国”。

同时，经济生气勃勃的发展还不足以说明苏联战后时期外交阵地很快得到巩固的原因。我国远非世界上唯一的发展

^① 苏联在那时向全世界展示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业发展速度，一年增长20—30%。——原注

迅速的国家。许多西欧国家，还有日本，甚至在对我们来说最好的50—60年代，在经济增长速度上都走到了苏联的前面。**战后外交成就“超过”经济实力增长，是由于苏联的军事威力、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对外的大量开支**

在战后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超过”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首先是由于下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苏联拥有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威力，起初足以与对手的潜力相抗衡，后来则变得势均力敌；能够给广大群众提出有吸引力的社会目标和口号；有计划地拨出较大部分的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需要，这个数字比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和平条件下能够拿出来的要大。

由于利用了上述因素，我国一直到70年代末都能够顺利地克服自己在经济上的相对劣势，并且能够有效地对帝国主义在国际上的阵地发动不断的进攻。比如，战后的开头几年，我们取得的最大胜利——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实际上同经济方面的因素是没有联系的，因为这方面起作用的首先是东欧国家内部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军事威力因素（这个因素至今仍然在那里起作用）。

因此，60—70年代我国的对外政策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取得成就，苏联经济生气勃勃的发展这一榜样，仅仅是一部分原因。起更重要作用的，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对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提供的直接的军事援助。

因此，在我国整个当代史上，苏联基本上是利用非经济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以及其他的）因素作为独特的“杠杆”，是在相当狭窄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支持强大而积极的对外政策的。

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减弱了外交的经济基础和非经济因素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大致从70年代中期起，苏联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失去经济发展的速度。速度减慢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当代史上第一次开始掉在美国的后面。^①

70年代，苏联国内发展的基本指标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削弱了我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一点也同样重要），这种落后情况对我国对外政策的非经济因素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非经济因素过去曾经卓有成效地弥补了我国经济实力的不足。

经济上的停滞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放慢，尤其明显地在军事因素的现状中得到了反映，这一点我国军方最近不只一次地指出过，西方的评价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根据北约鉴定专家的资料（他们是不大会缩小苏联的军事威力的），80年代中期在20个军事技术的基础部门中，苏联只有5个部

^① 根据美国的估计，考虑了苏联“潜在的”通货膨胀因素，1960—1975年苏联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每年4.6%和3.4%，而1975—1985年则分别为2.1%和2.9%。因此，苏联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自1955年到1975年由1:2.5上升到1:1.7，而80年代中期又降至1:2。从1983年起，苏联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上第一次落后于美国。在固定资产、原料和动力的利用率方面的落后也更加明显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上的落后。尤其是苏联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据西方估计，落后于美国7—10年，大中型电子计算机的数量只及美国的几十分之一，而个人用电子计算机的普及率只及美国的几千分之一。苏联在基本经济指标方面落后于美国，这影响到生活水平的主要指标方面的落后，其中包括居民健康状况这样的综合性指标。特别是从1964年至1984年苏联人民的平均寿命，据美国估计，下降了将近5岁，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的寿命却延长了。——原注

门相当于美国的水平。

我国的经济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国际威望，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方向和影响所起的极为不良的作用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

苏联社会相对的信息“保密”因素过去曾使我们有效地向全世界隐瞒了我们自己的劣势，但是由于这个因素在当前的条件下实际上已经失去作用，苏联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消极后果变得更为明显了。国际间交往的扩大，侦察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开性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有效地粉饰国内的情况。

这样，由于70—80年代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减慢，几十年来建立起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由功率较小的经济“发动机”带动的传动机制，曾经使我们取得外交上引人注目的成就，而眼下却受到了威胁。

80年代初，美国对苏联从长期防守转为外交上全面进攻

很自然，我们的对手，首先是美国很快就利用既成的形势，并且在80年代初从长期防御转向对社会主义的外交阵地发动全球性的进攻。根据苏联国内发展的消极趋势的客观性和长期性，西方开始认为经济是苏维埃制度的最敏感的环节，只要摧毁这一环，就可以使社会主义的其他部门遭到失败。因此他们对加速新一轮军备竞赛寄予厚望。

军事威力的辩证法

现阶段国际关系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的“经济

化”，经济和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发生的变化。军事威力和外交影响的相互关系上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

“军事实力是政治实力的根本保证”这种观点在长时期内似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受到我国外交科学和外交实践的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是政治实力的根本保证，而苏联军事潜力的不断增长则或多或少自动地转化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的增长。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的历史都证实了这种意见。正是由于苏联的军事实力得到加强，西方才不得不重视我国这个现实的力量，才不得不同我们进行政治对话，在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才考虑苏联的看法。苏联结束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创造了核武器的现代化运载工具，这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真正的革命影响。如果我们了解一下70年代缓和的历史，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在军事战略上同美国取得均势，是全球局势中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变化，这一变化迫使美国的领导人不得不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来看待东西方之间的关系。^①

从70年代初起，军事威力对外交的影响减小，甚至产生副作用

^① 其实，即使是战后的前几十年，说苏联的军事威力和它的政治影响之间有直接的依赖关系，那也是简单化的看法。请大家注意，1955年苏联武装力量的人数单方面裁减了64万人，1956年又裁减了184万人，而1960年再次裁军120万人。这一单方面的措施虽然规模很大，却并没有削弱苏联的外交阵地。相反，这些措施在“和平进攻”的其他因素配合下，促进了苏联的外交威望和影响的飞速增长，促进了国际环境的逐步改善。——原注

用

然而，在70年代初，苏联的军事威力同外交影响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依赖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尽管这一过程情况复杂，但可以肯定地说，对军事领域的投资所产生的政治效益开始减少。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苏联军事潜力的不断增长，开始对苏联的世界地位产生不良的影响。

可以以欧洲局势的发展为例。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苏联大幅度地扩充了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潜力。对苏联及其盟国来说，欧洲的军事平衡从来没有象80年代初这样有利。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在欧洲的阵地开始削弱，十分重要的政治倡议开始“停步不前”，在西欧，反苏情绪和保守情绪甚嚣尘上。苏联的军事潜力的不断增长导致西欧各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美国的周围，加速了西欧军事政治一体化的趋势，等等。

军事战略均势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已有所变化

军事战略均势在保证国际安全中的客观作用已逐渐有所变化。早在70年代中期，人们以为，均势现在是，将来也可能是取得可靠的军事政治上的威慑和世界稳定的永久保证。而在这种情况下，均势本身在我们的学者和军人们的著作中常常被解释成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保持在数量上大致相等，这个数量能保证在发生核冲突的任何情况下予侵略者以重创。

可以说，我们国内形成了一种对均势的奇特的“崇拜”，因为均势有时竟被说成是苏联在整个战后时期的主要成就。仅仅是保证安全的一种手段的均势，似乎变成了绝对的目的。除此以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两个体系之间力量的总的

对比关系常常被归结为两个体系的军事潜力的对比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了一种为我国经济的世界地位的下降而寻求“补偿”的尝试，但是我认为，这方面仍然是对军事威力和政治影响的相互关系的传统看法在起主要作用。

由于把数量上的均势绝对化，就出现了照搬美国的战略体系（还不仅是战略体系）和整套整套计划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始终考虑到两个大国的地理战略位置的不同，两个大国的经济潜力的不同，对苏联和美国的军事战略学说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也就更不考虑了。实际上，这意味的是按照对手的规则，在对手的场地上进行比赛，当然，这就不能不在苏联的外交立场上，在一年比一年增加开支的军备竞赛上表现出来^①。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开始明白，均势绝不是安全和稳定的永久的保证。军事技术发展的逻辑本身总是不停地导致战略态势的不稳定，即使在保持总的均势的条件下也是如此。除此之外，随着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武器品种的不断增多，随着他们过多的军事力量日益积累，人们发现，作为一方在进行反击的过程中具有给予侵略者以重创的能力的这种均势，绝不等于基本种类的战略武器在数量上相等。根据专家们的测算，只要动用100个核弹头就足以摧毁对方的几乎60%的工

^① 应该指出，照搬美国的军事体系和计划的倾向，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中的停滞现象已经开始日益明显。50年代和60年代，跟着美国人亦步亦趋的诱惑力也特别大，但当时的苏联在这一领域中表现出较强的独立自主精神。例如，在美国发展战略空军时，我们的反应是独辟蹊径，发展核导弹技术，而对付美国大规模建造导弹潜艇的计划，我们则建造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原注

业潜力^①。而这仅仅是苏联的战略潜力的百分之一。

美国已不再谋求军事战略优势，而力求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在军事建设中才形成了采取更大的灵活性的客观前提。西方，首先是里根政府竭尽全力可能，不让事态这样发展下去，这是很自然的。最近的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花了大力气，想方设法要把苏联牢牢地捆在西方的军事计划上。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主要目的甚至并不在于达到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军事战略优势（西方的战略家不能不看到，已经形成的军事政治平衡十分稳固，而在最近的将来，这样的尝试未必能够奏效），而在于用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从经济上把苏联拖垮，扭曲我国经济发展重点的体系，从而对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施加影响。

西方的领导人宣布的这些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例如，1982年12月里根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方面的第75号命令。根据报刊上披露的消息，这项命令规定要加强对苏联的经济压力，以求苏联国内政策发生变化，或者迫使苏联作出选择，要么大大缩减社会开支，要么大量削减军费。^②正如五角大楼的报告不止一次地说明的，上述目的应当通过所谓的“竞争战略”来实现；而这个战略规定要迫使苏联在尽可能多的方面跟他们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他们寄希望于利用美国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的领先地位，使苏联的军事优势不断失去价值，迫使苏联花掉一笔又一笔的经费，然后再使它们失去

① 见《在大量削减核武器的条件下的战略稳定》，1987年莫斯科版第41页。——原注

② 见R·托斯：《里根企图影响苏联的国内政策》，1983年3月21日《华盛顿邮报》；R·加索夫：《缓和与对抗：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美苏关系》，1985年华盛顿版，第1012页。——原注

价值。^①

今天，正当我们国内全面展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改革的时候，“经济拖垮”战略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指望阻挠改革，只要有可能，还要使改革过程走回头路，不让我国国内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而这一点又被看成是对苏联的外交阵地发动有效进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把苏联排挤出世界历史的一个步骤。

“新全球主义”对谁有利

西方的，首先是美国的战略家们，竭力要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他们借助的另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就是把我国卷入一场同美国进行的广泛的地缘政治竞赛。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方面指望美国在经济、外贸和金融方面的较大的优势，另一方面指望美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经济往来。可以说，美国向“第三世界”中亲美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有着独特的“经济核算”的依据：美国公司每年从发展中国家榨取的利润要比美国参与地区性冲突所支出的费用多许多倍。苏联向进步政府提供援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可能指望这种“自负盈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援助主要带有“计划亏损”的性质。

苏联援助发展中国家，往往不能收到预期效果

苏联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近20年来的经验表明，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政治影响方面来看，远远不是总

^① 关于“经济拖垮”战略的详情，见1988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期第42—50页。——原注

能带来预期的效果的。在80年代，我们亲眼见到，甚至我们最坚定的盟国（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等等）都开始积极设法同西方建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这样一来，西方就把用于保持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费用的主要重担压到苏联身上，而它们自己则利用这种稳定来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有时情况变得很荒唐：驻安哥拉的古巴士兵往往在保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建设项目，使它们不受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匪徒的袭击，但是这些匪徒竟然又是由美国出钱资助的。

出现这种对我们不利的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可以用来提供经济援助的资源客观上是有限的。第二，援助本身的机制不够灵活有效，援助的重点往往是“大而全”的项目（要几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庞大的工业和能源配套工程的建设，设计规划的实施期限过长，同受援国干部的联系不够，等等）。第三，无论是把西方各国和苏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作比较，还是把两类发展中国家（分别指依靠西方的国家和依靠苏联的国家）的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水平作比较，对我国都不利。西方宣传家们的游说现在比过去更奏效，他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说，苏联现有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不如资本主义的体制。他们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举出“新资本主义”国家（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等等）以及最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作为各种不同的有效的市场发展“模式”的范例；而把那些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老挝、缅甸、几内亚、坦桑尼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利趋势当作消极的例子。

苏联援助只在夺取政权后的初期有效

的确，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经济援助也好，军事援助也好，往往只能收到短期效应，主要是在夺取政权

时期和这个或那个进步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后来，随着所谓的日常经济建设的开展，年轻的国家就开始越来越转向西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后果也就随之而来了。经验表明，要克服上述趋势，唯一的办法是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大规模的援助，等于无偿地资助这些国家的整个经济。

80年代美苏互换了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包袱越背越重

这些问题在60年代和70年代并不那么尖锐，当时苏联基本上支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左派反政府力量，而美国则充当原有社会政治状态的主要保证人。80年代苏联和美国互换了所扮演的角色：现在苏联在许多地区支持的是掌权的民族民主政府，而美国试图颠覆这些政府。当然，这种角色的转换可以看作是我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地位得到加强的证明，但是这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难题。

在“低烈度冲突”中，支持游击运动所支出的费用比支持政府所支出的费用少得多，这一点美国利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新全球主义”和“低烈度冲突”的观点在美国的领导人中相当流行，这是不足为奇的。按照美国的观点，阿富汗的冲突就是说明这种政策的“经济效益”的生动的实例。苏联在这个国家每年的军费开支是50亿卢布，而美国每年用于援助阿富汗反政府力量的费用不超过10亿美元，也就是只及苏联开支的1/6—1/8。根据西方的估价，在尼加拉瓜、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的冲突中，美国的开支和苏联“感应”开支的比例也与此类似。

结果是：苏联背上了比美国沉重得多的军事援助包袱。根据国际统计资料，80年代中期苏联给发展中国家（包括越南和古巴）提供的这种援助（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美国所提供的类似援助则

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3%。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地发起诋毁苏联援助的运动，说苏联提供的援助主要是军事上的，说苏联的援助使受援国政治上受到“束缚”，而且科学技术水平很低。根据美国的估计，苏联援助中真正的经济援助还不到总额的1/10，而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占总额的2/5。

因此，根据许多数据来看，苏联在“第三世界”中同西方国家竞争，愈来愈难以见效了。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低烈度冲突”，企图通过提高我国武装力量的机动性水平的途径来创造发挥影响的新的可能性，都只能加重目前存在的困难。

苏联的回答

80年代中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形势刻不容缓地要求必须寻求对抗帝国主义全球性进攻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我们对这种挑战可能作出的反应归结起来有两种基本方案。

第一种方案要求通过增加用于外交和军事的开支的比重，来弥补我国经济方面相对薄弱的状况。第二种方案归结如下：保留或者降低外交费用，缩小我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的缺口，从而减轻经济负担，加强对外政策的经济基础。用军事的语言来表述，第一种方案意味着“不惜任何代价固守待援”，而第二种方案的意思是“退守预备阵地，尽量减少损失，积蓄力量”。

直到1985年，在我国更换领导人之前，在我国对外政策中，看来占主要地位的是第一种反应方案。当时的对外政策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常常企图避开国内那些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转移到”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国际活动上，通过积极的、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来弥补国内的不景气。这种努力只能收到短期效应；苏联经济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停滞趋势不可避免地要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地位产生影响。目前，由于提出“新思维”的概念，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第二种方案即更为现实的反应方案的成分增多了。然而，看来还不能说已经作出了最终的选择。因此，对上述两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加以分析是很重要的。

80年代中期，用非经济手段加强外交的力量已经耗尽

如果仍然主要采取第一种反应方案，苏联至多也只能指望短期的外交成就。由于目前实际上已经用尽了所有可能加强我国对外政策的非经济手段，如果还要调动这些手段，又没有经济实力作后盾，势必适得其反。调动军事因素尤其会导致加剧世界紧张局势，而调动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又会损害我国的意识形态的名声。况且当前苏联社会信息“开放”的趋势也未必可能逆转，不可能再回到保密和厚厚的“铁幕”时代。

采用第一种方案必然会增加外交和军事开支的负担，给民用经济带来明显的损失，使民用经济的现代化计划受到威胁，从而使我们失去对“紧急增援”所抱的希望。除此之外，这还将导致降低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在这方面的忍耐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就是现在我们国民收入中用于军费和援外的部分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而用于最重要的社会开支的比重（更不用说绝对数额）却远远落在美国的后面。

还必须估计到，苏联与美国不同，它在负担高昂的外交对抗的费用时，指望不了盟国能提供任何可观的援助。把两

个对立集团的总的经济力量拿来对比，情况比拿苏联同美国单独比较更糟。从主要的经济指标来看，华约组织只占北约组织的40%，而只占北约组织加上日本的31%。除此之外，西方有迅速发展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国家作后备。而这种后备力量我国实际上根本没有。

日益增加的军事和政治开支的沉重负担导致经济的衰竭，这对构成我国威力的军术技术本身的影响将愈来愈严重，如果要在太空开展军备竞赛，则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和科学潜力，但它在提出战略防御倡议时，也要求助于自己的西方盟国。

因此，按第一种方案办，在可能预见的未来，多半会导致加剧目前存在的消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恶性循环”的局面，为了加强对外政策而不惜损害经济的做法将会削弱对外政策，如此等等。结果是：我们不仅不能加强我们的国际阵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得不将这些阵地一个一个地放弃。

应在重新估计国力的基础上采取退守做法

第二种反应方案要求及时退到预有准备，而且确实守得住的阵地上，因此它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这个方案的复杂性在于，实施这个方案的基础是必需彻底审查我国的外交战略，包括现实地重新估计我国的力量。

此外，新的外交战略还要作可靠的经济论证，这个论证的根据是对现状所作的现实的估计，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对我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和盟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所作的可靠的预测。我们的目标和对国外承担的义务应当重新加以审查，要有更大的选择的余地。特别是应该逐步放弃在全世界同美国竞争的做法，不再对那些不得人心的政府、政治运动

和党派等等提供代价高昂的支持。

确定在国外的经济利益范围和重点应为新外交战略重要内容

确定苏联的国际经济利益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目标的概念，应该成为新的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大家很清楚，经济利益观念和经济利益范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基石。而苏联在其他方面（例如军备竞赛或者意识形态斗争）往往跟着美国亦步亦趋，但是在这方面却不知为什么总是选择另一条道路，并且公开地吹嘘，说它在国外“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似乎我们的钱太多了，可以不考虑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论如何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可以忽视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当前的形势下更不能这么说。

外交应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停止对某些盟国无偿资助

我国发展的客观条件要求明确地确定我国在国外的经济利益范围和重点，要求把任何一项重大的外交决定放在经济效果和费用的天平上权衡。换句话说，我国的对外政策应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特别是要停止对我们的某些盟国的经济实行无偿资助的做法，应该把这种援助同为增强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力而进行的改革密切地联系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建立一个具有类似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职能的组织。也可以利用经互会现有的那些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

军事上不求势均力敌，只求合理够用

彻底落实合理够用这一思想，迅速而卓有成效地使这一思想具体化，这对优化苏联外交战略有着巨大的意义。尤其是，为了确保安全，要把政治、军事、经济、人道主义的方

法合理地结合起来，而其中政治方法应该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为制止侵略，防止爆发战争所必需的军事威力，首先不应以同对方的武装力量势均力敌为目标，而应该以够用为限度，就是以起到制止对方领导人发动战争的作用为限度。

在合理足够的基础上确保安全的办法，要求不仅要现实而辩证地估价对方的实际能力和假设的能力，而且还要估价对方的意图，其中主要是要估价对方的长远利益所在。

对西方军国主义的危险既不缩小，也防止夸大

在分析对方军事学说和思想的时候，也需要现实主义，目的是揭露并且是当众揭露其中的侵略因素以及经常出现的虚张声势和欺骗行径。西方的军国主义者需要“敌人”，需要无耻地夸大我国和我们盟国的军事威力。社会主义不需要这样的“敌人”，相反，我们倒是需要最大限度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既要防止可能出现的对危险估计不足，同样也要防止夸大这种危险。

在军事建设中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可以促使经济拖垮的方针垮台。军事建设自然要考虑到对手的潜力，但军事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本国明确提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针对对方的行动作出反应。

进一步加强苏联及其盟国在军事学说和思想上的防御性成分，对实现这个目标，对加强信任，对搞垮那些主张继续搞军备竞赛的人的计划，对搞垮对抗政策都会起促进作用。

在地区问题上要得到喘息机会

我们认为，在解决苏联对发展中国家这一地区的政策问题时，要坚决抵制美国企图把我们一次又一次卷入冲突、使我们背上新的义务、更多地消耗我们的财力的种种尝试。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一种可以保证我们得到喘息机会的学

说，这是苏联进行的经济改革和提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吸引力所要求的。

在确定我们在世界各个地区的政治利益和目标时，也必须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实用考虑，并且要使这些目标更符合我国的经济能力和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外交目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就要使我国的军队具有相应的机动能力，以保证苏联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种提法不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已被历史的实践本身所推翻。十分荒唐的是，60年代，即民族解放运动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在“第三世界”大为流行的时期，苏联军队并没有在那里履行这种职能；而到了70年代中期，当苏联军队开始履行这种职能的时候，“第三世界”却已明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偏移，这种荒唐的做法实在可悲。**社会主义不应该为既无社会基础又无自卫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充当“保证人”**

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为那些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也没有自卫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充当“保证人”；实行这种方针就意味着要耗费大量资财和损害新的社会制度的声誉。不应该忘记，两种体系的竞赛的结局最终不是由尼加拉瓜或者阿富汗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来决定的。列宁曾经指出，新的社会制度只有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去战胜旧制度，这一思想在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任何寻求通向社会主义的“更轻松的”捷径的尝试，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巨大失败。我们为过去的失误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我们没有权利再次失误。

为防止再次失误，应在外交领域对官僚机构实行上下监督

在对外政策领域大力提高公开性的程度，使这一领域作

出重大决定的过程民主化，使这一领域摆脱官僚主义的压迫，这应该是防止重犯这种错误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

从我们国内生活的实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官僚机构对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起着多大的阻挠作用，建立在竭力（远非任何时候都是自觉地）保护自身的小集团利益、特权等等之上的官僚机构的影响是多么令人望而生畏。认为掌管外交问题的官僚机构似乎与掌管内政问题的官僚机构有着质的区别，这至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掌管外交问题的官僚机构起的作用看来要更大，因为众所周知，外交领域有一定的保密性并且靠少数杰出人物决策。因此，经常地和有效地对官僚机构实行既从上面（从国家领导方面）又从下面（从社会舆论方面）的监督，应该成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由于国家战略的形成只能是综合各种社会集团的外交目的的结果，只能是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的结果，因此，形成国家战略的过程不但不排斥，而且要求进行讨论，在社会上进行争论，让各种不同的观点交锋。只有在进行这种争论和讨论的过程中才能取得真正广泛的和真正社会的一致意见。

（原文载于苏联《国际生活》，1988年第7期，黄有自译）

革命理论与当代

季利根斯基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需要摒弃被形势发展证明已经过时的某些马克思原理：

1. 革命的动力问题：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壮大，既加强了它作为社会进步改造主体的作用，又成为妨碍实现这一作用的因素。工人阶级已不再表现为单一的社会共同体，其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也扩大和多元化了。现在，能最大限度地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集团和共同体才能成为革命进程的主体。不宜再无条件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的任务是同左翼政党和组织结成权利平等的同盟，为团结民主力量作出更大贡献。

2. 革命变革的内容问题：在当前条件下，社会反抗情绪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已日益减小。革命实质上是民主的行动、群众自身的行为。在革命变革中要争取扩大的和实际的民主。不应只有代议制的民主，还应有群众实际参与政治决策和管理的民主。

解决民主化和人道主义化这两大尖锐问题，两

种制度存在着共同点。应全面地和历史地重新估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应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管理经济和处理社会矛盾的经验。

革命进程从5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变化，70年代以来大大减缓

在当代条件下，显然很有必要从原则上重新认识一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的途径和前景。革命过程的进程和形式中的重大变化，大约从50年代开始就被感觉到了，而在最近几十年表现得更加充分。在7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革命过程的进度大大地减缓了，它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增多了。这一点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革命趋势严重减弱；智利革命的失败和葡萄牙革命成果被阉割；摆脱了殖民地依附地位的国家（其中包括那些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发展中遇到各种矛盾。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曾经形成一种观念，认为世界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资本主义阵地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观念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符合新的历史现实了。世界已经进入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和平竞赛的历史时期。和平竞赛现在已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主要形式——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共存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在世界舞台上的“消失”，而是大大改变了这一斗争的性质和内容。

分析现阶段革命过程，马克思主义原理有的已完全过时，有的有所不足

仅仅依靠以前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制定的理论原理，是不可能对现阶段的革命过程进行分析的。这些原理有的有缺陷，有的已完全过时了。

当然，重新认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历史成果采取某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放弃它所制定的认识社会现象的理论—方法论原则。

但是，当代的社会现实以及由它产生的各种问题，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过程的理论赖以创立的历史条件有了极大的区别，因此它过去所得出的结论远不是全部都能成为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理论基础。

担心这种判断会被看成是什么“修正主义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大家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不止一次地修改自己对重大问题的观点，只要历史环境的变化、新的社会政治经验要求这样做，而且，他们有时是非常迅速而坚决地修改自己的观点的（例如，回忆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构想上的多么深刻的转变）。

过去的“创造性发展理论”，具有折衷主义性质，缺乏自我批判

我们始终都在谈论创造性地发展理论的必要性，但是现在还得十分尖锐地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指出我们在理论观念方面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过去这种发展，往往就是把根据某些迫切需要提出的新的原理同旧的原理或多或少机械地结合起来，而不去进行任何认真的尝试，以阐明新的现象及对它们的评价给我们的整个理论体系造成的影响。结果革命理论的完整性、逻辑统一性遭到破坏。这种理论与其说是得到了发展，不如说是肤浅地“迎合了”社会政治形势，从而具有折衷主义性质。而下面一些表现又助长了这种情况：害怕批判地修改正在过时的原理，避而不谈十分尖锐、不够明

确的问题，或者只是官样文章式地在口头上“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不是按次序来说的最后），缺乏对自身实践的自我批评性的分析以及辩护性的倾向对理论产生的影响。例如，50—60年代的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文件大多带有这类特点。在这些文件中，既反映了认真地创造性地革新理论的意向，又反映了实现这种理论革新的不彻底性。

现实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要求，对当代革命运动来说，是最迫切的要求之一。这首先涉及全人类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革命斗争和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各种道路共存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相互联系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

把两种制度的对立绝对化，妨碍了对当代革命运动作科学分析

妨碍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科学的分析的，就是根深蒂固的关于当代世界两极化的模式，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对立的一种片面的绝对化。近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中，越来越清楚地听到一种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现代世界各个不同部分的相互依存在日益加强，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需要应放在优先地位。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思想看来还没有同关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关于世界社会进步和革命过程的理论观念结合起来。

上述的两极化模式的表现，就是关于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发展过程具有绝对相互排斥、全面对立的性质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发展完全被归结为日益深化的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则被归结为一贯的不间断的社会进步。至于“第三世界”国家，对它们来说，似乎只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已经定形的模式中间进行选择。

我认为，这种描述的严重缺点不仅仅在于它使发展的实际复杂性、辩证性和多样性极端简单化。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描述不是指引共产党人、其他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去创造性探索符合客观可能和趋势的斗争道路和方向，而是指引他们去机械地照搬现成的模型，在革命变革的内容和形式上听命于某种注定的结局和“指令”。

近几十年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注定的结局同现实的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是革命胜利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革命力量的活动，总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发觉先前采取的方针和目标有缺陷或者不适用了。例如，革命后所实现的那种形式的所有制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正象现在已清楚地看到的，其本身既没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也没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任务远比过去复杂，核武器的出现是主要因素

在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在资本主义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某一进程中，可以相当迅速地引导群众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现在，革命力量的任务要比那时复杂得多，首先是要提出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符合群众的社会心理状态的阶级斗争目标和方针的问题。换句话说，具有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的革命过程，要求对以前的经验进行经常不断的批判分析和重新考察，并不断探索新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它同照搬先前的现成公式是不相容的。

引起世界革命过程的条件和进程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发明和储存，这在客观上把人类的生存问题变成了世界舞台上各种社会力量的压倒一切

的利益。对这一点有促进作用的是生态问题和人类文明的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尖锐化，是决定世界各国人民现在和未来生存条件的多层次的技术—工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过程的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为了防止热核灾难和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而进行的和平合作，成了国际生活中的不可违背的绝对命令。

另一因素是社会主义的影响促使帝国主义改进了政策

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在革命过程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在性质上也发生了的变化。一方面，这种影响是促使帝国主义在经济、社会战略和政策上有所改进的强大因素。象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国家经济调节的迅速发展，基本劳动群众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的一定程度的扩大，战后几十年来的进步的社会改革等等现象，自然是由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演变、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但是，这些现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对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新格局作出的一种反应，这些现象也是帝国主义力图先发制人巩固自己的社会“后方”的结果。上述因素也加强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战略的新的趋势，促使它采取一些足以将发展中国家牢牢地捆在资本主义体系上的措施。

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矛盾减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两个体系竞赛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困难和矛盾增多了：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出现停滞和危机现象，官僚主义和反民主倾向在滋长。于是，社会主义榜样的吸引力减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当然，在分析当前革命过程存在的问题时，必须估计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估计首先要求了解这些革命的整个历史特点，理解这些革命中一般和特殊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为此，必须克服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历史特点机械地当成“普遍的规律性”的做法。同样重要的是，要深刻地掌握列宁关于革命是生动的创造性的过程的观点，这个过程必然包含进行社会试验、修正未被生活证实的观点的成分。揭示革命过程的规律性，这决不是把过去的经验引伸到现在和将来，不是把它理想化。这首先要用下述观点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分析：第一，它所受的具体历史情况的制约性；第二，它对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原则所具有的意义（正面意义和反面意义）。

需要重新认识革命的动力、危机、形势等传统观念

我们不妨使用上述的方法论理由来分析一下当代革命过程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两个“问题的症结”。

第一，这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前提和动力的问题，即：谁是革命变革的社会主体，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动力和利益的影响下，这些或那些社会集团能够表现为革命力量，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实现相应的行动等问题。

第二，这是革命变革的具体内容问题。

在分析上述问题时，我们感到今天必须对我们的科学和政治语言、对我们惯用的理论概念进行某种重新认识。要知道，甚至连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工人阶级”、“阶级联盟”、“工人阶级政权”等等，在今天也决不是一目了然的和天经地义的。在许多方面妨碍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性发展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这类概念往往变成了意

识形态方面的套语，它们只是被用来作为理论上的抽象概念；我们还很少给自己提出问题：这些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各种社会力量的真实的分布情况以及群众性的社会活动主体的特点。

需要重新认识的还有关于革命危机和革命形势产生的直接原因的传统观念。这种原因主要被归结为群众由于生活状况恶化和当局实行违背他们利益的政策而产生的愤怒情绪的增长。这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它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和实行暴政的独裁制度。但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种观念就显得越来越不适用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反抗情绪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日益减小

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所达到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它的社会战略，以及由这一切所引起的群众的需求和价值结构方面、社会意识方面的变化，在许多方面都重新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早在50—60年代经济相对“繁荣”时期就已发生并在70—80年代具有危机性质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积蓄着潜在的社会反抗情绪，但是这种反抗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了。这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社会心理以及政治状况长期以来的结构上的特点。

我们来谈谈其中的几个特点。

1. 现代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它所制定的社会应变措施，使它甚至在经济发生危机性动荡的条件下也能够避免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急剧恶化，使不

满和反抗的增长局限在相对有限的社会集团之内。

2. 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结构改造，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活动更加困难。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别，过去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未能在工人阶级中赢得广泛的影响，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它甚至在自己过去曾取得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地位的国家中，也遇到了自己的地盘日益缩小的威胁。

3. 在资本主义社会近几十年来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的影响下，群众的需求和价值目标、群众的心理和意识的结构，都有很大的变化。群众社会行为的激情动力减弱了，“理性”动力增强了，更加迫切地需要具体地了解社会—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以及这些后果对有关群众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可能产生的影响。群众意识对彻底改造社会的抽象公式和象征性公式（对所谓“主义”）越来越难以接受了，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具体了解和具体解决办法越来越感兴趣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仍然存在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意识中，但是，他们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行为，并未表现出想要直接实现这些理想的意向，也未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制度实现“全面”变革的愿望。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意识特别是群众意识中，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反抗与其说表现为打算实行这种“全面的”变革，用别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不如说表现为要求改变这种关系的一些具体方面，要求这种关系把服从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提到首位。虽然不能企求做任何长远的预测，然而可以设想，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中心将不是保存或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而

是使现存的关系和生活方式人道化和民主化的问题。

4. 已经形成的国际关系的“集团”结构，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成统一的政治阵营的事实，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国际生活中已经确立的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保持力量的稳定平衡的趋势，——所有这一切大大限制了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在短促的时间内（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即使假定某个国家革命爆发的内部条件有可能已经成熟）。

发展中国家尚未解决最佳发展道路问题

本文不准备专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革命运动的问题，但是，应当指出，近几十年来，那里的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要比资本主义堡垒中的国家丰富得多，而问题在于哪种道路是最佳道路，这个问题事实上还没有解决。同时，整个世界社会进步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选择。不管怎样，对这些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刻的不带任何框框的探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虽然不充分，也不是始终一贯地）上述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从50—70年代共产党纲领性文件中的新的评价和论点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些文件中特别注意到革命斗争比过去设想的还要一步一步地循序发展，它的非暴力、非武装形式、它的“合法的”形式（革命的“和平道路”），使争取限制垄断组织的权力、争取实际民主的运动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但是，不管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速度、阶段如何，上面提到的关于能够实现这种过渡的社会力量的问题仍保持有自己的全部意义。或者具体地说，关于工人阶级是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的

领导力量、是在这场争取改造的斗争进程中能够克服自身分裂、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把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力量原理，在现代条件下该怎样“发挥作用”呢？

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已不能仅仅归诸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

要分析这个问题，至少要对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集团现阶段发展特点的趋向、它们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它们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作出根据充分的评价。已经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论述了这个课题，它们的结论都证明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社会冲突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证明这些冲突不能归结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家知道，工人阶级的界限已经扩大了，囊括了广大的职员、脑力劳动者阶层，现在它包括绝大多数靠工资收入的居民。一方面，这潜在地加强着工人阶级这个进步改造的基本群众主体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增长和扩大，实际上又成了大大妨碍它实现这种作用的因素。现在，同过去任何时候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表现为单一的社会共同体。当然，无产阶级在过去也曾按照不同的阶级觉悟程度和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而分成若干集团，但是，现在无产阶级的这种传统的分化同直接的集团利益在阶级内部日益加深的分化越来越交织在一起了。

应重新强调作为客观社会经济范畴的阶级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阶级之间的差别

马克思曾强调指出作为客观社会经济范畴的阶级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阶级之间的差别。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版物中，这种差别往往被低估了。其实，在现代条件

下，在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这种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变得深刻化了。如果抛开资产阶级本身不谈，表现为实在的社会主体的（也就是由一定的社会心理共性联合起来并追求自己的特殊目的和利益的）集团和阶层常常带有阶级内或阶级之间的特性，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似乎超越了阶级的和“客观的”（也就是只按社会经济特征来区分的）阶层的界限。

例如，有发展前途的生产部门和行业的工作人员、科技知识分子、部分工人以及同这些部门和行业有联系的新型的小企业主就属于这些实际发挥职能的共同体成员。他们倾向于同统治阶级进行一种“冲突性的合作”，以促进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关心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他们往往易受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

另一个较大的共同体是由政治思想方面无定形的大批中低等技术水平的工人、服务部门的劳动者、农场主以及较少感受到危机过程消极后果的职员组成的。他们既对本身地位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表现出不满，又因害怕工艺和结构方面的改进使自己失去这种地位而表现出社会—政治上的调和。同时，所谓“没有保障的”阶层，也就是完全或部分的失业者、勉强糊口者、“新贫民”、破产的小业主等的人数在增长，这个阶层最广泛地代表了有劳动能力的居民的低级集团。这些人处于动摇状态，有时铤而走险，有时又听天由命。

还有一个特殊集团，就是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日益缩小的传统的工业部门和行业的工人。通常，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性和组织性的部分，但是，失业和入不敷出的威胁又使他们不能进行积极斗争和在阶级对抗中充分发挥先锋作用。

知识分子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

增大

同物质生产基本上没有联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对普遍人道主义的和全球性的问题、对生活方式人道主义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充实了非传统的民主运动的队伍。与过去不同，今天不能简单地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动摇于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具有民主思想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成了吸引其他集团中那些对社会政治有反抗情绪的代表人物的中心。

甚至从上面所列举的（必然是简短的和笼统的）各类人中就可以看出，今天仅从传统的“阶级”原则（也就是指望工人阶级把其他群众阶层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出发来组成垄断寡头政体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是何等困难。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和社会心理发生严重分化的情况下，片面强调狭义的阶级利益，不仅无助于这种反对派的发展，而且还会促使已经表现出来的危险趋势变成“集体的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如果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公式出发，而是从实在的社会现实出发，今天要找到（如果一般说来有可能的话）这样一些既能把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同时又能根本区别于其他群众阶层的利益的最直接的阶级利益，看来是极其困难的。当然，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今天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用狭隘集团的小团体利益的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危险性是确实存在的。

需要把阶级的和集团的利益同全人类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上述观点表明，在反垄断制度的反对派的发展中，以至在革命过程的发展中，阶级的、集团的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

的有机结合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

我认为，这种结合，不仅应当理解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应当理解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利益，这种利益体现在能够把社会绝大多数人联合起来的社会目标和理想中。这些理想就是：和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经济福利和社会公正、个性自由、健康的人类关系和生活方式。重要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这些以及与其类似的理想，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倾向和思想信念如何。显然，对革命力量来说，重要的是要努力使集团的（包括阶级的）利益从属于全人类的这些理想。可以认为，首先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实际捍卫这些理想的集团和共同体才能成为革命过程的主体。

这些共同体未必可以同任何特定的“客观的”社会—阶级集团混为一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活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中，在民主反对派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因素外，文化和心理因素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社会视野的扩大，人们独立的思考，他们的精神需要提高的程度，价值目标的型式等。而且，由于这些因素，在同一的客观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基础上，也会产生意识和社会行为中的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趋势。例如，劳动人民中多少“享有特权的”阶层的某一部分人致力于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而另一部分人则趋向于反抗生产和社会中的寡头政治的权力关系、统治集团的反民主的政策、文化领域里的状况、生活方式的非人道主义表现及军国主义。民主力量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支持和发展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中的这种趋向。

无条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一定正确，共产党应同左翼

政党和组织建立权利平等的同盟

同时，当前革命斗争的目标所具有的普遍人道主义性质，同这一斗争的阶级内容是不矛盾的。重要的只是要看到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客观上已经合乎规律的扩大了。现代工人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构成社会的绝大多数，他们只有围绕着旨在解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的纲领才能联合起来。

关于反垄断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问题需要进行特别的分析。无条件地坚持共产党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未必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对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是努力加强自己在反政府运动中的作用，为制定这一运动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民主力量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这同追求对运动的政治领导权的意义是不同的。这种追求之所以不现实，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党的群众影响是薄弱的。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劳动群众同不同的政党、派别、运动都有政治上的联系，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多元化的理想决不是一种幻想，而是群众政治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反对派的政治组织，只能设想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其他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些权利平等的参加者的同盟。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现在我们来谈谈革命过程的第二个重要方面——进步变革的内容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必须全面估计革命已取得胜利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大家知道，这些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经不是基础产生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是相反，党和国

家这个上层建筑创造了新的基础，既擅自改变了生产关系体系，也改变了社会结构。这条道路保证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速度，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可能性。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这样的危险后果：唯意志论、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出现了，社会经济体系和经济文化变成了抽象的空想的构思结果，整个经济的发展遇到了阻碍。

社会主义的社会成果是巨大的，也是无可争议的。这包括充分就业的保证，劳动者在生产中地位稳定的保障，国民教育制度的民主化，为劳动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这也是劳动者在社会保障、保健、休息和文化等领域获得的新的权利。在历史方面，社会主义的成果标志着世界社会进步的崭新阶段，正如前面指出的，这些成果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形势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树立了空前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落后的半农业国改造为强大的工业国的范例；这个范例至今还对那些正在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国家具有吸引力。

形势的变化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独一无二变为受到竞争

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的正面经验的一系列具体方面的意义也在随着全球的具体历史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在产生集约化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粗放的经济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管理体制都在失去自己的优越性。而且，这不仅关系到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也面临着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的任务。就是在社会领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来也不象在20—30年代那样独一无二了；在这一领域资本主义已被迫在社会保障、

保健、教育等方面同社会主义进行竞赛。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反复制造失业，广大居民阶层的物质和精神贫乏，但同时又在推行经过慎重研究和考虑的社会政策，以便从客观上限制这些现象的扩展。如果断言，甚至在保守政府那里，这样的政策也只限于削减社会开支和鼓励大批解雇，那这至少是天真的想法。

应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验——国家调节和企业自主相结合

在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性和道路时，研究一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验及其调节经济和社会过程的特有方法是很有教益的。大家知道，这种调节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关系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使经济摆脱危机。但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在一切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条件下，它能保证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高效率以及虽不稳定但是以感觉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仍然是事实。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目的的集中调节同经济活动主体的自主性结合了起来。

这些主体——资本主义企业（私有的或者国有的）的阶级性以及它们所特有的动力和目的使它们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活动主体，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放弃经济主体（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自主性原则。而经验表明，放弃这种原则会大大削弱整个经济机制的生命力和效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垄断调节的许多成分，正如列宁已预见到的那样，是可以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加以利用的。

从历史的和现代的经验来看，今天首先要求革命变革要立足于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规

律性。这种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同唯意志论的独断专行的方法是不相容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它称为自然—历史的形式。它也考虑到价值规律的利用、生产者之间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市场关系的必要性、经济的多成分性、集中的计划和调节同经济活动主体的自主性的结合。**不应仅有代议制民主，还应有群众实际参与决策与管理的民主**

还必须深刻考虑革命过程中那些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的政治领域、政治组织有关的教训。任何革命实质上都是民主的行动，群众自身的行为。因此，革命变革的整个过程就其实现的方式来说也同样应该是民主的。这就是说，在实行这种变革的社会中，不仅应该只有代议制的民主，而且应该有群众实行参与制定政治决策和参与管理的民主。大家知道，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其实，“参与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客观规律之一，因为没有这种民主，就不可能有群众对管理系统的反馈，而没有这种反馈，这一体制迟早会不再造福于群众，而开始为自己谋私利。

在当代条件下，关于保卫革命成果、镇压国内反革命的方法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途径就是放弃把加强国家惩治机关这样一种方法绝对化的作法，全面发展能够孤立反革命并且能够有效地捍卫革命目的的独立的群众组织和运动。

总之，可以得出结论：在当代条件下，革命力量所解决的任务的本质和特点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引导群众为社会主义、为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而斗争，所以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性质是相当

清楚的。在当代条件下，革命前景的问题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制定出可以取代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的民主方案才能找到答案。

显然，探索进步的社会变革的途径，探索这一变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可供抉择的形式，使之符合生产力和现代人需要的发展趋势和解决全球性人类文明问题的必要性等，这在客观上已成为目前革命力量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这种探索的主要方向是：形成排除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文明的国际关系；和谐地发展经济，使科学技术进步造福劳动群众并能保护地球上人们生活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全面地人道主义化，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为个人的物质和精神—心理福利创造条件；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彻底民主化；消灭饥饿、贫困、野蛮的生活条件、“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换句话说，实现这样的探索是与争取社会进步的实际斗争密不可分的，在当代条件下，这一斗争正在成为革命过程发展的总道路。显然，只有在开展这一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必要的条件，以便提出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并使革命先锋队和劳动群众认清这些目标的具体内容。

探索社会的革新和改造，两种对立的制度有许多共同点

如果不被简单的模式遮住眼睛，那就不难看出，对社会的革新和改造的探索，在两种对立制度的条件下具有许多共同点。不能只是这样提出问题：在一种制度的范围内谈论社会主义的完善，而在另一种制度的范围内谈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即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无论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的活动，就

其自身的内容来说，都是要解决一定的问题，实现一定的社会需要，而这些问题和需要在不同制度的条件下有的差别很大，有的则很相近和类似。例如，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今天没有同失业作斗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但是无论在他们那里还是在我们这里，人道主义地利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社会和个人生活方式的人道主义化、真正的、非形式主义的民主等问题（尽管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条件有各种差别），都是十分尖锐的。当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具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但是很有象征性的是，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官僚主义都被社会公认为社会正常发挥职能和正常发展的障碍，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在积极探索用民主的方法取代技术统治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

当然，这些事实丝毫不能证明过去流行的趋同论是正确的，也不能抹杀两种对立制度的原则性差别。但是这些事实表明，当代世界的整体性并不局限于世界不同部分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尖锐的全球性文明问题的现实性。这种整体性还在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开展的一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过程以及由这些过程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性。

这个结论对共产主义运动、对其他革命力量和进步力量的活动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在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革新的进程中，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一世界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前景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性问题。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进程主要取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革新的进程，正如在以前的历史时期那样，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前景，同社会主义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创造性过程的发展和结果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革新活动应当全面地和批判地估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的全部经验。我认为，对社会进步的问题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大大扩大国际上创造性对话和合作的基础，无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在共产党人和所有赞同进步的民主的价值观和理想的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想派别之间，都是如此。

（原文载于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88年第3期，王治平译）

新的政治思维和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

亚·加尔金

新的政治思维只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直接针对社会发展问题的那一部分，但却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是对立的主要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的变动愈大愈快，各国内部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就愈大。要使各国内部变动不影响到国际局势的稳定，应建立严禁干涉各国内政的国际机制，各国在实行内部变革时也要注意不给外来干预力量制造机会。

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大流派正日益接近。工人运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集中力量争取扩大和完善民主；在发展中地区，要依各国的不同发展水平，或在国内推动民主，或在国际范围内制定民主抉择的纲领。

一提起新的政治思维，就要引起广泛的争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要求抛弃许多过去的观念和看法，

* 本文作者亚历山大·阿布拉莫维奇·加尔金是历史学博士，教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注

而且要求为20世纪末由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而产生的问题找到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允许人们想各种问题和改变看法，而不应有禁区；否则，对问题的分析就可能不符合实际，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其说反映了真实情况，不如说是一厢情愿。本文自然无意对这里提出的问题作什么全面的阐述。这方面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一

积极推动人们更新政治思维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认识到了在使用最新式的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战争中，人类可能自己毁灭自己。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在对外政策活动的目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上以及在什么是真正的民族利益的问题上那一整套观念，需要重新估价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各种因素的作用，需要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同制定外交战略、制定确保安全的构想有关的问题，等等。

同时，新的政治思维同各国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所有问题，包括阶级斗争问题，因而也包括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国际关系稳定、国家内部动荡这两种趋势之间存在矛盾，因此需要新思维

第一，由于从纯理性的观点出发承认使用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的战争已不可能爆发，而一些低强度冲突却有演变成各种大规模的冲突的危险趋势，人们必然会把稳定国际局势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世界上的力量格局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往往跟这国或那国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分不开。同时，社会结构是一种多变的因素。而且，世界上的变

动愈快，愈大（我们现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各国内部发生社会变动的概率也就愈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局势稳定而社会领域中局势不稳定，这二者如何做到“并行不悖”，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显然，如要以积极的态度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一些观念，如什么是稳定的国际局势，在世界各地进行着深刻社会改革的条件下如何保持这种局势。

还可以提醒一点，必须把战争从对外政策武库中清除掉这一有原则意义的结论正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如下问题：国际间如何分工，如何分配自然资源，如何解决其他一些全人类共同的并对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来处理许多国内问题。

新政治思维不仅变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变成对立的思维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今天需要新的政治思维，是由于20世纪末人类共同体中正在发生许多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人类对自然界的压力猛增，首先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有限而工业生产迄今一直沿用过时的浪费严重的模式，二者发生了极其尖锐的冲突，这就造成了生态灾难的威胁；人类共同体中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物质条件上和社会领域中的差距拉大，加剧了它们的两极分化；工艺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工艺革命大大改变了社会阶层的划分状况、劳动的性质以及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比例，大大突破了大批人类群体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旧框框。

反对把“新的政治思维”这一概念延伸“过广”的人，往往说什么这样做会使这一概念的范畴定义淡化以至丧失。他们断言，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政治思维”仅仅成了当前

阶段创造性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同义语。这种断言不能令人信服。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两个概念有交叉。但是二者有质的不同。一方面，新的政治思维在含义上远比当前阶段创造性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要广。须知，这一思维要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因素，必须在许多重要参数上不仅变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变成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些主要思想体系或准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思维就其含义来说又比当前阶段创造性发展的马列主义要窄，因为它只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直接面向社会发展问题的那一部分。

二

现在，我们试图根据以上观点考察一下近来提到工人运动各派面前的几个尖锐问题。

不能以“不许革命”来保持国际关系稳定

第一个问题，即上面已经提到的问题，是从以下二者的矛盾而又辩证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一方面，客观上需要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社会状况又很容易发生变动。对于生活本身提出的这一矛盾，我们常常看到两种截然对立的医治它的所谓处方。第一种处方，即保守的处方，主张强迫各国人民接受社会现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主张采用这种办法的人认为，要保持世界稳定，就得要求国际社会的成员承担义务“不发生”革命，并建立一些机构（类似上一世纪的神圣同盟），一看见有人要变革过时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之更能适应生产力和社会进步已达到的发展水平，就动用这些机构加以制止。这种稳定国际局

势的处方，弊端不仅在于其指导思想上不愿尊重公认的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如历史上所积累的全部经验所证明的，它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干预别国内政以保持社会现状，势必导致破坏国际局势的稳定本身，而这在理论上本来是要加以防范的。

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也不可不考虑外部因素

另一种办法可以冠之以一个“左”字。它在解决国内社会问题时不考虑外部因素。它没有考虑到，这样轻率地对待问题不仅可能给外来的干预开辟道路，而且可能引发国际冲突，产生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可是在许多情况下，事态的这种发展却被视为合乎理想（按照“唯恐天下不乱”这一臭名昭著的原则）。

要想真正解决矛盾而又不走上上述两种极端，既保证稳定的国际关系，又保证社会变革平稳进行，那么可以想见，就要求尽力实行两类根本性的变革。

应建立严禁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机制

第一类变革涉及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这种体系结构应当拥有一种机制来保证自己能适应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动。按法律形成并拥有一批监督机构的国际协定可以成为上述机制的一部分。这种国际协定要规定严禁对别国内政进行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严禁人为地破坏别国国内局势的稳定，如挑唆斗争双方，给他们提供经援和军援，建立旨在参加别国内部斗争的军队。根据这样的协议，某个国家经过内部力量的斗争而发生的变革，包括对外政策方针的改变，都应当无条件地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承认和尊重，而不管它们喜欢不喜欢。在对某些事态进行解释时，因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种种矛盾或分歧，应当由负责解决对

外政策冲突的国际组织受理和调节。

显然，如果这一整套措施充分发挥作用，一些国家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对国际局势的稳定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就会大大削弱。

各国进行社会变革最好采用和平、民主的手段

第二类变革同各国国内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性质以及采用的方式有关。这类变革涉及的范围很广，从在现行法制范围内进行的稍微激进一些的改革，直到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彻底的阶级对抗。当然，社会改革选择什么方法，是有关国家人民自己的事。这种选择取决于在某一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所有主客观因素。然而，不能忽视一个已经很明显的规律，那就是：社会改革采取最激烈的形式，采取暴力形式，最容易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最容易引起外来势力的干涉。它们容易使外国公众分不清是非，给右翼扩张势力进行干预额外提供一些论据，就好象给这些势力对有关国家内政的干涉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在解决社会改革最好采用什么方法和形式的问题时，最要紧的是，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最好还是采用和平的、民主的手段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愈是迫切需要防止毁灭一切的军事冲突，就愈是需要在选择进行社会改革的方法和手段时考虑外部因素。

这一切并不是抽象理论推断的结果。只要想一想如下一点就够了：实际上，现在可以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在发生地区冲突的主要地区，人们都倾向于民族和解。这种趋势表明人们已认识到，采取最激烈的形式，如内战形式进行的国内斗争，一旦把外部势力卷入冲突，就会造成混乱局势。要摆脱它，只有把斗争转到另一领域，转到政治对抗领域。自然，这一点不是每次都能做到。但新的政治思维的使命正是在

于给用政治办法解决社会冲突的趋势增加一股推力和刺激。

三

根据新的政治思维来分析目前的国际形势必然会得出结论：在社会组织类型以及在其他许多重要参数上各不相同的所有国家，今后非常可能在长期共存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决定这种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的方向和强弱以及对这种发展的前景有客观的认识。这种认识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既要根据这些趋势衡量自己的政治方针，也要根据这些趋势衡量自己为当前目的、中期目的和最终目的开展斗争的方法。

工人运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政治斗争

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这些趋势的现状怎样呢？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情况。资本主义经营体制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必须适应工艺革命造成的新的条件。这一不寻常的过程在时间上大概会拖得很长，而且将在社会经济方面付出很大代价（代价究竟有多大，很难说得准）。甚至不能排除有发生社会政治大动荡的可能。不过目前有一点应当肯定：只要适应了工艺革命初期阶段的新条件，资本主义就能获得新的潜力，利用它来保持局势的稳定。这就是说，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工人运动将在保持社会主义方针的同时，在目前的现实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现代资本主义有两种发展模式

根据过去经验过的材料，我们可以指出有两种根本不同

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种是保守主义专家治国模式。它的原则是，力求以那些本来已经在社会地位上受到损害的劳动居民作牺牲品，确保把资本主义转到新的工艺基础和技术基础上去。因此，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由社会精英实行统治，以经济的绝对命令代替社会性的绝对命令，为社会不平等辩护，主张尽量限制人们通过民主方式表达意志，不相信能按合理的原则组织社会关系。这种模式的致命弱点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用反人道的方法强行把经济转上新工艺基础，有可能遭到群众的社会性政治性反抗。

第二种模式可以叫做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模式。它的特点是，主张在保持并扩大劳动群众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的条件下从工艺上重新修饰资本主义。实行这种模式有可能由于破坏了存在多年的结构而产生一些消极现象。但是，预计可以大大减轻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办法就是使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所创制的社会缓冲器得到完善。这种模式不要求消除现存的社会不平等，但也不主张使它发展得更厉害。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民主制度预计不会取消，反而会进一步完善，以便推动居民参与经济现代化的过程。这种模式的主要弱点是，没有充分估计到资本发挥作用的规律——资本着眼于经济上的最后结果，而不从道义上考虑问题，不从社会保障和政治上看合理不合理。

当然，上述两种模式纯粹只在理论上存在。只要把它们付诸实现，马上就会同实际的社会状况发生矛盾。结果，无论第一种模式还是第二种模式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使僵硬的保守主义专家治国政策变得灵活些，而去使用只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方针才使用的方法。在第二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政策获得了许多新

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保守主义专家治国论的观念去选择社会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的方式。结果产生了许多种政策方案，即把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一种以保守主义专家治国方针为主，另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方针为主）的成分按不同比例组合起来的多种方案。

不同的政党对这些方案采取什么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每个政党在传统的党派政治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持中派立场和中右立场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保守主义专家治国论方针温和方案的奉行者。赞成用最僵硬的方案推行这一方针的人集中在右翼。持中左立场和温和立场的左派力量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发展方案，则或多或少掺杂着一些本质上属于保守主义专家治国论的成分。

工人运动应阻止保守主义专家治国模式，争取强化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模式

毋庸置疑，工人运动，包括它的革命的一翼，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哪一种方案取得最后胜利并成为将要实行的方针的基础，决不是无所谓的。他们将要作出的选择只能有一种含义：大力阻止保守主义专家治国模式以其最僵硬的形式得到实现，争取在这种模式中强化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成分，以便最终做到将要实行的政策能最充分地反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方案的原则。

说到这里，很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对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模式的偏爱会不会导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方针的削弱，导致以另一个目标，甚至相反的目标代替原有的目标呢？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不止一次产生过类似的怀疑。当工人运动面临使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一任务的时候（例如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过程中），当工人运动在法西斯主义

威胁面前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今天工人运动在保障人类生存方面应起重大作用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时候，都产生过上述怀疑。但是经验证明，解决社会发展进程所提出的当前任务不仅不妨碍走向最终目的，相反还会为走向最终目的扫清道路。这种情况也完全适用于上面分析的问题。

仔细研究一下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模式，势必还会产生一个问题：这种模式是否能同资本发生作用的规律相容呢？彻底实现作为这一模式的基础的社会性绝对命令，会导致大大限制资本的行动自由，这马上就会引起资本的反抗。而经验表明，反抗采取最“缓和”的形式就是停止私人投资，大量提取存款，资金大量流失。换句话说，在实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政策时，要注意到局势的发展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退而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如法国左翼政府时期曾有过的的那样）；一种结果是超出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模式的范围，采取一些部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不管怎样，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能灵活到什么程度，显然不仅取决于它们向右演进的可能性，在某种情况下也取决于它们向左演进的可能性。

当前民主抉择对工人运动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

以上所述对于确定民主抉择的内容的基本参数至关重要，而今天解决民主抉择的问题对于工人运动各派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这种抉择的一些重要成分就包含在许多工人政党（既有共产党，也有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探讨中和政治文件中。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制定得全面、周到而又言之凿凿、切实可行的纲领。众所公认，这正是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工人运动和整个左派阵营所以软弱

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民主抉择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呢？主观因素在这方面起了决定作用。但复杂的客观环境显然也有决定意义。这种环境对保守势力极为有利。过去那种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曾经风行一时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政策方案，已经名誉扫地了。因此，它的反对者在针锋相对地提出那些旧的而且是措辞更加僵硬的口号时，只要简单地说它不足取就可以了。左派势力处境艰难。他们必须重新认识变化了的局势，分析过去的改良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制定出一种不是抄袭旧模式，但同时又要保持旧模式所固有的优点的新模式。

工人运动遇到了很大困难。它的一项重大任务是维护那些经济上受到损害、社会地位遭到歧视的社会阶层的利益。由于把生产转到新的基础上（这是根据工艺革命的需要而由统治阶级中的保守派实现的）具有对过去作出的让步进行“阶级报复”的性质，由于这一转移变成了大批本来就受损害最大的居民阶层的社会经济损失，工人运动自然采取了守势。它所作的各种形式的反抗没能防范深刻的工艺改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虽然大大减轻了它们的危害。同时，采取守势的方针似乎还耽误了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必须率先去推动客观上业已成熟的工艺改革和技术改革，充分利用这些改革所创造的客观条件，设法使这些条件成为全社会即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同等享用的财富。

现在，根据我们的判断，落后现象正在得到克服。我们有充分根据说，现在已经看到了实现一种民主抉择某种基本轮廓。而这种民主抉择最终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工人运动以至所有左派势力的共同纲领。

在经济领域，要尽量限制工艺革命带来的混乱状态

我们试着揭示一下上述轮廓的情况。在经济领域，民主抉择纲领的主要目的是要尽量限制工艺改革的混乱状态（它是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物）。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这类混乱状态给世界经济联系、国际货币关系以及整个就业领域带来极其有害的后果。

新工艺制难以广泛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活动集约化程度不高。靠增加私人投资使它活跃起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并极度扩大公共基金，靠它对那些工艺上领先的行业和生产部门进行投资。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劳动力培训问题。新工艺对培训工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新型劳动力不足现已成为实行工艺改造的障碍。靠私人拨款实际上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培训符合工艺革命需要的劳动力方面，必须大力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民主抉择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制定规划，从根本上加强对几大类劳动者给予社会保障的制度。这里要解决好这一制度的两大问题。一是要有拥有各种补助金和医疗保证金等等的社会基础设施；再就是要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各种就业保障。落实就业保障特别重要，因为工艺革命必然会把劳动力既从物质生产部门、又从非物质生产部门排挤出去。由于这一过程不可逆转，要把就业保障落到实处，势必要求开拓一些全面性的、由社会出资兴办的就业门路。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都会问：办这么大的事情，钱从哪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注意如下一点：采用新工艺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否则资本就不会去孜孜以求了。但是既然如此，采用新工艺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就不应该只由某个

具体的资本家支配，而还应该由能够把它用于长期目的的社会来支配。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税制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另外，还有一种至今尚未动用过的财源，那就是已经失去任何意义的巨额军费。

由于属于新型劳动力（即教育程度比过去高得多）的劳动者种类在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如何满足愈来愈多的居民阶层的智力需要便成了一个异常迫切的问题。人们愈来愈需要新的大众文化，但这不是有些人常常理解的与“高等文化”相对立的那个术语“次等文化”，而是广大居民阶层可以掌握的高级文化。自然，在民主抉择的规划中，这些问题正愈益受到重视。这种规划的精神文化内容现在成了把（至少应该把）这种规划同保守主义专家治国论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实用主义观念明显区别开来的分水岭。

在政治领域，要争取社会自治，直接民主

在政治方面，抉择的核心内容就是力求做到不只是一般地防止民主制度被逐步取消的危险（这一点确实极为重要），而且要促使政治制度比过去更能适应群众提高了的智力水平和社会积极性。

因此，社会公众对自治问题的方方面面那么感兴趣恐怕不能认为是偶然的。代议制民主条件下所作的管理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决定，注定公民只能象征性地表示表示意见，接着再选举选举代表，但新一代人，即需要在劳动过程中有更高积极性和自主精神的这一代人，是不会甘心消极被动地听任那些决定支配的。虽然社会自治的各种方案，包括直接民主制在内，还没有得到普遍支持，但这些方案想必应该被看作民主抉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在哪里，它们都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四

发展中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

非社会主义世界中不属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那一部分则是另一种情况。在形容这部分地区的特点时，我们曾一度广泛使用过一个叫法，即“第三世界”国家，后来又称它们为“发展中国家”。说法变了，但看法实质上是一样的。说它们不属于社会主义体系也好，说它们不属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也好，都是用老眼光看问题，把它们看作是一样的。

实际上，这种看法可以绝对地说早就过时了。在“发展中地区”现在已有几类不同的国家，它们不仅在社会关系的成熟程度上不同，而且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各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在较发达国家，要改善出卖劳动力条件，使政治结构从根本上民主化

这一地区的一端是一批资本主义只具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些地方资本主义也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它们跟“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组织 and 政治组织都有许多自己的特点。这是由于受了一些世界资本主义中枢使它们发生变异的影响，还由于阶级对抗程度不高以及由于现在还保持着一些特殊的传统结构和政治特色。

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以至一般民主运动所面临的任務就是，设法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逐步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在这同时，把主要力量用于使政治结构从根本上民主化。在这方面如要达到“旧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那就不仅要在现有条件下迈出一大步，而且要为工

人阶级今后的斗争扫清基地。

在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这一方针的扩展范围是有限的

这一地区的另一端是一些实行社会主义方针的国家。它们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渴求克服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落后状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问题在于经济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实现这一愿望（从社会保障和人道的观点看，这种愿望是十分自然的）。在社会发展中跳过一些受自然条件制约的阶段，作为例外当然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有特别有利的条件，或者有外部给予的大量经济援助。因此，社会主义方针的扩展范围很可能将是有限的。这一类国家革命力量的主要任务只能是创造条件以防止倒退，并使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显示所选定的道路的优越性。

在大多数贫困动荡的国家，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努力

上述地区的国家大多还经历着社会经济方面差距拉大的复杂过程。它们当中的大部分走上了“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还没有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结果，经济社会形势极其严重，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政治局势，使它变得很不稳定。因此，非常可能由于方针急剧改变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动荡，提出的口号不能反映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人们还会作一些利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的尝试。

从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看，情况不妙。它们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拉大，表现之一就是外债猛增，这反过来又使差距进一步拉大。有些国家灾难重重：饥荒流行，居民的贫困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另一些国家的情况也同样在急转直下。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形势，我们如果不是看到消极情绪在增长（搀和着绝望感），就是看到社会上的不满愈来愈厉

害。由于这一地区居民群众觉悟不高，这种社会性的不满往往表现为宗教狂热、民族和种族上的狭隘性和排他性。显然，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由群众不满情绪积累而成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就会超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范围而变成全局性的问题。

这种情况只有依靠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才能防止。这里可以从缔结条约入手，明文规定注销积下的债务，至少要暂停偿付长期债务。下一步可以为一些粮食援助、医疗救济以及内容近似的宏大计划提供紧急资助。然后还必须着手建立（用不很确切的说法）今天所谓的“新经济秩序”，也就是创造一些条件，使“发展中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能逐步克服工业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落后状态——主要靠采用弗·伊·列宁当初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那样的方法。

经验表明，反对这样做的，是最发达最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中那些最有影响的派别。反之，积极的支持来自左面。看来，今后的情况还会是这样。由于人类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比较安康，一部分多灾多难，似乎有必要制定一项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民主选择的纲领，以期防止危及人类的灾难。

五

世界社会和政治力量格局依问题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组合

如果从新的政治思维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格局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工人运动在其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在当前形势下它所面临的任务有什么特点呢？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探索。不过今天还

是可以谈一点看法。

长期以来，我们在考察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格局时，总是把它看作只有一种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在每一具体场合，它都可能有不同的情况，这取决于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因此，在分析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格局时，必须区别对待，特别是在今天，因为今天迫切需要同时解决许多不仅彼此不同，并且处于一种相互对立而又辩证的关系之中的问题。

如果我们迫切需要使人类免除自我毁灭的威胁，那么力量的格局是这样：一方面是工人运动，同它接近的社会流派，左翼政治势力，再加上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中派势力和温和派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中最好战的派别（主要都同军火生产有关），极右的政治势力。在研究如何防止生态灾难问题的时候，相互对抗力量的构成情况便稍有不同。要知道，一旦要具体（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生态问题，就会触及工业资本中相当广泛的阶层的利益。除此之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如很大一部分劳动居民担心，要是过分强调解决这类问题，许多传统的工业生产部门——因而也包括工作场所——还要不要都成了问题。

如果是解决选择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格局又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种场合，阵营的划分主要还是沿用阶级标准：一端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接近工人阶级的劳动者集团的那些政党，另一端是反映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益的政治势力。在选举问题上，这种对立今天不象以前表现得那样鲜明，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转折阶段，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情况下，群众在社会地位上自我

认同的过程通常都落后于实际发展进程。

人们有时断言，由于任务（例如上面所说的任务）的性质不同，负有保证完成这些任务使命的力量实际上不可能团结起来。这种断言只在下述情况下有道理，即这些任务是彼此对立的，或者是互相排斥的（二者差不多是一回事）。如果问题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解决而不能认为是互相排斥的，那么每一具体场合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在格局上各不相同的问题自有解决的办法。办法就是明确规定共同利益的界限和统一行动的实际范围。

基本力量组合是民主力量对右翼力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围绕完成不同层次上的任务而出现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格局加以排比，我们就会看到一种相当明确而稳定的力量组合：民主力量即左派力量加上一部分中间派，跟右翼和极右翼集团对阵。后者包括的力量可多可少，视每个国家的特点和斗争目标的情况而定。换句话说，民主力量，包括它的核心即工人运动在内，不管要完成什么任务，它们的主要敌人原则上始终是同一个。在同这一敌人进行斗争时，所有使民主力量不和的矛盾都退到了（至少应当退到）次要地位。

在反对右翼这同一敌人时，工人运动各派之间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

这种情况首先适用于工人运动各派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行动统一问题，马列主义科学原则上早就作了肯定的解答。现在还可以加上一些新的论据来说明统一行动的必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现实生活本身已经把当初曾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各种流派分道扬镳的许多分歧勾销了。由于当前阶段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内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维护雇佣劳动者利

益的问题已被提上工人运动的日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自提出的具体要求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实行的改革，帮助冲淡了一些反共的偏见，这些偏见曾蜕化了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过去一直敌视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正在逐步改变，这一过程已在一些共产党内牢牢扎根。

自然，工人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仍然存在。但是在重点转移的情况下，逐渐摆到首位上来的已经不是使人们分离的东西，而是使人们团结的东西；实际任务上的一致，共同受到的来自右翼势力的威胁，从开创工人运动的优秀启蒙运动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伟大思想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共同的价值观体系。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大流派已日益接近

实际情况现在是这样：从改善社会民主党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入手，工人运动的两大流派已经接近起来了。这方面的情况进展如何，从1987年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节日期间11月4—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非正式会见的结果可以看出来。许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高级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见，可以认为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有一些规模稍小但意义重大的事件也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证明，其中有：1987年11月6日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同一些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和社会党代表团的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接触——1987年秋两党接触结束时签署了一项文件，其中探讨了普遍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以及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之间进行的高水平的合作。

诚然，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运动各派之间的接近还不那

么明显。国内状况的特点所造成的许多情况（如争着要对广大群众施加影响以及其他一些次生情况）显然起了阻碍作用。虽然如此，在这方面也还是清除了许多障碍。

自然，民主力量的统一问题正在超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范围，何况他们双方今天都碰到了新的困难。新的社会力量正把新的民主运动和新的民主党派领上社会舞台（包括政治舞台），让它们在本国生活中，首先是在反击右派的进攻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统一问题受到重视，是因为正是在这方面近来有了重大进展。



以上所述再一次着重说明，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今天所作的理论探索，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探索的使命就是：认清当前局势的实质，对正在发生的过程的趋势和深度作出估计，制定相应的方针，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面临的新问题探索解决的办法。

（原文载于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88年第5期，张慕良译）

国际关系中的民族利益、 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

埃·波兹德尼亚科夫

国家的对内职能受制于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对外职能则取决于国家所不能支配的国际关系体制如何运行和发展。把国际关系纳入阶级斗争领域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规律搬到国际关系中去，把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弊病很大，在核时代更是危险的。这样做会造成：认为革命输出和反革命输出合理，也可以用战争手段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矛盾，增进国家之间的敌意，等等。在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只能牺牲前者。应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尽量寻求各国利益中的共同点。

苏联正在进行的改革，包括社会意识领域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创造性地发展马克

* 本文作者埃利吉兹·阿布杜洛维奇·波兹德尼亚科夫是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原注

思列宁主义，而且，也许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挣脱原有的老框框，抛弃凝固的教条主义的刻板公式，从背熟了的论点以及常用的引文的堆砌中解放出来。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切已经成了他们观察现实惯用而又方便的手段，因为这样就无需不断深入地去了解风云变幻的世界。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教条主义和正统思想仍然盛行

今天，重新认识国内社会经济关系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当迅速，而且相当大胆。但是，这一过程几乎没有涉及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首先使人感到的是缺乏理论。这不是指那种“萎靡不振的理论总想如何更巧妙地服务于实践”^①，而是指关于当今世界严谨的和成熟的构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和对事态的深刻理解为基础的构想。苏联的外交提出了有深远意义和带根本性的建议，并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从而明显地在改变沿袭了几十年的旧观念，与此同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眼下却仍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教条主义和正统思想这些谁也不许惊扰的“圣牛”仍悠然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息。

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国与国间的相互作用使各国对外政治利益产生某种共同性

我们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本身认识到，对待经济规律也和对待譬如物理学规律一样，是不容许随意胡来的。向我们说明前一点的，是我国经济的停滞现象；说明后一点的，则是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国际关系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特别是在当今时代，其潜藏的危险要比一个

^①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1987年5月3日在苏联外交部会议上的报告（本书第32页）。——编者

核反应堆的事故大得多。这里也和经济领域一样，光靠号召、抽象的公式和头头是道的论点，是绝对行不通的。要知道，这里说的是国与国相互作用这一自我调节的体系，其特点是互相依存的程度很高，也就是说，在这方面没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孤立的现象或过程。每一种现象或过程都这样或那样地涉及整个关系体系，并且会给这个体系本身以及各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后果。而各国在自己的活动中所遵循的，是由许多不同的内外情况所决定的利益。每个国家的内外情况有多大差别，它们的利益就有多大差别，而且这些利益往往可能是对立的、对抗性的。同时，各国又生活在对它们来说是同一的关系体系之中，并在其中进行活动。各国在这一体系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必然产生某些对各国都相同的目标和任务，使各国的对外政治利益具有或多或少的共同性，从而迫使各国——不管愿意不愿意——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维持和保障和平与安全的各种问题上，共同采取行动。没有这种利益的共同性，国与国的关系就会象“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没有这种共同性，各国就不可能合作，和平共处的原则就不可能实现。

全部问题在于要掌握民族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度

当今这种共同性的客观基础在扩大，但这并不贬低各国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意义，因而也不会消除这些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只要有不同国家存在，就会有它们的特殊利益存在，也就会有这些利益之间以及它们的民族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抗争。全部问题在于度。过去，各国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为了保障纯属自己民族的利益，而往往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相抵触。如果因此而发生了战争，那么，这些战争尽管其规模和破坏性极大，也没有给整个人类造成毁灭的威胁。今

天，抗争的各方都有了核武器，一旦使用就能消灭一切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只捍卫自身的利益，而忽视国际关系体系中一切现象和过程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那就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使世界面临毁灭的危险。

新的形势要求有新的政治思维逻辑，要求各个国家，尤其是对世界命运负有首要责任的国家，在对外政治活动中必须有新的内容和形式。

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产生了一项任务，即必须更深入地研究下列关键性的概念：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同阶级利益的相互关系，民族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相互联系。

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不能等同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这一概念就其使用时的含义来说，往往同“国家利益”的概念相吻合，因而通常被当作后者的同义语。同时，在书刊和报纸上也可以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分家”，甚至相互对立。谁都知道，例如在报纸的分析中常有这样的说法：“某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符合它的民族利益。”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民族利益”这一概念形成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国家利益的同义语，另一种解释为不仅不同于国家利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之相矛盾的民族利益。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正确呢？我想，对此不能作一概而论的回答。两种解释都对，而且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要考察的国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情况（国内的和国外的），而这些情况是判断两种利益是吻合还

是矛盾的依据。应当强调的是另一点。两种利益在实践中可能吻合，决不等于两者等同，因为在任何条件下这两种利益都是有差别的，正如“民族”概念和“国家”概念有差别一样。尽管“民族”概念在政治著作中被当作国家的同义词来使用，与“民族利益”概念被当作国家利益的同义语来使用同样常见，但决不能由此得出两者等同的结论。

对“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概念作区别，主要是在如下场合：用前一概念，是想表达该民族构成由统一的政府管理的政治肌体这层意思，用后一概念，则是想强调一国的居民内部的统一、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特性的一致。但就是这样的区别，也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贯彻到底的，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甚至在专门的著作中也是如此^①。

在涉及国家对外关系的事情上，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等同起来的现象特别明显：国家意图往往采取民族意图的形式，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也正是这样加以说明的。这首先是指所谓民族国家，即全部或多数居民属于同一民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政治目标和利益，同民族的相应目标和利益往往相当吻合，以致要很费心思才能加以区分。

不能以民族利益掩盖国家扩大统治范围的企图

严格说来，对外政治利益和动机无疑带有国家的性质，而不是民族的性质。但是，在政治书刊和报纸上却不准确地称之为民族利益（有时是特意这样说，有时是因为说惯了，成了一句套话）。在理论研究中则显然必须严格区分民

^① 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对黑格尔提出的指责之一，就是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把作为人民的存在形式，作为总和的整体的国家和政治国家混为一谈。——原注（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2页。——译者）

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凡是遇到两者可能吻合的特殊情况，都必须作附带说明。这两种利益当然可能互相补充和互相增进，但也可能背道而驰。混淆这两个概念，尤其是故意把两者等同起来，会导致对两者都作出与实际不符的评价。譬如说，某个国家力图实现经济的或政治的扩张，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希望把住在别国领土上的同族的居民集团纳入自己的版图，过去往往把这叫做要求合并和统一等等的“民族倾向”、“民族意图”，今天也有人继续这样说。其实，在这种场合通常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这个国家在不会过时的民族口号掩盖下力图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或经济地区。

国家对外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民族的共同利益

但是，尽管对外政策是由国家来实施的，对外政策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民族的共同利益，首先是涉及安全、领土完整和主权这些问题的民族利益，不能不反映由此产生的普遍情绪，以及关于本国在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通常也是按各国全体居民，即使不是全体至少也是多数居民的民族标志来划分的，而不管其国内社会阶层划分情况如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陈腐观念。民族（人民）这个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是任何国家政权在确定和进行外交活动时所依靠的基础。这些决策和行动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符合，哪怕是在表面上符合该民族的认识、意向、信仰和价值观，换句话说，必须符合该民族的世界观的旧规范。

民族和国家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两者的相互关系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是有变化的。譬如说，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相吻合，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两者会永远吻合。

国家和市民社会

过去我们一直把民族利益看作某种统一的东西，看作国家政权在对外政策中预计可以依靠的全民族的利益。国家表面上是以“全民族”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但是，说国家的外交活动就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这种看法在原则上是否正确呢？实际上是否存在统一的民族利益，即全民族的利益呢？**在对内对外问题上，真正发生相互作用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

就一个民族与外部世界相对而言，还可以说，民族是作为某种统一体、作为一个共同体而存在的，但就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这样的统一体。民族按照许多标志——阶级、政治、经济、思想、族裔、宗教、职业等等标志，分为不同的群体。与此相应就有不同的利益，有的互相抵触、对立和抗争，有的彼此吻合。因此，同这些纷繁复杂的不同利益相适应的概念，与其说是“民族”，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在对内和对外的各种问题上，真正发生相互作用的也不是国家与民族，而是国家与市民社会^①。国家不仅包含民族，而

^①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中的基本概念之一。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很不应该地将它遗忘了，或者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的概念。然而“市民社会”是一个比生产关系更广泛、内涵更丰富的概念：它包括政治国家范围之外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如经济的、民族的、宗教的、精神道德的、家庭的、文化的关系等等，并且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我们满意地指出，这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公民权”。说到这里，应该提到阿·米格拉尼扬写的一篇深刻而有趣味的文章，该文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的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相互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化问题》，载于1987年《哲学问题》杂志第8期。——原注

且还包含许多其他的集体；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民族感情，而且还存在各种其他的感情，那些感情有时甚至能达到十分强烈的程度（如阶级感情）。

与当代世界发展相联系的是社会概念而非民族概念

今天，有关当前和未来世界发展的许多现实情况，正是同市民社会（或简称社会）这个概念有联系，而不是同民族这个概念有联系。社会环境、社会问题、社会舆论、社会弊病、社会利益等等，——所有这些概念以及其他许多概念，充分反映出以各种社会过程为基础的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

社会因素越来越成为在人民和民族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所有的活动领域，打破民族的壁垒和民族的局限性。

需要研究社会利益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

民主化过程越深入地遍及社会因素，这种因素的范围及其在某一民族生活中的作用就越大。因此，要做到在科学上更严格和更客观，需要研究的不是民族和国家（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而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①。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其中政治国家是形式，市民社会是内容^②。国家作为形式是共同性的表现，相反，市民社会却是差别性的表现。

^① “民族利益”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习惯语，并且牢固地进入了政治词汇和政治著作，所以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一概念，但这指的是与政治国家的利益相对的某一社会的利益。如果这个概念确实是反映某个民族的利益，对此我们将作专门的说明。——原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430页，第21卷第247、345页。——译者

国家的目的是普遍的利益，而“没有这一目的，国家就不是现实的国家”^①。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因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特点是或明或暗的“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②，但这是在两者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范围内的冲突和分裂。统一体双方紧密交织在一起，就可以变成某一时期的政治共同体^③，在这个共同体中，“国家的”和“社会的”就没有区别了。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并依靠国家得到自由发展

根据这些原理首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研究国家及其利益（不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而不联系社会及其利益，与之相脱离，或者，研究市民社会及其利益而不联系国家，从根本上来说，也和把两者等同起来一样，都是错误的。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忽视市民社会是任何国家的基础，就必然会成为关于国家形式而不是关于国家实质的科学。从另一方面说，关于社会的科学，如果忽视国家，也必然会脱离真正的现实，因为社会，至少是当代社会，是在国家、国家结构、国家法律、国家管理的范围内生活和发展的。再说，国家本身按照卡·马克思的定义，也就是社会结构。^④

国家作为形式必须符合市民社会的内部需要，而且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0、263页。——译者

② 同上，第479页和第429页。——译者

③ 同上，第439页。——译者

④ 卡·马克思写道：“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页。——译者）

在符合这些需要时才与市民社会相适应。没有国家，市民社会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力量得到自由的发展；但是，没有在国家保护下自由发展的社会，国家也会逐渐衰败，失去自己真正的意义和功能。^①

市民社会本身赖以生存的并不是共同利益，而是各种不同的、往往互相对立的利益。而这正是社会生活的特点，因为社会生活已有的任何一个历史特点都不是一种利益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相互作用和斗争的产物。但是，在利益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当然还存在着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因为共同的生活和活动不能没有一定的秩序。作为社会结构形式的国家就体现了这种共同性，于是它就承担起使不同社会力量及其利益之间实行妥协的一种特殊职能。^②

譬如，卡·马克思就说过，任何剥削者国家的活动都“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③。弗·恩格斯也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

^① 伊·康德就谈到过这一点，他写道：“……对公民自由……稍微严重的破坏，不能不损害所有的经济部门，特别是商业，因而不能不削弱国家在其对外事务中的力量……如果妨碍公民用他所选择的、同他人自由并不相悖的办法为自己造福，那就会使整个生产失去生命力，从而还会减弱整体的力量。”（《康德文集》1966年莫斯科版，第6卷第19—20页）弗·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施米特的那封著名的信，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作用作了充分的说明。——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6—491页。——译者）

^② 国家作为共同性的体现者的职能是同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作用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可是，在我们的著作中往往忽略了这种结合，因此共同性这个属性要么完全消失，要么只是在论及社会主义国家时才予以保留。

——原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译者

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①
市民社会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

可见，市民社会和国家处于不断的、充满矛盾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状态中，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及其各种设施的发育程度，取决于它们监督政权行动的能力。这个方面特别重要，要知道，国家的本性就在于：国家对市民社会来说是一种权力，是外在必然性，因而也是一种暴力工具。所谓外在必然性，只能具有卡·马克思所指出的含义，即：当社会的“法规”和“利益”同国家的“法律”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必须向后者让步；前者是从属于国家的；国家的意志和法律对社会的“意志”和“法规”来说是一种必然性。^②

市民社会发育不足可能造成国家包揽社会职能；在社会发展特别紧张的时期，这种包揽具有持续性

在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时候，国家能够篡夺它的权利和特权，由此可能发生“国家职能和市民社会职能的倒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仅仅执行自己的职能，而且把社会的职能也揽到自己身上，代替社会确定社会的任务，并且要求社会唯命是从地贯彻自己的决定，认为这种决定就是最准确地反映了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③无论是对内政策的决定，还是对外政策的决定，都是如此。诸如此类的倒错是有其多种原因的。这里不一一涉及，只指一个一般的原因：这种倒错往往发生在特别紧张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而一经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7页。——译者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7—248页。——译者

③ 详见1987年《哲学问题》杂志第8期第79页。——原注

生，形式（即国家政权）的独立运动就会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持续性。卡·马克思写道：“当政治生活特别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力量时，它就竭力压制它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因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真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宣布革命是不停顿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象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戏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一切因素的恢复而告终。”^①这个思想自然是从如下愿望得出来的：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前提，因而它本身不可能不使自己的形式——国家或早或迟地与自己相适应。实践一直在证实这一真理。

国家既体现民族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又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

总之，国家作为形式，作为社会结构，作为共同性的体现，因而也代表着整个市民社会一定的共同利益。这个结论对于分析所谓“民族利益”的性质以及它同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个结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著名原理丝毫不矛盾，这个原理就是：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组织，是统治阶级手中用来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具”。这样的结论也不违背如下的观点：民族利益也就是统治阶级利益，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标榜为全民族的利益，不管国家就其阶级性质来说如何，它始终不变地保留着保障一定的共同利益即“民族”利益的职能。弗·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民族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共同的利益”^②。

因此，任何国家既体现共同利益（民族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又体现特殊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0—431页。——译者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8页。——译者

时期，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和孰轻孰重的情况是有差别的。要弄清这种相互关系，就必须分别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国家的双重身份

国家职能有对内对外之分

迄今为止，我们研究的主要是同“自己的”市民社会相对的国家，或者，换句话说，是“面向内的”国家。但是，国家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的活动，即同外部世界、同其他国家的联系这个方面的活动。国家就象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①，同时注视着不同的方向，执行着两种虽然互相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职能——对内的和对外的职能^②。这些差别也不能不反映在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上，这要看国家是“面向内”还是“面向外”。

国家的这两副“面孔”的差别，毫无疑问首先是由国家在每一场合遇到的不同环境所决定的。在一种场合遇到的是国与国关系的体系；在另一种场合遇到的是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即市民社会）。尽管在两种场合进行活动的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国家活动所处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差别，给国家的两种职能都打上了抹不掉的印记，以致有时会造成一种印象，在不同场合进行活动的似乎是不同的国家。

①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他有前后两副面孔。——译者

② 关于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治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别，请见埃·波兹德尼亚科夫《对外政治活动和国际关系》一书，1986年莫斯科版第1章。

——原注

国家对内职能直接受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支配

国家的对内政治职能的内容主要决定于统治阶级的如下意图：巩固自己的政权，利用政权为自己谋利益，保持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会关系，为此利用国家机关。统治阶级——如果说的是阶级对抗的社会——在这里遇到的是这样一些国内的政治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如：国内的反对派、各阶级和党派的争权斗争、各种反政府运动、内部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及失业等等。统治阶级必须同时设法完成二位一体的任务：保障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以及同发展经济、加强国防能力、加强法制、反对犯罪现象、保证公民安全等等有关的全民族利益。

国家的对外职能取决于如何处理不受国家支配的外部因素

对外政治职能的内容则不同。它所注意的对象是族际关系，首先是国与国的关系。国家在这里遇到的是不受它控制和支配的现象和过程，它周围是其他国家，是进行自己的对外政治活动，往往是同它对立的甚至是敌对的国家。在这种场合，问题不在于该国统治阶级如何保住或维护政权，而在于面对现实的或预想的外患，如何保证国家这一联合体本身的完整、独立和安全，如何为发展经济、执行对内政治职能、完成其他各项国内任务，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国家在这里就以全民族的代表、人民主权的体现者、全社会利益的表达者的身份出现。^①促成这一情况的是，民族（或者说，市民社会）自己似乎也以两种身份出现：拿民族

^① 黑格尔说：“只有在人民对外部世界来说完全独立并组成自己的国家这个意义上，才谈得上人民的主权。”——原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1页。——译者）

本身来说，是一种情况；同外部世界相对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况。在前一情况下，民族是分散的整体；在后一情况下，民族就作为统一的整体而行动^①。如果这种同外部世界相对的民族“共同性”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话，那么它的虚幻程度并不比代表普遍性的国家本身更大。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政策及相应的国家利益中的这种普遍性，成了实实在在的普遍性，由此才有所谓的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吻合的现象。情况也确实如此，既然国家在自己内部可以用自己的规章和法律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社会意识变为自己内部的社会力量^②，那么国家在其对外意图方面更可以做到这一点。

国家内部阶级对立的力量往往会做到一致对外

在国家内部，阶级对立的力量尽管在内政问题上保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但当事情涉及对外政策问题时，连这些力量也往往会意见一致或者彼此和解，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在评估某个国家的居民对该国对外政策的态度时，如果只考虑社会阶级划分这个因素，而不同时考虑他们还会受到诸如爱国主义、同本民族的骨肉感情、乡土感情以及国家感情这样一些感情的支配，那就要犯大错误。所谓国家感情，就表现在人们认识到：每个公民的生活和幸福都同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力量和作用、同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息息相关。这些感情在战争或尖锐的国际冲突时期尤为强烈。无论过去或现在，如果忽视这些感情，那么对这种或那种内外形势的估计必然会发生严重错误。这里可以提一件往事。第一次世

① 这个评价当然不适用于民族生活中往往带来民族分裂的危急时期（革命、国内战争等等）。——原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第16卷第217页。——译者

界大战前夕，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物上，人们断定：各大国的无产阶级阶层由于他们所固有的国际主义会成为天然的同盟者；在无产阶级内部不致发生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的反民族主义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可靠堡垒（如卡·考茨基等人）。但是，欧洲国家彼此间的残酷斗争使所有这些幻想彻底破灭了。作教条主义理解和简单化理解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没有平息民族纷争，反而连工人阶级也被卷了进去，而那些昨天还宣布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推波助澜，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民族感情的力量不仅在资产阶级中间，而且也在工人中间显露出来了，今天还在继续显露。

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到，民族感情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各式各样的政治蛊惑者进行投机的对象，是外交事务中方便的手段。在这方面，政治蛊惑的一切手段都可以用上：玩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煽动假爱国主义、沙文主义、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如此等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手段都会发生影响，何况还有民族自我意识这种适宜的土壤。说到这里，还不妨回想一下华盛顿的“格林纳达行动”或伦敦的“福克兰战役”，当时两国的大多数居民，不管是属于哪个阶级的，都对之表示支持。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行动使党派（阶级）利益在共同利益即“民族利益”面前退缩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国家对外行动遭到失败时，国家和市民社会间的冲突会公开化

但是，对上面所说的不应作这样的理解：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外部是永远吻合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场合都代表民族利益。这里也和在国内生活中一样，国家利益和市民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继续存在，尽管存在的形式较为隐蔽。当

国家在其对外政治行动中遭到失败的时候，或者当国家把人民卷入旷日持久、不得人心的战争（如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大量消耗人民的人力和物力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公开化。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社会以不同方式对自己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出现不履行公民义务的行为；失败主义或孤立主义的情绪在居民中滋长蔓延；阶级斗争激化；在非常的情况下，则会造成国内的革命形势。

国与国的关系和阶级斗争

把国与国的关系视为阶级斗争领域是错误的

不管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外部是否吻合，把这两者归结为阶级利益，与阶级利益等同起来，这不仅在方法论上，而且在事情的实质上都是错误的。判定国家（及其利益）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和表现，这种观点即使运用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内部关系也是片面的，如果运用于国家的对外政治活动，运用于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领域，那就会得出错误的判断，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我国学术界有一种早已确定的看法，认为国与国的关系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这种看法就属于错误的判断。关于国与国关系的阶级性质、关于这种关系是阶级斗争（尽管是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的论点得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不加批判地、实质上是机械地把阶级斗争规律从内部社会关系的领域照搬到国与国的关系上去了。

错误有认识论的根源

这种观点的出现并在理论上得到确认，是有其原因的。

我想，这里需要指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所谓认识论的原因，即认识上的原因。原来，在我国社会科学界，由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经院式的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作了种种努力，阶级观点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一种学术上的迷信。对任何社会关系领域，不管它有什么特点，都必须完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把它看作是阶级关系的领域。因此，阶级观点这个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手中曾经用来作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分析的手段，就“顺顺当当地”蜕变为一种盲目的信仰，成为一种“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适用于生活中一切事情的社会理论公式了。

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同曲解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论断有关

第二个原因，在我们看来，也同在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论断有关。这个论断就是：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这里的逻辑很清楚：既然国与国的关系是政治斗争的领域，那么它同时也就是阶级斗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形式逻辑，就意味着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说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在他们使用这一论断的所有场合）国内的政治斗争，因为这个斗争不管在哪个领域内进行，都在不同程度上明显地表现出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由某个阶级来夺取或保住政权。^①

但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出面活动的不是阶级而是国家。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过是国家这个社会设施的一个方面的特征。因此，把国与国的关系看作阶级斗争的领域，说明对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504页；第21卷第247、291、344—346页。——译者

这一对象的想法显然是片面的。这种看法实质上是把这种关系和内部社会关系等同起来，把这个领域的规律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规律。

阶级利益在国与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依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否定国与国的关系是阶级斗争领域这个论点，决不意味着否定阶级利益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在国与国之间当然存在着社会阶级性质的差别，这就决定各国也有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这种阶级利益的地位和作用是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因此，不管情况如何，（先验地）认为这类利益居优先地位，那就错了。的确，在革命变革中出现的、国家历史发展的某些时刻，阶级利益可能在全部对外政治利益的总和中占据突出的地位，仿佛给其余的各种利益和矛盾都涂上自己的色彩，造成可以称之为社会历史背景的形象。通过革命打破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也会触及对外的政治联系，使它也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一来，对外的政治矛盾就有了鲜明的社会阶级性质，转变为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些“转眼间”就反映到思想家们头脑中的观念，即对外政治斗争具有阶级性的观念，成了理论上的论点，由于惰性的关系就继续存在下来，逐渐变成了一种教条。任何教条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领会；容易领会就能广为人知；广为人知又能造成真理性的假象。

和平共处原则和阶级斗争概念互不相容

只要对照一下作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治活动基础的和平共处原则，上述论点的错误就特别明显了。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不侵犯和不损害别国的领土完整，尊重主权和民族独立，巩固睦邻关系，——这一切同马克思主义

所理解的阶级斗争都毫不相干。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的含义，也就是承认各国人民有权在不受任何外来强制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他们要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这也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所能包容的）。

在当代，关于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的论点，其实际含义是承认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不能共处；这个论点蕴含着容许革命“输出”、也容许反革命“输出”的思想；它造成一种危险的错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对外政治手段来解决。认可这类观点，就意味着赞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战争（包括热核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使任何旨在防止战争的活动变得毫无意义，使人们对未来失去任何希望。

我想，这里有两种情况是互相排斥的：要么我们把国与国的关系看作阶级斗争的领域，这样，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就不适用于这个领域；要么相反，我们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是各国相互关系中普遍适用的原则，这样，把国与国的关系看作阶级斗争领域的观点就不能接受。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阶级斗争规律搬到国与国的关系中去

有人会反驳说，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获得真正的和明显的阶级斗争含义，仅仅是在1917年以后的时期，也就是说，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因为它直接碰到的都是阶级性质对立的国家。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论据是经不起批评的。世界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国家之间的斗争，包括不同社会阶级性质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认为国与国的关系是阶级斗争舞台的论点只是对人类历史的最近70年才是正确的，那就是硬要马克思主义去适应习惯的观点和公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国

际关系，始终是从实际情况以及这个领域特有的规律出发的，从来没有想到把根本不同的领域所固有的规律即阶级斗争规律照搬到这个领域中来。例如，我们可以举出弗·恩格斯在1890年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决定当时欧洲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他接着写道：“**前两件事实**（黑体是我用的。——作者）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①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同半封建的君主制的俄国结成了联盟，也无法解释在国际实践中常见的、社会制度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国家彼此结成政治联盟的其他许多事例。在上述例子中，弗·恩格斯的分析依据的是现实情况，是对当时合乎规律地形成的欧洲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格局所作的研究，也就是说，依据的是物质因素，而物质因素自古以来就是各国对外政治行动的基础，并且决定国家联盟的建立或解体。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弗·恩格斯的分析和预见在25年后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在核时代把阶级斗争观点引入国际关系尤其危险

在核前时代，把国际关系看作阶级斗争舞台的观点（尽管也是根本错误的），还不象在目前的火箭核武器时代那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页。——译者

危险。现在人类已面临一种抉择：或者是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和对抗；或者是建设性地寻求互相都能接受的协议。这类观点之所以危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仿佛从来就认定同“帝国主义”的任何协议都是不能接受的，采取教条主义的不妥协态度，坚信唯有自己的观点正确，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的现象及过程的估计上好像是“推定永不会失误”^①。

意识形态斗争同国家利益相抵触时，只能牺牲前者

毫无疑问，阶级利益主要表现在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到目前为止在历史上发生的任何社会斗争，不管是阶级之间、等级之间、党派之间还是国家之间的斗争，始终都是借助意识形态来进行的。但始终又是为了现实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思想和利益可能并不一致。在国与国的关系中，由于其本身的特点，这种不一致与其说是一种例外，不如说是一种通例。但是，正如卡·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应当看到，思想一旦同利益完全相抵触，就一定会使自己更加出丑。因此，只能是要么牺牲思想，要么牺牲利益，别无他法。这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屡见不鲜的抉择。由于国家对外活动的基础毕竟是国家的全部对外政治利益，国家通常正是把这种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谁只要愿意，都能从历史和当代实际中找到足够的例子，可以说明国家的对外政治利益比意识形态的、世界观的利益优先的思想。

把国际关系中阶级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绝对化，无法解释属

^① 叶·普里马科夫《对外政策的新哲学》一文（1987年7月10日《真理报》）。——原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译者

于同一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冲突

说到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国家的同一社会阶级类型及其在国与国关系中的作用问题。除了用“共同的阶级利益”、“阶级一致性”这样一些评语之外，同一社会阶级类型，有时几乎成了试图说明某个国家集团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一致的主要理由。作出这种分析的原因还是在于：把国与国的关系看作阶级斗争的舞台，并且与之相应，把国际关系中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绝对化。于是，在我国的政治著作中，往往把帝国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对抗方面对外政策的一致，以及它们的关系中的向心趋势，主要归因于它们具有同一阶级类型。可是这里忽视了譬如这样一件“小事”：半个世纪之前也存在着同一社会类型，这丝毫未能阻止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交战，也未能阻止正是在帝国主义之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越南，也都是同一阶级类型的国家。但是，这一情况本身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矛盾（甚至还发生过冲突）。

既然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各国真正的利益受到许多具体因素和具体情况总体的制约（从各国的地缘政治位置，一直到业已形成的世界力量平衡体系、与此相应的军事同盟和军事集团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各国在保障集体或个体安全方面的义务），那么，把“同一社会阶级类型”、“阶级一致性”这些概念运用于这个领域，就是知难而退，对国际生活中复杂的现象和过程的真实原因不加说明和研究，而是发表一些极其空泛的庸俗社会学的议论，或者作些平庸的宣传。

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国际关系体制的运行

和发展有关的利益

由于国与国的关系不是阶级斗争的领域，作为阶级利益反映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国与国关系中的作用是有其自己的特点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同国际关系体系这一外部环境的运行和发展有关的利益。而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则是表现在一定的价值观体系中的这种或那种世界观。国与国的关系体系在各种世界性过程的影响下是不断变化的，相比之下，意识形态惰性较大，比较保守。因此，对外政治的“物质”利益总是同意识形态的利益发生矛盾。

使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弊病很大，是最糟糕的唯心主义

意识形态因素对实际政策、对各国对外政治利益相互作用这方面的影响过大，往往歪曲对外政治利益的实际内容，使这种利益变形。所谓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正是由此而来的。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作用发生倒错，就象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中所发生的倒错那样。意识形态的利益似乎变成了目的本身，而“物质的”对外政治利益倒成了上述利益的“仆从”。

这种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往往阻碍国与国之间以现实利益的平衡为基础的正常关系的发展，成为煽起国家之间敌对、怀疑和不信任的原因，造成关于“外敌”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因而妨碍各国人民的接近和相互理解。

捷共领导人之一比拉克正确地强调指出：“把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搬到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搬到关于和平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去，这正是旧政治思维的典型。”^①要对外政

^① B·比拉克《我们共同的欧洲大厦》(1987年《和平与社会主义》杂志第8期第4页)。——原注

策服从于意识形态的要求，这的确是对外政治实践中最糟糕的一种唯心主义。

在国家的国际活动中，对外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不容混淆，更不容等同，这个思想总的说来并不是新的。早在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政治宣言》（1983年）中就已经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的政策中把意识形态问题同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它们把自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上。”^①

这个思想在今天不仅得到了证实，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极其明确地谈到不容许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与国的关系这个领域，不容许使对外政策服从于这种分歧。摒弃原来那种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提法，即把和平共处看作“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提法，这里也正是包含着上述思想。

在所有这些论点中，国与国关系的领域（以及与此相应的和平共处原则）和阶级斗争的领域（以及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界限分明。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等同起来，或者把其中一个领域的规律机械地搬到另一领域，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理论和实践的错误。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全部。要肯定不容许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际关系上去的论点是正确的，要肯定改变过去关于和平共处的提法是合理的，那就必须承认，国与国的关系本身不是阶级斗争的领域。假如实际上真是这样的领域，那么不管怎样更换提法，也都是荒谬的，因为阶级斗争规律是客观的，因而是受主

^① 1983年1月7日《真理报》，——原注

观决定支配的。主观的决定或提法的更换，只能改变关于某一领域客观存在的关系的错误观念，而不能改变这些关系本身。如果国与国的关系确实是阶级斗争的领域，那么意识形态分歧就是这种关系不可或缺的属性，和平共处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可见，我们摒弃原来关于和平共处的提法，也就摒弃了原来把国与国的关系看作阶级斗争领域的观念。

过去，许多内外情况遮掩并加深了这些错误观念。今天，人类面临着如何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世界已经走到自身发展的危险边缘，走到灾难的边缘。这就迫使人们重新考虑许多在过去似乎是正确的论点，抛弃僵化的教条，以另一种眼光，即不带沉积的偏见和错误的老框框，看一看世界。

必须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

今天，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对抗，是在全人类利益不能不优先于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发展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一切民族的利益”又高于仅仅自己一个民族的利益的原理^①，在过去一直是正确的，那么这在今天已经成为绝对命令。

深刻的矛盾仍分裂着当今的世界，世界上积累的成见、不信任、恐惧和仇恨真是太多了。“传统的”、旧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靠武力来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其惯性力仍在起作用。

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正在增多

但是，在这个领域也发生了向好的方面可喜的转变。国

^① 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卷第192页；《列宁选集》第2卷第866、868页。

际关系中发生的客观过程促进了政治思维方式的改变。各国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增多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关系、生产的国际化、人类毁灭的威胁、生态问题——这一切使各种利益更加交织在一起，使各国在不同问题上的共同点增多，在客观上形成它们利益的共同性。

这种共同性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合作的主要政治前提，是它们共同行动的前提^①。共同性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发展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有这个条件还不够。任何政策的现实性程度如何，就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其他各方的利益。正如苏联的研究人员B·Φ·彼得洛夫斯基正确指出的那样，“当前，如果不同时考虑自己本国的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性，就不可能贯彻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方针。彼此利益的平衡——这就是政治解决国际问题应有的基础。”^②

必须善于妥协

寻求和考虑共同性的因素，就必须掌握妥协的艺术。今天靠威胁和武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只能破坏国际间的信任。因此，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共同生活这门重要艺术，是建立在政治妥协这门同样重要的艺术之上的。不妥协的政策——这是一种甚至在特殊的非常的条件下也毫无道理的反政策。而政治上合理的妥协——这就是寻求和找出寓于个别、寓于差异中的共性。不这样做，无论是在保障彼此安全的问题

^① 弗·恩格斯写道：“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3页。——译者）

^② 《20世纪欧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1985年莫斯科版第207—208页。

——原注

题上，或是在相互的经济联系方面建立互利和平等的关系问题上，想取得国际间一致意见的一切愿望都必定落空。米·谢·戈尔巴乔夫指出：“要知道，如果每个国家将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能对伙伴作出响应，寻求共同点，同他进行合作，那就难以做到国际关系的改善。”^①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谋求妥协的、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其所以能这样，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打破了关于国际相互关系原则的旧观念，在评估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轻重关系方面，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正在发生的变化反映了新的政治思维的确立过程。新思维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刻板公式，抛弃了对世界以及本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简单化看法，也不再企求取得对真理的垄断权。

（原文载于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1988年第5期，望石译）

^① 1987年8月5日《苏联外交部公报》第1期第6页。——原注